

文化廣角叢書

# 開國皇帝的功罪

山東文藝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之多在世界上可堪首屈一指，而每一代又有每一代的开国皇帝。能够担当开国重任的人总有其独特的机遇与建树，其朝代的长短兴衰总与开国皇帝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本书自秦至清，择取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开国皇帝近十代、外国开国皇帝数名加以生动介绍、功罪评说。其中包括千古一帝秦始皇、布衣皇帝汉高祖、北方统治者曹氏父子、自相残杀的杨氏父子、英明皇帝唐太宗、善弄权术的宋太祖、沙漠旋风刮来的皇帝、贫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以及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等。全书内容丰富，叙述生动，史料详实，观点鲜明且时有新见，评说客观公允。可使读者在了解历代开国皇帝的开国业绩以及其功过对本朝兴衰、寿命影响的同时，又可考察先朝灭亡新朝建立的社会历史原因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状况，了解开国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适于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广大读者阅读。

# 前 言

当今一切文化都是过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了创造灿烂的当代文化，人们必须自觉地汲取古代文化和外域文化的精华。这就要求人们对古代文化和外域文化必须有一些确切的认识和了解。广义的文化概念包含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以我们这套丛书力图把它的触角尽可能伸展到文化领域古今中外各个方面、各个角落；以我们的力所能及，对各个领域、各个时期的诸种文化进行审视和评判，并将我们的观察所得、思考所获，奉献给读者。我们期望由此能帮助人们打开一些眼界，开扩一些胸襟。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课题是庞大的，但我们相信也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所以我们要长久地搞下去。

关于文化史和文化学的论述，专家、学者们已写下并还在继续写着系统性的理论专著。但是，除了专门的文化研究者，广大民众对那

些深奥厚重的专著多有望而生畏之感，读起来也难免感到艰涩吃力。能否把古今中外的文化现象、文化知识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加以叙述，把那复杂深奥的理论用极其简明扼要的语言表达，并把那些错综复杂的事件加以条理、归纳，撷取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典型性，并又具有兴味的事件介绍给人们呢？这恰恰是我们这套丛书所力求达到的目标。

我们这套丛书，分若干本。一本往往只注重文化领域的某个方面或某个角落，某种现象或某种事态。从某个角度切入，或纵谈古今，或博述中外。事实皆有所凭，论说皆时有所见。分开来，各本可以独立，方便读者，关心不同领域文化的人可以各取所好；合起来，则是一套系统的文化广角丛书，研究文化的学者，亦可从中获取宝贵的资料，引起新的思考。

当前人们普遍关心文化，热衷文化，都希望为建设当今的新文化而贡献自己的才智，所以述说文化的书籍相当畅销。文化丛书在市场上也有多种。我们不敢说我们这套丛书一定优于别种丛书，但起码可以说它有自己的系统、自己的特色。我们欢迎读者拿我们的这套丛书和别种丛书相比较，并对我们的丛书提出种种批评。也希望读者能和我们一起探讨我们丛书中

所涉及的各种文化现象、文化问题。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在广大读者帮助下能够越编越丰富，越编越赢得人们的喜爱。

山东文艺出版社对我们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此我们深表感谢。

门 岗

1990年于天津红旗河畔

# 目 录

## 前 言

- 一 千古一帝秦始皇…………… (1)
  - (一) 中国第一个皇帝…………… (4)
  - (二) 看不见的长城…………… (9)
  - (三) 焚书坑儒的真相…………… (15)
- 二 布衣皇帝汉高祖…………… (23)
  - (一) 刘邦项羽谁英雄…………… (23)
  - (二) 文官制度的确立…………… (30)
  - (三) 封王的隐患…………… (37)
- 三 北方的统治者曹氏父子…………… (43)
  - (一) 奸雄的本来面目…………… (44)
  - (二) 儿子、兄长、皇帝…………… (50)
  - (三) 建安风骨至今传…………… (57)
- 四 自相残杀的杨家父子…………… (61)
  - (一) 功过参半的隋文帝…………… (62)
  - (二) 暴君的标杆…………… (67)
  - (三) 大运河的悲歌…………… (72)

<b>五 英明皇帝唐太宗</b> .....	(77)
(一) 明君与直臣 .....	(78)
(二) 对读书人优礼有加 .....	(84)
(三) 大唐的胸襟 .....	(89)
<b>六 查理和查理曼帝国</b> .....	(94)
(一) 席卷西欧的战争旋风 .....	(95)
(二) 频繁的民族友好往来 .....	(98)
(三) 查理大帝的复杂性格 .....	(102)
<b>七 善弄权术的宋太祖</b> .....	(108)
(一) 陈桥兵变的真相 .....	(108)
(二) 巧妙的杯酒释兵权 .....	(114)
(三) 卧榻之侧难容他人 .....	(118)
<b>八 沙漠旋风刮来的皇帝</b> .....	(125)
(一) 空前的蒙古大帝国 .....	(125)
(二) 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	(131)
(三) 臭老九和四等人 .....	(136)
<b>九 贫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b> .....	(143)
(一) 和尚、战士、皇帝 .....	(143)
(二) 小鸟不可拔羽 .....	(149)
(三) 皇权专制的恶性膨胀 .....	(154)
<b>十 努尔哈赤及其子孙</b> .....	(161)
(一) 八旗制与其创立者 .....	(161)
(二) 孔子偶像再派用场 .....	(166)
(三) 圈地和剃发的风波 .....	(171)

<b>十一 资产阶级皇帝拿破仑</b> .....	(176)
(一) 从将军到皇帝 .....	(176)
(二) 庞大的拿破仑帝国 .....	(182)
(三) 拿破仑性格一瞥 .....	(186)
<b>结语：皇帝可以休矣</b> .....	(193)
(一) 皇权专制的阴影 .....	(193)
(二) 历史的车轮不容倒转 .....	(194)

# 一 千古一帝秦始皇

秦始皇兵马俑出土后轰动了全世界。人们争先恐后要一睹两千年前中国皇帝的威仪。

一天，在参观兵马俑展览的路上，有几个小伙子争论起来了。争论是由一位穿戴时髦的小伙子的一句话引起的。他无意中对同伴说：

“姓秦的这位皇帝可真了不起，死了还有那么多骑士来陪伴他。”

“什么，秦始皇姓秦？”一位瘦高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哈哈大笑起来。看来他像个高中生。

时髦小伙子不服地说：“笑什么？秦始皇，秦始皇，当然姓秦。”他的嗓门还挺高。跟他一样穿戴时髦的伙伴，捅了捅他，小声说：“秦始皇不姓秦，他爸爸是吕不韦，他当然应该姓吕。”

高中生找到了卖弄学问的机会，耍笑着同伴们：“真有意思，天天说秦始皇，秦始皇，还不知道秦始皇是谁？秦始皇怎么能姓吕呢？”

两个时髦小伙对自己有学问的同伴只好伏

低，就问：“秦始皇到底姓什么？你一说我们不就多长了点见识。”

“秦始皇姓嬴名政，又说姓赵名政。”

“他到底是谁的儿子，哪来这么多姓？”

高中生和同伴们一边走一边聊了起来：

秦始皇的祖先和屈原是一个家族，都是颛顼的后裔。到舜时，他们祖宗中有一个叫大费的人辅佐舜调驯鸟兽，又与大禹一起治水，舜赞大费之功，就赐他姓嬴，这就是秦始皇姓嬴的由来。秦始皇的父亲是秦庄襄王。当庄襄王在赵国当人质时，赵国富商吕不韦与庄襄王交结，并把与他发生关系的一个歌姬送给了庄襄王做妻子，于是有人说这个歌姬生下的儿子，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他是吕不韦的儿子，应当姓吕。因为秦始皇是在赵国出生的，又因为自大费之后嬴姓一族人因功被分封到各个小国，有的就以国为姓，其中就有一个封在赵城的造父，从造父起，嬴姓的这一支就改姓赵了。这样说姓赵和姓嬴本是一个祖宗，秦始皇姓赵也不是无理。但嬴氏一族向居秦地，秦始皇的父亲为秦人而居于赵，秦始皇自然当以嬴姓为正统。由于秦始皇是正月旦日生，所以名政。因为秦始皇当了皇帝，人们避讳他的名字，把正月才改读音呼如“征月”。

两个时髦伙伴听了高中生这一篇咬文嚼字的长篇大论，早有点不耐烦了。他们一齐说：“留着你这点学问考大学吧，我们还是做我们的生意，赚我们的钱，管你秦始皇姓吕，姓赵！”

高中生不再说了，他对自己的伙伴很是可怜。他们一个小学毕业卖羊肉串，一个初中没上完就辍学卖服装，钱他们有的是，可是他们的知识未免太贫乏了。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中间岂止一个秦始皇！从秦汉到三国六朝，从唐宋到元明清，一个朝代亡了又有一个新的朝代诞生，不说一共有多少皇帝，就把开国皇帝数一数，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都起了些什么作用，这不是每一个中学生都应该知道的吗？这不是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该了解的吗？更何况外国也还有不少赫赫有名的大帝呢？

这个高中生把他参观兵马俑路上所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的老师，他的老师觉得这个学生想得更有道理，就给他的这位学生讲起了中国历代开国皇帝的功过。顺便也谈及了几个外国皇帝。下面就是他们谈话的记录，也许对一些人能够开扩一点眼界，增长一点知识。

## （一）中国第一个皇帝

公元前二二一年，中国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在它的国王嬴政的统领下，先后消灭了燕、赵、韩、魏、齐、楚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分裂状态，完成了许多君王梦寐以求的天下统一大业。

秦王政之所以能成就如此功业，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来，国力大增，其经济军事实力高于六国。秦国又地处关中，土地肥沃，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嬴政继承祖辈传统，广开人才之路，六国有识之士，多为其用。加之他本人雄才大略，威权得用，故以一国之力量，胜六国之兵，兼并天下，遂建不世之功。

统一天下后，秦王政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他的尊号如何称呼。在此之前，中国等级制度中最高者为王，三皇五帝仅是古史传说。战国中期，周室益弱，各国君侯已不再将其奉为至尊，于是纷纷自称为王。当时，许多强国君王往往自期以五帝三皇，游说之士亦以帝号怂恿之。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二八八年）曾有短短二个月的时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秦

国很早就表现出对帝号的兴趣，以至各国诸侯纷纷以此讨好于秦。“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故事，便是这一事实的佐证。

现在，秦国一统天下，自然就会对称号正名有更大的兴趣了。

秦王政二十六年，以“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为由，下令群臣议尊号。群臣奏议：“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经过商议，决定取天皇、地皇、泰皇中最贵者，尊王为“泰皇”，并且决定以命为“制”，以令为“诏”，天子自称“朕”。嬴政将“泰”字去掉，“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其它如议。自称始皇帝，希望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皇帝。虽然秦朝未能如始皇帝所想，传至万世，只二世而亡，但皇帝这个称号却代代相传，直到被辛亥革命的大火烧掉。

皇帝的意义，远远超出其称号本身。作为古史传说中的人物，“三皇五帝”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是接近半人半神的形象。取皇帝二字，便是利用这一形象，将君主与臣民分开，造就偶像化的崇拜与服从对象。古代的君主，往往

喜欢神化自我，特别是在中国，由于古代宗教不发达，更由于古史传说的丰富，没有充分条件发展如同希腊神话中的神之系统，而是将古史传说中的氏族首领神人化。如被尊为华夏祖先的黄帝，其母感北斗枢星而孕，二十四月方才分娩，这便是神化。但他又具有普通人的道德和智慧。史称其“幼而绚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绚齐、敦敏、聪明”都是普通人可以具有的德性与智慧。从其事迹看，也多与百姓日用生计有关。尽管这是后代的传说，但仍然可以看出上古先民的神人观念。采用皇帝的称号，正是利用了这种植根于百姓之中的观念，使君王既别于凡人又同于凡人，成就了中国千百年绵延不断的凡人偶像的崇拜。

秦始皇神化个人权威的另一个方法，是采用五行学说作为新兴王朝制定各种制度的根据。五行学说，是战国时代阴阳家的理论，同时兼据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所谓五行，又称五德相胜，即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朝代兴替，便是五德相胜的结果。而五德相胜，是天意的体现。每一种德将兴之时，上天便降符于人间，以示天意。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解释世界，本来是一种探索自然界本体的哲学思想，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它文明古

国中，都曾有过表述。将世界本体看作一种或几种物质，用人们最为习见的具体物质形式解释世界的存在，这样的原初哲学思想其意义是巨大的，其本身是对神秘主义的冲击。在此基础上，古希腊发展了它的自然科学。十分有趣的是，这种哲学思想在中国不仅未导致人们对自然界的进一步探求，从而产生中国的自然科学基础，反而成为政治神话的依据。据记载，秦文公曾获黑龙，以为得水德之兆。因为周是火德，水能克火，因此，秦始皇便以水德作为秦朝政权的护符。

利用五德相胜学说作为王朝的兴替及建立制度的根据，始于秦始皇。从此，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们，又多了一件神饰的彩衣。

皇帝的权威，不仅来源于皇帝本人的神化，还需要一整套礼仪制度的保证。

中国是一个极重礼仪的国家，伴随奴隶制度的出现，礼仪日臻完备。礼仪的重要，可以用这样一段话加以概括：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

因此，先王“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从而确立“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使“事

有宜适，物有节文’。不过，及至周衰，礼崩乐坏，礼仪制度已经无法制扼诸侯们僭名篡位了。

秦始皇始登大宝，担心重蹈周朝君卑臣贵天下大乱的覆辙，便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制度。据《史记》记载：秦有天下，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例如，在前人基础上，秦制定了供百官服用的舆服等级，各级官员必须严格按照各自的身份穿戴乘车。这一制度影响极为深远。后代帝王在此基础上多有损益，从而形成了一套极为缜密的服饰礼仪。

再如，中国一直沿袭的避讳制度，也是从秦始皇手中初现端倪。从此，皇帝的名字再也不许臣民们任意言谈书写。

秦始皇运用各种手段，强化了个人的权威。在他之前，夏商周三代的天子，虽号称替天行道，代表上天意志统治天下，但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个人权威以君临天下。天子名义上据有中国，但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应当指出，夏商周三代，仍然只是奴隶制的氏族社会结构的国家，而真正政出一门，天下独尊的中央皇权专制制度的王朝，是在秦始皇手中建立起来的。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确实名垂史册了。

## (二) 看不见的长城

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后的第八个年头，命令大将蒙恬带领军队和戍民，修筑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碣石的万里长城。从那时起，许多王朝为北部边防的需要，都在秦长城基础上不断修整。今天，人类从浩远的星空回首地球，仍然可以看见一条蜿蜒曲迴的人工巨龙，这就是中国的长城。现存的万里长城，是明代修筑的。秦长城如今已被沙漠吞噬，能够看见的只是断断续续的小沙丘。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王朝后，历经兴衰，到了近代，殖民主义者像从地下钻出来一般，突然出现在海上。尽管中国人也曾试图再建海上长城，但为时过晚。砖土和血肉，已无法抵御坚船利炮的冲击。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目光一直恐惧地盯着北方边塞，谁承想，外国人竟会绕着地球转一圈，打到南国大门。于是，万里长城失去了作用。昔日的光彩，徒增今日的耻辱。更没想到，在一片愤怒与忧虑的思想浪潮之中，万里长城又变成中国封闭落后的黄土文明的象征。秦始皇自然也难逃罪责。

历史写到这般程度，不禁让人心冷。万里

长城在中国文明的成长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摆脱今天的影响去看历史。历史在每个人眼中都不相同。可是，我们不能单凭感情冲动去评价历史。如果是这样，或许有朝一日，万里长城又会变成其它什么东西的象征了。

请仔细想一想，当北方游牧民族以铁骑钢刀杀到国境之内，直接威胁着近在咫尺的中原腹地之时，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除了奋起抵抗，将敌人拒之于国门之外，还有什么其它办法？修建长城，目的是军事，但结果却意义深远。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原华夏民族除了与北方少数民族不断战争外，更有许多相互扶助、互通贸易，以及文明融合的时候。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中国的祖先们没有能够走出围困自己的天然屏障。但是，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中原人的足迹遍及全国。像秦始皇，就曾发动征南战争，建立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逐渐使南北文化经济融合起来。如果没有长城的坚守，中原文明能否很快成熟起来，从而带动其它少数民族的文明生长？实际上，正是因为万里长城方使中国古代文明日臻完善，从而形成足以与外来文明交流与碰撞的力量，而且这一力量，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力量无法向外发展，而是在自身内部消耗掉了。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落后而责备昨天的先进，换句话说，昨天的先进并非今天落后的原因。

应当承认，长城是中国文明成长的保障，它对于中国文明以至世界文明的贡献都是无容置疑的。问题在于，中国文明尽管发育成熟，却没有如西方文明那样找到最终的宣泄口。一个文明无法向外宣泄，无法在与其它文明的撞击中破坏旧有模式，建立新的模式，那么，这个文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灭亡，一是向内自我宣泄。中国文明就是走了后一条路。而奠定路基的人便是千古一帝秦始皇。

其实，秦始皇不是最后一位修建长城的君主，也不是第一位修建长城的人。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赵、燕、秦都先后修建过长城，秦始皇不过是将各国长城连接起来而已。在长城的建造上，秦始皇并未表现出多少创造力。倒是在另一件事上，他却真正体现出千古一帝的气魄，为后世修筑了一条更为坚固的长城——中央专制集权制度。

大家知道，汉承秦制在史学界差不多是定论。实际上，不仅是汉代，中国历代封建王朝

在制度的沿革上，从未彻底摆脱前代的影响，即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封建社会从大模样上看，基本承袭着秦朝的体系。

秦始皇初定天下，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国家政权。秦以前，天子虽名义上据有天下，但诸侯割据，自为号令，正如柳宗元《封建论》中所说，表面上是四方守臣干城，实质上是祸乱根源。正是因为周代分封制的弊端，秦国才以偏隅西北的后封之国，乘时势并诸强，最终得以占据天下。鉴于分封制的覆辙，秦始皇在开国之初，力排群臣之议，独采李斯主张，废弃分封，建立郡县。

郡县制的根本目的，就是强化中央集权，使军国大权，完全运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中。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守是一郡最高长官，直接受中央节制；尉是一郡的军事首长；监是一郡的监察长官。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亭，基本上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这样就把散沙般的小农经济生产者系统纳入中央管理范围之内。从下至上，百姓听命一人；从上至下，皇帝层层控制。郡守等官吏的任命权在中央，是非世袭的职务。于是，夏商周三代反复出现的天下大乱，诸侯割据的局面，被一种新型国家制度所限制。过去

天子们口中空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在秦始皇手中终于成为现实。

为保证皇帝能有效地行使权力，秦始皇还建立了一套中央政权机构。以丞相为首的官僚集团，作为皇帝的辅佐操纵着整个国家机器。官员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他们的权力是由皇帝赐予的，必须绝对忠于皇帝陛下。国家的各项事物都有专门机构管理，决定权原则上说都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至此基本建立起来了。

秦始皇所建立的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国文明的生长奠基于统一的社会环境之上。

战国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由过去割据局面带来的繁荣转为衰败。在长达数百年的国土分裂状态下，曾经有过短期的经济飞跃，这种飞跃是由于冶铁业的发达、铁制器械的应用带来的。客观上说，割据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的需要也曾推动了这一飞跃。铁制生产工具使得农业手工业发展迅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又带来商业繁荣，商品交换为中心城市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各个诸侯国便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建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从世界历史的共同特征看，中国文明发展至此，面临着两种走向的

选择。一种选择是像古希腊一样，建立城邦共和国，以贸易的发展促进社会走向农商并重的经济格局；另一种选择是重农抑商，以农为本，限制商业贸易的发展，建立农业国家。前者所需要的客观环境在中国并不具备，因为中国文明的重心，当时是在中原及北方，这是一片依靠水利灌溉的农业经济区，也就是说，中国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因此，对于任何一位诸侯来说，领土要求是最为强烈的要求，因为土地就意味着富强。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天下成了所有诸侯国的共同理想。没有统一稳定的社会条件，文明就无法成长。即使这种文明是农业文明，但对于一个无法与外部其它文明相比较、相冲突的国家来说，也是唯一的选择。秦始皇就是这种文明发展的保护者。他创造了一台高度发达的国家机器，也可以说建构起长城般的制度，确保文明的成长。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诸如统一文字、度量衡、修筑驰道、连接各国长城等等，都是这条无形长城上的一砖一石。建造砖石的万里长城远逊于建构这条“无形”的政治长城。

### （三）焚书坑儒的真相

秦始皇在二千多年历史中引起无数史家、学者、政治家的争论。一部分舆论肯定其统一中国的功绩。但他却从未摆脱暴君形象的阴影。作为暴君的证据之一，便是焚书坑儒事件。

中国历代政治统治者与知识阶层的关系都十分密切。据学术界推定，知识阶层的形成，大体在春秋时代。从那时起直至今天，中国知识阶层一直在政治的漩涡中浮沉。其得意之时不少，但失意之际却也正多。如果说这一阶层有什么特殊优点的话，顽强努力于发挥自身社会政治功用恐怕算是突出之处了。

如果追寻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原因，便要与百家争鸣搭上界。也可以说，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事件背后，扮演了重要角色。战国七雄争霸，其所凭藉者，一是强兵富国之策，一是合纵连横之谋。而此二者均有知识分子推波助澜，谋划其间。以秦为例，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曾加以概括：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

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李斯所举的百里奚、商鞅、范雎等人，都是由士出身的著名政治家，在秦国发展中致力于富国强兵，奠定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基础。而张仪，这位与苏秦齐名的游士，他们创造的合纵连横的外交战略，对各国力量的消长有着重要作用。李斯本人，更是一位声名赫赫的王佐之才，在协助秦始皇吞并诸侯、建立郡县、制定法度、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可算是功勋卓著。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他曾与韩非同投大儒荀况门下，“学帝王之术”。后来，在辞别恩师西入秦国建功立业之际，曾讲过这样的话：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久处

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果然，李斯没有辜负这番壮言，辅佐秦王，一并天下，位至三公。作为知识阶层一员，李斯可谓功成名就了。

除像李斯这样以游士入仕诸侯，为王股肱，身列卿大夫的知识分子外，还有另一类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曾具体地为某个君王效力，许多人甚至得不到一官半职，但这些知识分子目睹天下混战、生灵涂炭的局面，或周游天下宣传自己的思想，或著书立说、整理古代典籍，或设立学宫，教徒授业。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得到充分发展并相互砥砺融合。中国社会空前绝后的百家争鸣时代便是主要由这部分人造就的。

百家争鸣的时代，一直为后世知识分子所称道和向往，几乎成了知识分子世代传承的梦想。这种梦想成为检验政治统治者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标准。可是，有两点理由证明这种梦想是不切实际的。

第一，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人类思想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现代学者以“哲学的突破”概括这一时代的思想史特征，认为百家争鸣是由礼崩乐坏从而导致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造成

的。今人余英时指出：

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家，便是最好的说明。孔子一方面“述而不作”，承继了诗书礼乐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墨子最初也是习诗书礼乐的，但后来竟成为礼乐的批判者。就其批判礼乐而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其余战国诸家也都是凿王官之学之窍而各有突破。

不仅中国存在这种“哲学的突破”，即如古代文明的其它诸国如古希腊、印度、以色列等也都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由此可见，百家争鸣乃人类思想史中必经之过程。后代尽管也有各种思想学派的竞起，但由于已不具备这种“突破”的特殊意义，自然也就难以表现如此充分的思想及学术的繁荣景象了。

其二，百家争鸣的时代，天下尚未形成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政治权力。前面讲过，夏商周三代，天子除在名义上据有天下外，对于各国诸侯并无绝对权威。况且维系天下的主要是礼

乐性政治制度，政治对于思想的压迫并不十分严厉。值得注意的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许多措施，如推行县制和建立官僚制度已开秦始皇政治制度的先河。而商鞅也曾“燔诗书而明法令”，这种做法与其变法措施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关系。将其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比较，此中透露的信息，不能不令人对政统与道统在各自形成过程中的彼此消长加以深刻思考。

随着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完成，百家争鸣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此时的中国社会，政治权威已经确立，知识阶层再要各逞己见，游说天下，势必动摇政权基础。而思想界的学派竞争也告一段落，主要的学派，各自的思想体系业已初步确立。一统天下、一个君主、一种思想，这样的三位一体格局取代了八方争霸、百家争鸣的时代。秦始皇挟帝王之威，据天下之力向知识阶层开刀便是当然之事。

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直接的导火线仍是分封与郡县之争。秦始皇在并吞天下之后，就曾有人提出分封诸子，恢复三代“封国土，建诸侯”制度。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郡县制。但有许多读古书、循古礼的博士，仍然不肯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他们坚持认为“殷周之王千余岁”是“封子弟功

臣，自为枝辅”的结果，他们希望秦始皇效法先王，师古以长久。

从这种情形看，当时的知识阶层，大部分人并没有跟上时代政治的发展，暴露出知识阶层的政治幼稚症。当代学者在考察政治运动嬗变过程时曾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作为从事观念工作的人，在政治革命前奏期作用甚大。这时的革命方向主导权操纵在他们手中，他们用观念思想鼓动人民，推进革命。但随着政治革命的深入，这批人物逐渐退居二线，取而代之者，是一批政治行动家，而前者往往为观念所限，固执己见，成为后者行动的障碍。行动者势必要收拾他们。

从秦朝建立后的几番分封郡县之争，可以证明这种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如前所述，知识阶层在百家争鸣时代创立的各种思想体系以及他们的实际参与，都对秦始皇统一天下有深刻的背景意义和实际功效。但随着新王朝的建立，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与政治当权者发生观念上的冲突，政治与学术矛盾激化，尤其当知识分子企图干涉政治之际，这种矛盾激化必然导致当权者以其政治权威镇压知识阶层。由此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并不仅仅是政治统治者乱施淫威的表现，更有其二者内在冲突之根

源。清人朱彝尊《秦始皇论》中谈到焚书坑儒事件，他说：

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特以为诗书不燔则百家有所附会，而儒生之纷论不止，势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顾者，惧黔首之议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岂若是其忍哉。盖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为众恶之所归而不悔也。呜呼，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陷于禽兽；其发也，至合圣人之书燬焉，则非秦焚之，处士横议焚之也。

朱氏之言，其立足点自然是正统儒家排斥之异端邪说。但如果细细想来，他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情势的条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后果，导致二千多年政统与道统间彼此争执且总是政统占尽上风，形成政治压迫学术的大局。无怪后代知识界人士几乎异口同声指斥秦始皇是位暴君。可是立足于政治统治者的角度，秦始皇的举动又经常受到效法。清代就曾有大兴文字狱和借编辑《四库全书》毁禁图书之举。可见，政治与学术关系异常密切却又各自独立，两者相安无事自是

美好理想，一旦发生冲突，胜负结局不能单以各自角度观察。实际上，焚书坑儒事件就是无法以胜负判断结果的。这场二千多年前的公案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还会不断被翻出来重新审理，而判决却由审理者各自的价值标准和立场的差异而各有不同。

## 二 布衣皇帝汉高祖

秦二世六年（公元前 209 年），陈涉、吴广在蕲县大泽乡起义，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短短的几年里，豪杰并起，风云际会。一位布衣之士提三尺剑乘运而起，刈除群雄，登上皇帝宝座，应验了陈涉们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人就是西汉开国之君刘邦，后代尊称汉高祖。

### （一）刘邦项羽谁英雄

公元前二一〇年，做了十一年皇帝的秦始皇带着万世江山的梦想病死于南巡途中，他的儿子胡亥登基，史称秦二世。二世皇帝宝座尚未坐稳，随着陈涉吴广登高一呼，天下旌旗林立，刀枪并举，秦末大起义爆发了。在各地豪杰中，项梁、项羽叔侄领导的江东子弟兵最为著名。

项氏叔侄乃楚国大将项燕之后。楚国为秦所灭，天下曾传言“亡秦必楚”。项羽随叔父起兵，逐渐成为一支实力最强的义军。项梁死后，项羽便成为这支义军的首领。后来，各地义军联合起来，共推楚怀王之后为王，统一指挥各家人马。在对秦战争中，项羽表现出超人的勇武。在与秦朝主力章邯部作战时，其他各家军队为章邯人马所慑，“皆作壁上观”，唯有项羽，破釜沉舟，以一当十，最后打败了章邯。战争中项羽表现出盖世英武，使得其它诸侯军队自甘下属。

正当项羽苦战章邯之际，原为沛县亭长的刘邦带领人马乘虚而入，攻占秦朝首都咸阳，夺取了关中之地。根据楚怀王与诸侯之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准备做关中王了。项羽当然不肯将自己浴血奋战的成果拱手让人，于是提兵入关，准备与刘邦决一死战。刘邦自知不是项羽对手，在演出了一出鸿门宴之后，便被赶到巴蜀险恶之地去做汉王。

此时的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占有梁楚九郡肥沃之地，兵精粮足，诸侯景从。如果趁刘邦立足未稳，发兵征伐，天下可能就归于项羽了。十分可惜，项羽未能利用时势乘胜进取，

却沽名钓誉，养虎贻患。刘邦用韩信计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袭取三秦，纵兵东向，要与项羽争夺天下。楚汉战争爆发了。

三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数败于项羽，有几次险些被擒，但每次都化险为夷，元气复振。而项羽每次战胜，却都不能乘胜追击，以至坐失良机。难怪范增早就看出“竖子不足与谋”。最后，项羽被围垓下，乌江自刎，结束了颇为悲壮的一生。

在秦末农民大起义风云变幻的形势下，诸多英雄豪杰竞相起事，争霸天下。刘邦与项羽是其中的佼佼者。项羽率八千子弟兵渡江攻秦，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当者破，攻者服”，为打败秦朝建立了殊勋。刘邦崛起布衣，任用贤能如张良、萧何、韩信等人，有智有勇，兼文兼武。从军事力量上看，刘邦可能不及项羽，但如果根据衡量战争所要求的综合条件，项羽却远非刘邦的对手。

刘邦与项羽，一个代表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创业明主，一个代表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战争武士。攻城陷地，自是武士所长，而保民治国，却正为明主之责。早在诸侯分兵入关时，众人就以项羽为人“剽悍猾贼”“杀戮不禁”“诸所过无不残灭”为由，不肯把入关的任务交给项

羽。而“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派“扶义而西”。可见，人心的天平此时便已倾斜。果然，在刘邦入关之后，施仁行义，大获民心。秦王子婴降，刘邦未予诛杀。听从张良谏言，封秦朝宝物财产于府库，退到灞上驻军。又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偿命，伤人及盗窃办罪，“余悉除去秦法”。充分表现出有德之君的气象。而项羽呢，不仅在新安坑埋秦军降卒二十万，且入咸阳后焚烧宫室，诛杀子婴，残害百姓，以至“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夫形象。

有人说，刘邦这样做是为了收买人心，假仁假义。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问题在于，一个君王所采取的政策即使十分虚伪，但只要符合百姓愿望，有助于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那么他就是成功的。特别是在秦朝峻刑苛法统治下，百姓盼望宽厚轻松的统治，有如久旱盼雨露，黑夜盼黎明。因此，即便刘邦的仁政十分虚伪，但比起项羽真诚的杀戮，还是更能得到百姓的拥戴。

刘邦出身平民，行事没有太多的礼法束缚，可以因时变易，趋利避害。例如在著名的鸿门宴事件中，刘邦得知项伯前来通风报信，马上命张良引见，而且以兄长事之，约为婚姻。宴

会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多亏项伯“以身翼蔽”，方得幸免。项羽捉到刘邦父亲，二军阵前以杀父相威胁。刘邦不仅没受孝道观念所限，屈从项羽，反而顺水推舟，说出了“幸分我一杯羹”那番著名的话。刘邦的行为，虽有些近于无赖，但情势所急，存大弃小，如樊哙所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正是这位布衣君王的真实写照。

项羽出身贵族，常以楚国大将之后自矜，所为之事，往往有贵族武士之风。乌江自刎，固然由于大势已去，但顾及个人情面，不肯做东山再起的尝试，也是项羽为人的一贯表现。战争中，项羽不耐久战，竟提出与刘邦个人决斗，以分胜负，这种表现不禁使人想起西方中世纪武士决斗成风的情形。他的要求自然遭到拒绝。刘邦略带嘲笑地告诉项羽：吾宁斗智，不能斗力。这一插曲，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刘项二人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

作为一名武士，项羽所相信的只有个人的勇力，对于智慧，缺少最基本的认识。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曾经亲自分析他与项羽的胜负原因，他说：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

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正是由于刘邦重用了如张良、萧何、韩信等一大批人才，才能不断从失败中恢复起来，直至最后战胜项羽。而项羽为人刚愎自用，疑心太重。不仅诸侯叛他而去，就连被他尊为亚父的范增，也因刘邦略施离间小计，被他赶跑了。项羽赶走范增之时，正是刘邦被围荥阳，几乎不得脱身之际。此时，范增正在为项羽谋划围歼刘邦。项羽君臣失和，使刘邦获得了一次死里逃生的机会。可见，项羽有勇无谋，完全是一个孤家寡人的莽撞汉。

刘邦对于人才的重视，与他出身平民关系甚大。刘邦只是一名秦朝小吏，布衣起家，其号召力远逊项羽。就个人智勇而言，也未必强过他人。故而欲成就大事，只有借助天下人的才力。如对待张良，言必听、计必从，尊为帝师。即使像韩信、彭越、英布等大将，刘邦也是虽忌恨犹使用，虽心疑犹面许。所以，刘邦以一人之力驭万人之力，其胜必然；项羽以一人之力当万人之力，其败无疑。项羽将其失败原因归之于天，可见其死而不悟。

刘邦与项羽，一个面南称帝，奠定汉代基业；一个引颈自杀，空余千古浩叹。如果根据“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说法，刘邦自然是英雄。但是项羽所表现出来的举鼎拔山气概及其在推翻秦王朝战争中的贡献，也足堪英雄美称。除了个人的种种原因之外，项羽的失败应当归结于中国先秦以来政治格局的变化。项氏所代表的正是春秋战国以来武士阶层的精神和思想。而随着文武分析，文官制度在秦始皇手中已有定形，武士的地位远远降在其下。统一天下，虽然必须有武力的凭藉，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武力重建文人统治的政权。中国文官制度形成如此之早，力量如此之强，以至武士精神不能像西方那样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中国人对于武的字义解释，最能说明问题。《说文》曰：止戈为武，武就是要消灭自身，就是要实现非武力的目的。因此，运用武力必须要在其中增加文治成份。项羽的失败，正在于他只有破坏旧王朝的武力和勇气；刘邦的胜利，却在于他有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建立新王朝的谋略。刘项之间的一立一破，一胜一败，充分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文武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成为后世改朝换代者们的借鉴。

## （二）文官制度的确立

汉高祖刘邦在争取天下后，一次，曾骄傲地对大臣陆贾说：我居马上而得天下，用不到诗书。陆贾毫不客气地反问他：居马上得之，难道还能在马上治之吗？君臣问答之间，汉初治国之道的因果可见。

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之后，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如何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发展生产，使长期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得以喘息休养，安居乐业。

秦始皇统治全国的时间不算很长，但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奉行法家政策，为刑严苛；且始皇帝好大喜功，大兴徭役，在修筑阿房宫，骊山墓及连结六国长城等庞大工程中，耗尽民力。秦朝制定了一整套官制，但始皇以其不世之雄，亲自管理万事万物，并没有真正发挥官僚机构的全部作用。秦朝留下的制度都是带有开创性的目标体系。筚路蓝缕，秦始皇可称创立之功；承前启后，汉高祖当效完善之力。历史的选择把确立和完善文官制度的重任交给了汉高祖刘邦。

刘邦出身布衣，原本不好儒术。据记载他

对儒生十分无礼，甚至用儒生帽子便溺。这一点反映出刘邦在心理上并没有与士人认同。并且也多少表现了春秋战国以来文士的地位逊于武人的攻伐之力。天下乱荡，自然要依靠军事实力征伐战守、平定四方。可安国治民，就必须仰赖文官的才干。况且，秦以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已经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当务之急，必须迅速建立由文官执政的政治制度。刘邦很清楚这一点，故而他尽管看不起文士，可最终却毫不迟疑地大胆使用他们。

实际上，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就是依靠谋臣的辅佐取得了胜利。当初，萧何作为汉王丞相留守汉中，为刘邦后援，供给军粮，补足兵员，已显示出治国才干。汉高祖即位后大封功臣，以萧何位居第一，许多武将不服。有一位名叫鄂秋的人对刘邦说：野战略地之功，只是一旦之功；而像萧何的功绩，却是万世之功，两者如何相比呢？汉高祖十分赞成这一说法，使萧何的地位居于他人之上。对其他的谋臣，也都安排了重要职位，从而奠定了汉朝文官政权的基础。

与秦相比，汉代文官体系更加完备，汉官以丞相为首，下设大夫、郎中等官职，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官吏结构。地方的官吏也多由文

士出任。各诸侯王国也设立与中央相应的官职。在这个文官体系中，丞相的权力和地位都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基本上担负了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责任。如果皇帝不理朝政或外出巡游，丞相的责任就更为重大。汉初高祖忙于对四方异姓王叛乱的征讨，几乎把朝政交给丞相萧何。萧何当政，权倾一时。如人所言：“陛下距楚数岁，陈豨、英布反时，陛下自将往，当时相国守关中，关中摇足则关西非陛下有也。”萧何恪尽职守，使得汉高祖没有后顾之忧。刘邦对于丞相一职十分重视，其临终前曾向吕后叮嘱代替萧何职位的人，他一口气报出了曹参、王陵、陈平三人，可见其对丞相一职的重视程度。

文官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国家政策具有较为稳定的连续性，不因大臣更迭而变化无常。武人政权往往以其武力推行其政策，而文官执政却以官吏才干作为政策的保障。庞大的官吏结构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稳固性，可以避免朝令夕改的现象。汉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汉高祖、萧何所制定的大政方针在几代丞相手中延续不变。萧何之后为相的曹参，“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之约束”，表面上无所作为，可实际却为天下百姓赢得了宝贵的一段休整时间。民谣唱道：

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

“萧令曹随”的故事，成为文景之治的前奏曲。

起用文士为官，正是发挥其治国所长的办法。文士们于马上征杀，攻城掠地非其所长，但为新兴国家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为管理国家提供理论依据却得心应手。像礼仪专家叔孙通，原为秦博士，汉兴，重被高祖用为博士。他看到汉初朝廷礼仪混乱，大将功臣们在朝堂之上醉酒狂呼，全无君臣之礼，于是向高祖进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果然，叔孙通采纳古礼秦仪，各有损益，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朝廷礼仪制度，不仅使刘邦感叹“知为皇帝之贵”，而且成为后代朝仪的重要来源。叔孙通所谓的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可谓知世之言。

依靠文官治理天下，是刘邦这位马上皇帝的英明之处。后代诸多开国之君都效法汉高祖，讲求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如果仔细分析，文官制度之所以在中国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客观要求。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大一统国家，小农经济生产者遍布各地，如何将其组织起来，使之安居乐业，有效地提高

社会生产力，使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自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国家的管理必须以政治经济为核心。因此，一套自上而下，控制全国的官僚网络就显得十分有效和重要。而大一统政治所要求的统一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也需要文官去构建和宣扬。汉代提倡“以吏为师”正是促进思想统一的重要手段。”以吏为师”实际上是把吏的水准作师的要求，也就是把过去散布于民间传授自己思想的为师者纳入了中央统一管辖的官吏集团之中。这样正可一箭双雕：既可以将过去与政权有矛盾的士人们控制在政权手中，消除了潜在的危险；又可以利用这些人经世治国的才干为我所用。不过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这些士人的思想要有统一的价值标准，而这种标准要能为政权所接受和服务于政权。另一问题是要有一种方式为士人晋仕提供可靠的途径。这两个问题在汉高祖刘邦手中都未能解决。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的政策是针对第一个问题所制定的。“独尊儒术”，把士人的思想统一到儒家体系之中，从而为中国文官制度奠定了统一的思想基础。而自西汉的举贡制、东汉的孝廉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直到隋唐确立的科举制，都可以看作是为士人提供晋身之途的种种尝试。这些

制度为中国的文官政权提供了组织保证。

任何事物都有其正反的两面，其效果也随着该事物的发展，愈来愈暴露出正负两种效果。文官制度也不例外。汉代的文官制度在其建立之初确曾对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富强产生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文官制度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它的恶疾，以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这里所讲的文官制度是建立在封建专制主义基础上的，与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官吏是皇帝的臣属，他们的行为都应以维持皇权统治为目的。对于皇帝而言，他们是工具，是手段，是统治百姓、剥削百姓的爪牙。对于人民而言，他们是皇权的代表，是权力的象征。虽然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过大批为民作主，为民请命的清官、好官，这些人长期为人民所歌颂所纪念。但就整体而论，文官集团所代表的决不是人民，而是封建制度。况且，在专制制度下，官吏的任免都由皇帝掌握，人民没有选择自己喜欢的官吏的权力。任何官吏，无论是丞相三公还是郡守县令，他们也都只是封建制度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他们不仅无力为百姓命运抗争（就算有人想这样做的话），实际上他们个人的命运

也不由自己左右。他们本身就是悲剧。

其次，文官制度必然导致庞大的官僚集团，而到了后来，官僚集团的腐败堕落，成为这种制度的致命伤。众多的官吏统治着全国各项事务和广大人民。作为皇帝的代表，身份赋予他们各种权力，这些权力极易成为他们作威作福满足一己私欲的方便条件。中国封建社会流传着这样两句话：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作为一种要求，这是非常之低的。可事实证明，就连如此之低的要求，许多人都做不到。鱼肉乡里，盘剥百姓，鬻官卖爵，行贿受贿，不一而足。天下百姓负担着如此庞大、如此腐朽的官僚集团，可想而知，苦不堪言。

第三，文官制度要求官吏的除才干之外，必须具备阿谀奉承、逢迎拍马的性格。甚至于到后来，各种恶劣的官场关系远远比个人才干更为重要。在官场之中生存，必须学会磨灭个性特征，以上司命令为指归。官官相护，同流合污，最终导致整部官僚机器的锈死。

最后一点，就是官吏的选举制度终成扼杀人才的根源。以西汉为证，自奉行举贡制以来，每郡按人口比例送达中央的或由太学生选送的官吏，实际上良莠混杂、泥沙俱下。他们依靠各种关系得以选送中央，虽名义上由皇帝考查，

而皇帝以一人之好，蔽天下之明，其结果则可想而知。

汉高祖刘邦建立起了一套文官制度，在初期确曾奏效。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官吏制度正以此为基础得到了发展。这是他的功绩。但其流弊所及，直接影响了又扼杀了民主、自由在中国的蓬勃生机，虽后代积众恶所成，但汉高祖仍无法辞其咎。

### （三）封王的隐患

公元前一九五年，汉高祖刘邦病死长安长乐宫，享年六十二岁。汉高祖奠定西汉王朝二百余年基业，是一位著名的皇帝。不过，除了传给子孙们至尊无上的皇权外，刘邦也留给子孙许多麻烦。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他在开国之初所封的一大堆王位了。

早在秦王朝建立之初，许多人都劝秦始皇效法三代，裂土封王。始皇从自己政治设想和实际情况出发，没有这样做。当时有人预言，秦始皇不封子弟，天下迟早大乱，皇帝的位子坐不长。谁知不幸而言中，秦朝二世而亡。这一亡国的惨状，竟成为秦末人们重新收拾起封王之举的借口。

秦末天下大乱，诸侯四起，狼烟滚滚，颇有春秋战国列强争霸的味道。灭秦后，项羽封王十八家，他自立西楚霸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此时项羽以为大局已定，可以安心为王了。却不知历史不能重演，天下统一已成人心所向，诸侯并存的局面难以维持，许多王爷席不暇暖，便被旁人夺走王位。诸侯王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楚汉之争，实际上是天下之争。

刘项之间的战争，其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诸侯王的支持。许多将领也希望投奔胜者，以期封王之赏。当刘项决战荥阳之时，韩信乘机向刘邦提出要求，封他为齐王。据传当时刘邦听后大怒，他身边的张良陈平连忙在桌子下面踢了刘邦一脚，刘邦不愧天资聪明，马上明白自己失言，连忙答应韩信的要求。这一踢，使刘邦获得了一份十分宝贵的援助。如若不然，韩信很可能倒戈，鹿死谁手就不一定了。

刘邦平定天下，原来的诸侯王仍然继续封之。其中像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人，都在楚汉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邦封了这些异姓王，心中自然也有顾虑。如何翦除他们，成为刘邦日夜考虑的问题。

韩信是刘邦打败项羽的得力助手，其军事才干汉高祖十分佩服。唯因如此，也就成了最

大的心病。韩信拥兵自重，占据楚国富足之地，就算他并无反心，刘邦也必不能容他。当刘邦用陈平之计，诱捕韩信时，韩信感叹道：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自然要被杀。殊不知早在其要求齐王之封时，已种下祸根。汉高祖为刘氏江山着想，怎能让他称霸一方，养虎贻患呢？

汉高祖用了二年多的时间，先后消灭了楚王韩信、赵王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一批诸侯王，基本除掉了异姓王的威胁，于是便分封刘氏子弟取而代之，企图用自家人镇抚四方。这就是史称同姓王之封。

分封同姓王有其形势的需要。秦末战乱以来，战国时期旧的王国势力借机抬头，许多王国后裔纷纷恢复国号。汉高祖虽平定四方，但这些势力的残余依然存在，并与新的异姓王遥相呼应，几有背汉之险。消灭了异姓王，就需要有新的权威安定这些地域性的政治动荡。

刘汉王朝虽已建立，但自上而下的统治系统尚未整理就绪。各地官吏还不能正常地执行中央命令，需要将全国分而治之，形成郡县与封国并存的政治格局。诸侯王国实际上代行了一部分中央权力。既然异姓王不可靠，同姓刘氏当然应与皇家一心。

另外，许多刘姓子弟跟随汉高祖南征北战，或有战功，或有苦劳，不把这部分人安抚好，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势必加剧。而且吕后一系的诸吕外戚，也在加速权力的争夺。异姓王虽暂时消除，但新的危险正在迫近，由于种种原因，汉高祖分封了一大批同姓子弟为王。其中有弟刘交为楚王，兄刘喜、子如意先后为代王，子刘肥为齐王、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阴王，同姓沛侯刘濞为吴王。刘姓诸王的分封，是客观情势所迫的结果。在后来诸吕争权，威胁刘氏江山时，同姓王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吕后与刘邦为贫贱夫妻，楚汉战争中吕后与刘邦父亲同被项羽俘获。汉高祖做皇帝，吕后参与朝政，权势很大。高祖在世时，已对吕后的野心有所察觉，为防止身后变故，曾与诸大臣和吕姓子弟在一起刑白马为盟，明言：“非刘氏而封王者天下共诛之。”及汉高祖死，吕后大权独揽，重用吕氏兄弟，先后分封了三位吕姓王。大臣陈平、周勃等人利用计谋，在吕后死去不久，很快消灭了诸吕，稳定了汉初朝内变乱。平定诸吕，当首推陈平、周勃等大臣之功，但刘姓诸王在朝外为藩屏，对于诸吕势力也是很大的震慑。

异姓王的危害消除了，但同姓王仍然是朝

廷的心腹之患。汉文帝时，曾有济北王刘兴、淮南王刘长谋反，很快被消灭。到了景帝时代，诸王势力日强，成为朝廷的威胁。御史大夫晁错建议景帝削藩，终于导致了以吴王濞为首的七国之乱。

吴王刘濞是高祖的侄子，早在刘邦封他为王之时，就预感他有反心，曾经告诫他说：五十年以后东南地区有叛乱者，莫非就是你吗？天下同姓是一家，你不可造反！时隔五十年，刘濞果然联合六国，向中央发难。此时，高祖的话，刘濞是否还记得呢？景帝任用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亚夫乃绛侯周勃之后，周勃平灭诸吕，亚夫打败刘氏七国，这难道是历史的巧合吗？

七国之乱的直接原因是晁错的削藩建议。晁错认为，诸王国力很强，得其地力，骄傲朝廷，预谋造反。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有趣的是，晁错曾经学习申商刑名之学，与法家有学术渊源。他的主张同秦始皇的重臣李斯有某些近似之处，特别在反对分封，巩固中央集权上有相同的见解。从汉初政治局面上看，晁错建议削藩，尽管加速了七国叛乱，但也加速了藩国的败落。虽然晁错被腰斩于市，但我们

仍然不能不说他是汉代的重要功臣之一。削藩的成功，直接导致了汉武帝时代大一统汉朝的强大繁荣，也为儒家思想趋于至尊提供了政治条件。可见各家思想在其政治运用中彼此消长，互为补充，共同推动汉朝大帝国的成长壮大。

汉高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秦始皇废止的分封制，分封了异姓王和同姓王。尽管此举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和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于汉初几朝的政治仍留有很大隐患。裂土封王的举动，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有着深刻的内在冲突。从中国文明的成长过程所要求的政治条件上看，自成一家的地域政权虽然不断反复存在，但总是被强大的集权国家所代替，而在统一的王朝之中，不能允许各自为政的藩国势力生存。这是政治的必然，也是农业文明所要求的经济基础。从汉高祖开始，以后历代王朝许多开国皇帝都曾有过此举。尽管后来的王国只是一种统一于中央的地方政权，但仍然为朝廷所不容。像明太祖朱元璋，把自己的儿子封到各地，确曾对元末各家残存势力起到一定的镇抚作用，但却直接导致了燕王朱棣北京起兵，建文皇帝失去宝座。可见封王弟子，虽不能说一点利益无收，但其危害之大，致使兄弟相残，叔侄反目，不能不被后人引为教训。

### 三 北方的统治者曹氏父子

在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位君王像曹操一样为百姓家喻户晓了。京剧舞台上，有曹操的戏经常上演，那位满脸奸相的汉朝贼子，大家既恨且怕。中国文学巨著《三国演义》更以淋漓尽致的笔墨刻画了一位乱世奸雄曹丞相。现代人感于历史的不公正，不断有人出来为曹操平反。对于曹操的争论之多，分歧之大，更加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以至他的儿子，那位真正篡汉的魏国开国皇帝曹丕，竟被乃父阴影所蔽，不大被人看得清楚了。

曹氏父子完成了统一北方，建立魏国的使命，作为开国之君，曹操的贡献远大于曹丕，可真正雄踞于皇位宝座的，却是曹丕。因此，父子俩人应同样受到重视。

## （一）奸雄的本来面目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汉永寿元年（公元155年）生，是西汉初期名相曹参之后。年轻时机警过人，善用权术。东汉末鉴人之风盛行。当时以知人著称的桥玄曾劝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桥玄话说不久，即爆发了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曹操果然发迹，一步步走向权力的顶峰。

黄巾大起义，是东汉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在镇压这场起义中，各地军阀乘机拥兵自立，相互攻伐，汉室江山岌岌可危。汉朝大臣董卓势力很大，掌握着中央政权。各地诸侯结盟兴兵，共讨董卓，曹操也参与其中。这时的曹操，兵少将寡，位卑言轻。与袁绍等汉室旧臣相比，本无足轻重。但曹操以其雄才大略，出色的才干，过人的胆识，崛起于群家诸侯之中，逐渐成为有力的政权争夺者。

有人曾对曹操作过如此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本人对此评价十分满意。他生逢乱世，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手段，不仅不能戡平战乱，重建朝纲，建立不朽功业，即使

想退保一方，全身躯，保妻子也甚为不易。既然不能做治世的能臣，只好做乱世的好英雄。

历来的攻击者，往往注意到曹操奸诈狡猾的一面，而忽略其大智大勇的雄才。实际，奸诈狡猾必然有大智大勇为前提，如其不然，只配算一奸诈小人，根本称不上什么“雄”。曹操的雄才，在他与袁绍的官渡决战中可见一斑。

袁绍出身显贵，数世公卿。在十八家讨董卓的战役中，以其门第的显贵和实力的强大被推为盟主。如果就影响和力量看，袁绍完全应该打败曹操，夺取天下。不过，袁绍不仅缺乏曹操之奸，更无曹操之雄。早在他们共讨董卓之际，俩人曾经讨论过攻取天下的战略。袁绍认为：“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听后颇不以为然，他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一个以险固为资，凭借力量取胜；一个以道御天下，随机应变。在俩人谈话之间，高低胜负之分已清楚可见。曹操在官渡决战之前，采纳荀彧程昱等谋士的高见，将汉天子抢到手中，从而造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尽管人们可以说这是曹操的奸计，但取得汉家正统的象征性名号，从而使自己的地位高居各地诸

侯之上，却正是曹操雄才大智的体现。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袁绍的谋臣许攸就曾建议，一面与曹兵相持，一面分兵迎取天子，釜底抽薪，以夺曹操之士。如果这一计划实现，官渡之战的胜负就很难说了。可惜的是，袁绍只是相信武力的匹夫，既无雄才，又无奸诈，拒绝了许攸的建议，把这样一位有识之士拱手送与曹操。许攸投奔曹操，献上一份厚礼：袁绍运粮计划。曹操闻听大喜，用计不疑，一把火烧了袁军的粮道，也烧掉了袁绍“南向争天下”的痴梦。官渡之战胜利了，既是奸雄的胜利，又是智勇的胜利，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无确切的界限。根据不同的价值标准，人们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最令曹操背奸贼骂名的事情，就是曹操与汉朝天子的关系。东汉末年，汉室的大权在外戚和宦官手中轮流执掌，两派势力你争我斗，不仅朝政之权旁落，就连皇帝的生死也掌握他们手中。董卓诛灭宦官，废掉少帝刘辩，改立献帝刘协。此时，汉朝皇帝只存一空名，天下人谁都知道，汉祚将尽。曹操以兵劫天子，自为丞相，权倾一朝。到他统一北方后，更是不把汉献帝放在眼中。建安十八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为此，他的重要谋臣荀彧反对，以为天下未定，不可急于放弃天子的名分。“君臣

反目”，荀彧被曹操赐死。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进爵魏王，用天子车服，出入警蹕。

历来许多人都认为曹操有篡汉之心，既然曹操是汉相曹参后人，数代食汉俸禄，就应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谨守臣道。否则就是不忠，即为汉贼。这种说法实在愚腐不堪。汉末大乱，天下人所争夺者，皇位而已。不但曹操有篡汉之心，就是包括袁绍、袁术、孙坚父子等人在内的各家诸侯，谁不心存侥幸，希望打败群雄自立为帝呢？曹操凭借自己的智勇，统一了北方，当然不会将一个早就名存实亡的皇帝寡人放在眼中。我们不当责备一个封建时代的豪杰，因为这样的社会，就是在刺激人们的皇帝欲望。皇帝的尊严，皇帝的权力，皇帝的享受，皇权的世袭，谁人不心向往之？况且，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既然汉家开国者能从其他人手中夺走天下，曹操这样的济世之才，为什么就不能照此办理呢？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国家百姓的贡献上，我们就会觉得曹操可能是汉家奸贼，但却是百姓的功臣。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采取各种措施，使连年战乱的北方，渐渐出现生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经济生产得以恢复。早在建安元年，曹

操就采用下属建议，开始屯田。当时，战争使农业生产受到巨大破坏，灾荒岁起。各地诸侯军队以抢掠百姓，补充军粮的不足。饥民流离失所，甚至出现食人惨状。曹操诗中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象，就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曹操下令，仿效汉武帝屯田之举，在州郡设置田官，招募农民屯田。屯田不仅解决曹操军队的粮食供给，而且缓解了农民的饥苦。这是曹操的重大贡献之一。

此外，曹操还修齐文治，整束军队。建安八年，曹操命令五百户以上的县设置学校官员，选拔年轻学子入校读书，以做官吏后备。在诸侯军队中，曹操的士兵纪律最为严明。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曹操本人善于运用个人形象，以身作则。著名的“割发代罪”的故事，就是曹操权谋的具体应用。

在曹操统治下，北方渐渐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比之东汉末年真有天壤之别。如果用是否利于国计民生的标准衡量，执掌大权的曹操虽无意做汉室忠臣，但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运用个人权威和地位，给天下百姓做了很多好事，真可配治世能臣之称。

不管曹操自立魏公还是进爵魏王，他仍然是汉朝的臣子。在他生前并未篡汉自立，还是

保留了汉献帝的皇位。他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天下未定，东南有孙权，西南有刘备。以曹操的权力而论，取代汉室只是反掌之劳。但他的雄心大志是要做统一国家的君主，并非割据北方的帝王。这也正是曹操“雄”的一面。

曹操之所以被称为“奸雄”，还有一些社会思想的深刻原因。在东汉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受到严重冲击。战争的动乱，生死之无常，开始使人们深入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世界究竟是有常有序的，还是无常无序的？儒家的各种礼法道德，究竟是肯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还是束缚个人的自由发展？魏晋时代的名教之争就反映了这种思想上的犹豫徘徊。玄学的勃兴，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实用主义的权变之术。这也正是人们指责曹操为奸雄的内容之一。

曹操奉行权变之术，只要有助于他平定天下的事他都干，有助于他成就大业的人他都用。在用人之道中，最可看出所谓奸雄的一面。建安十五、十九和二十二年，曹操连下三令，求举贤才。他认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那么很难成就霸业。故而要求各地官员，将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

兵之术者，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种不惜舍弃道德礼法，唯才是举的政策，在正统儒家守道者看来，当然是奸雄行为。可是如果我们了解曹操身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思想的变化，也就不会过分苛求于他了。实际上，正是由于曹操不拘一格地广开才路，使用了各种真正有专长的才人，方能完成开创三分天下有其二的魏国基业。

曹操的奸雄，在今天看来，不过是政治家们的共同品格。以一人之力驾驭天下万众，没有权谋，或叫奸诈是不行的，而仅靠奸诈没有个人雄才更是不行。政治家们既要以不变应万变，坚定自己的目标；又要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这也就是曹操这位奸雄的真正面目。

## （二）儿子、兄长、皇帝

延康元年正月，曹操带着没有统一全国的遗恨病死许昌，他的长子曹丕袭爵魏王。冬十月，魏王曹丕胁迫献帝禅位，终于灭汉自立，做了魏国皇帝。

曹操生前就曾有人劝他废掉汉皇称帝。他的部下陈群、桓阶对他说：

殿下应期，十分天下有其九，以服事

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

大将夏侯惇也说：

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以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

曹操对臣下的劝进不为所动，仍然奉汉献帝为天子。他之所以这样，自有深意存焉。他曾在《自明本志令》中说：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

他举了齐桓晋文以大事小，奉事周室，及乐毅不灭燕国后嗣，蒙恬自杀不反胡亥的例子，说明他并无背叛汉室之心。至于有人要他放弃兵权，他指出：

然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既不肯称帝，又不肯离位，只以掌握实权为满足，难道曹操真的是要做汉室忠臣吗？不然，曹操只是觉得时机未到。此时，曹操最为担心的是中国还存在着两大势力与之抗衡。这便是孙权和刘备。

孙权继承父兄基业，占有江东。刘备乘曹操与袁绍作战之机，南附刘表。经过赤壁一场大战，曹操惨败而归，孙权巩固了江东，刘备乘机占领蜀地，三足鼎立之势已成。如果此时曹操称帝，必将失去“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使孙刘两家得到口实。正是因为汉朝天子的存在，孙刘才没有自立为帝。如果废掉汉献帝，无疑是授人把柄，促成两家的称帝。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曹操就不能以汉天子的名义讨伐孙刘，而是变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了。很明显，如此的政治形势，必然不利于曹操统一天下的计划。因此，当夏侯惇明白了他的用意请他在消灭刘备之后废汉，他便默许了。

曹操果然具有政治家的远见，他以为“施于存政，是亦为政”，只要掌握实权，皇帝的称号并无更大的吸引力。如果果真天命在自己，他宁愿仿效周朝的实际开国者周文王，尽管登上宝座的是自己的后代，但完成帝业的任务由自己承担。

可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无论从政治才干和政治抱负来论，都远逊其父，因此在曹操死后，曹丕便急不可耐地要做皇帝了。

曹丕称帝固然是他不及其父的反映，但也有时势逼迫的原因。曹丕虽然随父征战，也称得上文武全才，但就个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而论，远不及曹操之大。曹操手下文武群臣，对于曹操的畏服，是建立在多年征战与治国基础之上的。而对曹丕，除了因其父的原因继续臣事外，并无更多的关系。因此曹丕一定要尽早确立与这些人的君臣从属关系，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曹丕称帝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此时三分天下的大局已定，魏虽三分天下有其二，但孙吴联合，力量也很强大，特别是经过赤壁大败后，曹魏军队心有余悸，再倾全国之力南下征讨，其势不能。孙权刘备，均为与曹操并起的英雄，其雄才大略，连曹操也刮目相看。曹丕的个人能力，并不足与此二人较量。曹操死后，原本忌惮他的孙刘可以稍松一口气。如果曹丕不尽快确立自己的地位，稳定人心，孙刘很可能发难，到那时，内有不服的群臣，外有敌国的大军，不要说统一大业，就连既得之利益怕也难保。故而曹丕才急忙废汉自立。

曹丕急不可待称帝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他的兄弟们的威胁。

曹丕是曹操的长子，他还有兄弟多人。其中较为出色的是他一母同胞曹植，也就是那位翩翩才子曹子建。曹植少年异才，善为文章，其文采为曹操激赏。曹植门下有许多有才之士，为其羽翼，曹操曾受他们劝说，欲立曹植为太子。后因曹植行动不甚检点，方打消此念，以长子曹丕为王储。曹操死后，曹丕虽袭爵魏王，但曹植等兄弟对他构成潜在的威胁。这并非曹丕的猜忌，因为封建社会的嫡长制必然造成兄弟之间的不和。长子一系可以继承父业，为王为帝，而其他系的儿孙就只能永为臣民。为了争夺皇位，兄弟之间视如寇仇，相互残杀，曹丕不能不为此担心。一旦祸起萧墙，悔之晚矣。故而曹丕必须赶快登上皇位，消除兄弟之间存在的隐患。

作为一名兄长，曹丕多少有些心狠手毒。在他登基后，首先杀掉曹植门下的谋士，随后找个借口，欲治曹植之罪。曹丕以兄弟为题，命曹植七步之内作诗一首，如不成就将赐死，曹植饱含深情写下了著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诗中流露的兄弟之情打动了曹丕，使曹植免于死。这一幕兄弟相煎的悲剧，引起后代的无数感慨。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儒家提倡的孝悌仁义只能是一种社会的道德理想。一旦个人通向权力道路上出现障碍，无论是朋友、兄弟、父子，血缘的关系被政治关系所代替，各种道德观念通通让位给实际的政治考虑。曹丕作为一名兄长可说是不义，但作为一名君王却堪称懂得为君之道。

出于种种原因的考虑，迫于内外形势的压力，曹丕终于坐上了魏国皇帝宝座。作为儿子，他没有乃父的才能和力量，但却借助曹操的势力取得了皇权。作为兄长，他贬杀了曹植诸兄弟，虽落不义之称，却消除了家族内的纷争。作为皇帝，他的文治武功虽比不上曹操，却也有一二点可称之处。

为了稳定中原地区局面，加强魏国内部的统治，魏文帝曹丕建立了新的人才选举制度。东汉时期，选用官吏主要依靠光武帝建立的孝廉制。曹操便是由孝廉出身而为官的。但随着天下分崩离析，察举之途越发混乱不清。魏文帝接受尚书陈群建议，设立九品官人法。所谓九品即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各州郡挑选具识鉴者担任

中正，品评人物，区别高下，以作黜陟。世称的九品中正制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那时起，中经两晋南北朝，我国人才的选拔主要依靠这一制度。品鉴人物，首先要考察该人的家世出身，豪门贵族子弟一般都能得到较高的品级，故而对豪门世家起到了一定的安抚作用。九品中正制对于刚刚篡汉的曹丕来说，无疑是在自己的政治天平上增加了一个很重的砝码！得到豪门大姓的支持，不仅在政治上有了依靠，而且在经济上也收益匪浅。

不过，魏文帝施行的九品中正制，只注重乡里清议，因此这一时期关于人物品鉴的记载特别多，但忽视了人才的实际操作能力。这就与曹操奉行的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注重个人能力的作法相悖。使得许多出身较低而能力较强的人失去进身机会，终魏一朝，人才之盛远逊于曹操时代。到后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九品中正制渐成特权阶层的升官保证。从选拔人才走向扼制人才。及至隋唐，科举制度作为九品中正制的反对者而大盛于世了。

魏文帝深知自己不如曹操，故而着重对内的文治，很少大规模对外兴兵。对于孙刘两家，采取离间之计，各个击破。而此时的孙刘，也因关羽败走麦城被孙权所杀而反目成仇。刘备

兴兵伐吴，被吴军大将陆逊所败，死在白帝城。就在刘备伐吴之时，魏文帝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从中挑拨孙刘关系。刘备军败，蜀国逐渐失去了争锋天下的力量，虽然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力图恢复中原，但强弩之末，已不能成气候了。魏文帝的坐观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

魏文帝曹丕作为一国皇帝，知道自己的长短优劣，善于因时顺势，使魏国独得休整机会。虽然他无力完成其父曹操的统一宏愿，但作为魏国开国之君，还是足以令人称赞的。

### （三）建安风骨至今传

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位君王能使自己的功业与文学创作同时垂名千古如曹氏父子一样。当然，帝王之中舞文弄墨者不在少数，诸如唐后主、宋徽宗等人，文学史上自然也要讲到。但唐后主的亡国之叹，宋徽宗的虏囚之痛，远非曹氏父子敌手。以帝王之雄，表现纵横天下的气派，抒写波澜起伏之人生，助成一代文学生长，舍曹氏父子还有谁人呢？

曹操在其一生戎马生涯中，写下了许多不朽篇什。他的诗雄浑奔放，气度非凡。假如我

们仔细体会，会发现曹操的文学创作与他的政治活动关系至深。在他的作品中蕴涵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一种是对建立不世功勋的追求，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是曹操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的豪迈气概，也是动乱年代有为之士渴望建功立业的真实写照。另一种情绪，是对人生无常，生死相继的感叹。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样二种不同的情绪往往集于同一诗中，相得益彰。这样双重情绪构成了曹操诗歌总体特征，也成为建安风骨的重要内涵。

分析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我们不能不谈及这一时代思想史演变的特点。东汉之后儒家思想日渐式微，佛教东渐，老庄思想抬头，这一切都与政治局势有密切联系。战争的频仍，血与火的洗礼，使人们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谓人的觉醒，是指个体生命的肯定对个人社会价值的追求。既然生命有限，人生无常，就要努力使短暂的人世发出光彩。像曹操这样的命世之才，必然不满足于庸碌一生，他一定要在人生旅途中开辟属于自己也属于后代的不朽事业。这样的思想，反映到文学创作之中，就是超越古人的深沉和气势，也就是一种

风骨。

曹操之后，魏文帝曹丕继承了这一精神，并把文学的地位推向新的高峰。

曹丕武功虽不及其父，但文治胜于曹操。据记载，曹丕很有文学才能，他“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勤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在他统治期间，文士诗人受到很好的礼遇。他本人结交了许多文人朋友，经常与他们一起邀游、诗文唱和。他曾著文论述文学，认为文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如此推重文学，一方面是他偏好此道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曹丕看到文学在表达个人感情，抒发怀抱，描写人生痛苦上的特殊功用。建安文学的发展与曹丕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从建安时代开始，经过两晋南北朝，中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重要转变时期。在这两百多年中，经过几代文学家的努力，中国文学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依附到独立，从不自觉到自觉，文学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在魏晋之前，文学基本上是一种依附于其它门类的艺术形式。先秦诸子的散文虽称文学实为文章博彩。《史》《汉》传统的历史作品，文学性极强，但终究为史书。汉代赋章，渐向文

学转变，然而其歌功颂德之笔，讽世谏君之义，又带有宫廷御用色彩。真正继承《诗》《骚》传统，推而广之为个人创作，表达感情的独立艺术形式，始创于建安时代，汉代诗歌是其先声。曹操四言诗，明显继承《诗经》传统，曹丕曹植兄弟的七言、五言，更为后代古体近律开一先河。以曹氏父子帝王之尊，手自创作，勤于歌咏，其中自有时代风尚的影响。大约在这个时候，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一般的抒情写景，也不仅仅依靠既有之文章格式，而是希望通过文学透视人生，寄怀情思。思想史的发展，政治形势的激变，使文士学人有可能跳出思想的羁绊独立寻找个人的寄托。加上曹氏父子文学天赋甚高，君王倡导于上，文人影响于下，上下相和，流风所及，卒使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开始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在这中间，曹氏父子的推波助澜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曹氏父子的文武兼资，不仅开创曹魏半壁江山，而且助成建安风骨流传至今，真可谓一代英主。

## 四 自相残杀的杨家父子

公元四二〇年至五八一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在这段时间中，南方先后经历宋、齐、梁、陈四朝更迭，北方则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国兴替。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北周权臣隋王杨坚篡夺外孙宇文阐的帝位，建立隋朝。又八年，杨坚次子杨广统率大军，南下征陈，陈后主投降，中国重新归于统一。后来杨广杀死杨坚，做了皇帝，是为隋炀帝。炀帝昏庸无道，奢侈荒淫，激起全国反叛，天下大乱。大业十四年（公元617年），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弑于扬州，隋朝崩析。从杨坚开国到杨广被杀，隋朝只存在了三十七年。与秦始皇一样，杨坚建立的隋王朝也是二世而亡，正应了杜牧《阿房宫赋》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 （一）功过参半的隋文帝

杨坚，弘农华阴人，其先祖为汉代太尉杨震，数代为官，家世显赫。其父杨忠随孝闵帝宇文觉起义于关西，创立北周王朝，因功封为柱国、大司空、隋国公。杨坚本人天资甚高，受父祖之荫，很早便步入仕途。十四岁被辟为功曹，十五岁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二司，封成纪县公，十六岁迁升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可算一位神童。周太祖曾经感叹地称赞他说，“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

南北朝时代，王朝更迭如走马灯一般，北周虽消灭北齐占据北方，但无力统一全国。北周的几代皇帝，多为昏庸无能之辈。特别到宣帝时，更是穷奢极欲，妄行杀戮。宣帝父亲武帝，本来对杨坚深怀猜忌，希望子孙能够有才德，控制朝政，以防杨坚篡权。无奈子孙不肖，不仅无力遏制杨坚的发展，反而为其执掌大权创造了条件。到静帝继位，年幼无知，以外祖父杨坚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揽朝纲，北周王朝完全掌握在杨坚手中。静帝大定元年，以众望所归，下诏禅位杨坚。开皇元年，杨坚即位，是为隋文帝。

隋朝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国家富足，社会安定。经几百年国家分裂的动荡之后，百姓总算得到喘息的机会。隋文帝又执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从事生产的政策，故而隋初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开皇元年，人口不到四百万，平定陈国，人口增加了二百万，到开皇二十年，全国人口已达八百九十万。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内，人口有如此巨大的增长，不能不说是天下太平的结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中，人口的增加意味着政治的稳定和生产力的提高。历代帝王都把这一现象当作自己的功绩加以歌颂。事实上，封建社会动乱与升平，确实可以通过人口的增减得到反映。

隋文帝的统治，从其主流来看确是好的。在他手中，奠定了许多后代遵奉的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隋朝时间虽短，但如同秦朝一样，开创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基业。如果以隋为中国中古史的起点，那么隋文帝的功绩便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例如，隋文帝参照汉魏旧制多有损益，重新设立中央政权的官制。三省六部制把国家大政的决策和执行区分开来。中书省掌命令权，门下省掌驳议权，尚书省掌执行权。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使中央政权内部进一步细化，各司其职，相

互补充、监督。隋文帝的官制改革，是中国封建集权中央机构的又一次变革。其结果是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加强了中央政权的力量。隋朝之后的各个朝代，基本遵循了六部的制度。

在隋文帝的统治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许多功绩，同时也能看到与此相矛盾的隐患。后代往往过分责备二主炀帝的暴政，却不知在文帝统治期间已有衰亡肇端。在文帝的许多治绩背后，潜伏着祸机。

隋文帝积财本领为后世公认。隋朝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积储了大量的粮食，成为历史上储粮最多的王朝之一。文帝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积谷制度。中央的粮食储备已经爆满，于是又在地方设立粮仓。储备粮食原是为灾荒之年使用的，遇有水旱灾年，便应取仓粮赈济百姓。可是隋文帝如同一位吝啬的守财奴，一味大量屯积财富，却不知如何使用。他命令各粮仓，除非皇帝有令，否则不许随便开仓。他所积蓄的财富，不仅成为百姓的重负，而且成为隋炀帝穷奢极欲的凭资。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嘲笑他“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富足本是好事，积财也很必要，但如果忘记财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一味积财自守，那必会促使天下人起而自取，成为众矢之的。而后代子孙据财为非，挥

霍无度，更是败亡的缘由。隋文帝积财而不知如何用财，虽自己厉行节俭，却因此吝啬天下百姓，终启亡国之祸，不能不令人叹息。

隋文帝不但对百姓啬于财物，在朝廷内部及其父子之间也以节俭号令。作为一名封建帝王，节俭本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德，在这方面文帝确有过人之处。在他统治期间，朝廷上下俭朴之风盛行。史称其“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这样的朝风与南北朝以来奢侈浮靡的社会风尚相比，确实是一大进步。隋文帝对自己的儿子们也以此为要求。秦王杨俊因在并州总管任上奢侈纵欲，大修宫室而被文帝免官；越王杨秀亦因奢僭被废为庶人；太子杨勇好声色，宠宫女，渐渐失去文帝及独孤皇后欢心，终被废为庶人。文帝对子孙的严格要求，无疑是许多封建帝王所做不到的。

不过，任何事物总有其双重作用。文帝的节俭本是美德，但如果治理天下仅仅以此为要，选择继承者单单以此为据，那就远远不够了。作为一种个人品格，隋文帝有许多可以赞颂之处，但作为一国君王，更为重要的是留给子孙们可供遵循的治世之法。隋文帝的悲剧恰恰就在于

他过分看重于一些小节，却忽视了千秋基业的大事。无怪后人称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

隋文帝一生中的最大失误便是改立储嗣之举。文帝初以长子杨勇为太子。杨勇为人宽厚诚实，行为没有矫饰。虽然在个人生活中有奢侈之嫌，但不过是一般帝王儿孙的通病。天下承平之际，贵为太子，有声色之好，后宫多蓄美女，实在是极为寻常的事。况且封建制度之下本来就允许皇帝及贵族充分满足个人欲望。一般的官人尚有三妻四妾，何况东宫太子千岁？仅仅由于个人生活的某些问题就废掉国家统治的继承人，足证隋文帝的“不达大体”。

废杨勇而立杨广，也可以看出隋文帝没有知人之明。杨坚的次子杨广，本是一个极善伪装的野心家。他看到杨勇失宠，便投其父母所好，“力行节俭，敬接朝臣，礼极卑屈”，加上有平定陈国的大功，故而取得文帝信任。等到杨广羽翼丰满，隋文帝发现他不轨之心，再要重新召回杨勇托付大事，已经来不及了。隋文帝病重，杨广入宫侍疾，派遣心腹之人行刺于病榻之上，杀父而立，成为千古唾骂的不孝暴君。文帝被杀，虽因杨广所为，但也可以说是他自己托付失所所致。

历史常有极为有趣的巧合。隋文帝终生俭朴，最恨奢侈荒淫，积蓄财宝，务于节用。他因侈靡之罪，废黜储子，选择他认为有自己遗风的儿子杨广为继承人。可杨广却骄奢淫逸，恐怕不仅超过其兄弟，也远在古代今来的暴君之上。文帝积储的遍地财富，不仅供杨广挥霍，而且成了隋末各地起义者的物质凭藉。隋朝兴于文帝，未尝不是亡于文帝。隋炀帝的暴政，未尝与隋文帝无关。《隋书·高祖本纪》史臣论说得好：

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

## （二）暴君的标杆

中国封建王朝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的话是圣旨，无人不遵，皇帝的行动是自由的，没有人能阻拦。可是我们应当知道，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却仅仅是表面现象，在其背后还隐藏着更加深刻的东西。

首先，皇帝号称天子。天子当然高居所有人之上。但既是天子便要服从上天的意志。皇帝诏书常以“奉天承运”开头，明示天道不可

违。天是没有意志的，中国人便把封建制度整体当作天意。一个朝代的兴亡，其实是社会各方势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也包括皇帝个人因素在内。一旦皇帝不能继续平衡各种力量，或是不愿平衡这些力量，等待他的只有二条路，要么被人杀掉，要么拱手让出皇位。可以说皇帝既是最自由的人，又是最受束缚的人。

其次，皇帝的行为也必须遵循某种规范。这些规范是为维持社会秩序而定，也代表了天意。例如，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但只能有一位皇后。皇储的传袭也是传嫡传长。在种种规范之中，皇帝逐渐丧失其个性，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成法。有些个性较强的皇帝不甘受此限制，往往做出十分激烈的反映，其行为荒诞之极，便是昏暴无常的暴君。隋炀帝杨广就是这种人中的典型。

隋炀帝作为暴君的标杆，被后代所唾骂。就其所为，确实为人不齿。但我们如果细致分析，却可以看出炀帝也是悲剧人物，是某种制度的牺牲品。

如果就个人抱负和能力而论，炀帝并非平庸无能的等闲之辈。早在做晋王之时，就曾率领大军平灭南陈。继位之后，更欲有所作为，在他统治期间，先后征服了南越、流求（今台

湾)，降和东突厥，收服吐谷浑，隋朝的疆域扩大，四裔民族也与汉民族和好。隋炀帝曾派人出使西域，决心重建西域交通。炀帝的这些功业，足以追继前烈，只是为其暴君恶名所掩，被人们忽视了。

隋炀帝三次亲征高丽，历来被作为他穷兵黩武的罪证之一。固然，三次用兵，耗费天下人力物力，百姓负担太重，确是一种暴政。但作为具有雄心的皇帝，谁不想建立不世之功？炀帝以天子至尊，多次巡狩北方，亲统大兵征伐，决非一般庸碌之主可比。第三次对高丽的战争，其时天下已乱，炀帝还是迫使高丽国王臣服，也算是了却了炀帝个人的一桩心愿。

隋炀帝个人性格中，本有一种好大喜功的色彩，如果生逢其时，或许会助成他成为盛世雄主。不幸的是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允许他发展这种性格。隋朝建立于数百年的乱世之后，人民所需要的不是天朝大国争霸称雄的气魄，也不是满目繁华的豪盛，而是安居乐业的小康社会。此时人们并不十分需要一位野心勃勃的创业之主，而是需要一位小心谨慎的守成之君，因此，隋炀帝可算生不逢时。

我们不妨拿隋炀帝与汉武帝作一比较。从个人性格特征及野心上看，俩人有许多共同之

处。汉武帝时，开边万里，南抚闽越，北逐匈奴，通西域，降朝鲜，其用兵之频，劳费之巨，不仅不在隋炀帝之下，恐怕远在炀帝之上。汉武帝所修筑的宫室，豪华以极，国内宫殿园林之盛，后世望尘莫及。隋炀帝追求奢华，确曾广筑宫殿，其所修洛阳西苑积翠池，也可称豪华之至。不过如果拿它与汉武帝甘泉宫相比，就不啻是小巫见大巫了。以个人生活而论，汉武帝的骄淫也不下隋炀帝，他的两位皇后失宠被废，宠妃无数，及至晚年，好仙道，喜房中术，纵欲不禁。隋炀帝虽好女色，淫欲妄为，但与正宫肖皇后，仍相守终生。以此而论，隋炀帝也不过如此。

隋炀帝的悲剧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不能为其性格发展提供相应的社会条件。隋代虽经文帝短期安定，但数百年的动荡带给国家的疲惫，决非一朝一夕就能恢复，况且文帝积富政策，仍是百姓的沉重负担，此时的国家，仍然需要继续保持无为而治的清静政治。汉武帝则不然，从刘邦开国，中间经历文景两朝，天下承平既久，百姓受恩复深，故其得以施展雄才，发挥个人好大喜功的性格。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尽管后世也有非议，但终因在他统治期间西汉达到全盛，从而被视为有为之君。相反，几乎亦步亦

趋追寻武帝功业的隋炀帝，却成为暴君的典型。可见，知人论世与知世论人是多么的不易。

我们这样说并非要为炀帝开脱罪名，实际上，隋炀帝的暴政，确实是导致隋王朝覆灭的直接原因。炀帝尽管有种种有力的表现，但其个人品行如同汉武帝一样，并不能令人称赞。以文治武功而论，炀帝也远不能与汉武相比。我们之所以这样分析，是基于一种考虑，应当把皇帝也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要考察他所处的历史环境，要分析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更要理解他的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在他整体活动中的突出影响。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皇帝，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天意”，更主要的是社会各方势力的选择。同样，一个皇帝或是明主或是暴君，也并不完全由他的行为决定。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暴君。特别是当个人与时代发生激烈冲突时，无论普通人抑或皇帝，他的命运往往是悲剧式的。

中国的皇帝一般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创业之主，英明君王；一种是平庸无奇的等闲之辈或略有作为的守成之君；还有一种就是亡国丧命的昏暴之主。这样的分类方法，主要着眼于皇帝的统治效果。当然，我们必须以此为凭评价皇帝，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对

他们的个人特征加以分析。尤其是作为封建制度中的一分子，皇帝失去的自由要比普通人更多。一般的人身处乱世，如不能有所作为，还可以隐居林下，苟全性命。但皇帝就不行，他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亡国丧家，要么力挽狂澜，实际上，皇帝是拿身家性命作赌注，期望侥幸中彩。隋炀帝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发现自己回天乏术，曾对肖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我，但我不失为长城公，你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以炀帝的雄心竟致落得自比亡国的陈后主，可见其辛酸无奈之情。

作为一名皇帝，炀帝杨广所为足以成为后代暴君的标杆，但作为一个个体，他一生享尽荣华富贵，也曾有所作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像杨广这样个性十分鲜明的皇帝并不多见。他的内心痛苦，恐怕比一般人深重得多。杨广曾经引镜自照，叹息道：好头颅谁当砍之！他经过一生苦乐，最后得出结论：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无论暴君明主，最终都离不开人类的生死循环。

### （三）大运河的悲歌

在中国东部，自北而南流过一条人工河流，

这就是大运河。今天，大运河河水枯竭，已不复昔日的繁荣，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怨恨。这条伟大的人工河道，曾经给一个朝代的灭亡灌注了巨大的动力。一位著名的帝王，把自己暴君的名字镌刻在漫长的河道上。

早在隋文帝时代，为了方便漕运，曾下令开凿广通渠。广通渠自首都长安到潼关，是一条重要的内航运输线。隋炀帝杨广继位后，调集大批民夫，开通了西起洛阳，东至淮河的通济渠。通济渠经邗沟流入长江，是大运河的主要部分。在通济渠的基础上，又先后开凿了永济渠、江南河。永济渠引沁水至黄河北入卫水，沟通了北方涿郡，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至此，从北向南绵延五千华里的大运河完成了。

大运河工程的起因有三条，一是经济原因，二是政治原因，三是炀帝个人游玩的原因。

漕运是封建时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运河的重要目的之一。自三国时代，孙权占据江东吴地，经过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历代经营，江南一带日益发达。江南地区的土地条件本来就优于北方，加上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民族发祥之地，开发利用很早，此时土地已有贫瘠之兆。从农业生产上讲，全国重心渐渐转移到江南。北方特别是京畿一带的粮食物资

供应，日益仰赖江南。而南北之间跨江隔河，交通不便，需要有一条方便迅速的运输线。内河运输较陆地运输既经济又便利，因此大运河的开凿就成为必然之事。自隋朝以来，后代许多王朝都在隋运河基础上不断改造，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经济命脉。直到海路漕运兴起，大运河才逐渐失去其重要地位。

不仅在经济上具有重大作用，大运河在政治上也意义巨大。隋文帝开皇九年，杨广统率大军消灭了盘踞江南的陈国，江南地区划归隋朝版图。这是东汉之后第一次全国统一。如前所述，江南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日益成为中心，在政治文化上也开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东晋以来豪门大姓南迁，江南政治日臻成熟，凭借雄厚的经济作后盾，南北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明显变化。江南一带人杰地灵，人才的优势也慢慢显示出来。从区域文化上看，江南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逐步取代中原地区而成为中国的又一个文化中心。为了完成政治上的真正统一，打破南北隔江对峙形成的文化与心理上的隔阂，隋炀帝开凿了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南北相连的大运河，对于人们心理的影响不可低估。农业文明对于水的依赖和恐惧同样大。依靠河流的自然威胁可以在政治上具有震慑力

量。

开凿大运河的第三个起因是为了炀帝南下游玩。这一点历来为人们所注意，渐渐形成这样的观点：大运河几乎就是炀帝追求享乐的产物。不错，江南的六都繁华对隋炀帝这位曾任扬州总管的知情者有极大的吸引力。隋炀帝一生三次南下江都，每次都声势赫赫，威风凛凛。他修建了无比奢华的龙舟，在大运河中浩浩荡荡，一路游玩。大运河为隋炀帝的享受提供了方便条件。

不过，除了游玩享乐外，隋炀帝南下还有其它目的。我们知道，中国自秦以来，政治重心一直在北方，秦朝建都咸阳，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长安地处西北，经常面临边疆少数民族侵扰威胁。洛阳虽地处中原，但北方边塞之虞仍未消除，加之战乱一起，中原便为逐鹿之地。而江南一带物产丰富，土地肥沃，东邻大海并无太大威胁，况且南人性情较北人温和，剽悍之人为少。经过六朝经营，江南发展迅速。隋炀帝既喜南方繁荣之美，而又惧北人为乱之祸，故在第三次下江南时，几乎有意迁都。由此看来，隋炀帝江南之行既有其纵欲享乐的目的，又有其政治上的考虑。

大运河在炀帝生前确曾发挥了它的作用，

不仅源源不断地为北方运输大量的粮食物资，也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流，稳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统一。随炀帝南下江淮，不仅享尽了南方的荣华富贵，也把政治权威播撒到这片富裕的土地之上，传刻在南方人民的心中。大运河水负载着炀帝的龙舟一步步走向人生享乐极点，又一步步走近无底的漩涡。真正应了那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与秦始皇修筑长城一样，大运河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结晶。大运河是在隋炀帝手中完成的，但它决不仅仅属于某一位帝王。在客观上，大运河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起了重大作用，隋炀帝死后，被后人诟骂，但他留下的运河，却默默地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我们今天可以用火车飞机取代航行于运河上的木船，但我们无法用今日的文明代替古代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当初开凿运河死去了无数民夫，人们利用大运河为自己服务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人类文明的创造必须付出人类自身的代价，这种代价使后人享受文明的成果。今天，大运河在我们生活中已无足轻重，但是我们仍然会不时记起曾经帆影点点，碧波荡漾的这条河，因为这是一条历史的河。

## 五 英明皇帝唐太宗

公元六一八年，隋朝二主炀帝在江都被手下大臣杀死，短命的隋王朝彻底瓦解。在中国西北的大都会长安城里，另一位皇帝南面称孤，他就是唐朝的第一任君王高祖李渊。李渊立长子建成为太子，次子世民为秦王，四子元吉为齐王。作为藩王的李世民，虽功勋卓著，但由于嫡长制的限制，并没有继承皇位的可能。一般的皇子至此可能便安居王位，保守荣华富贵以终天年了。但偏偏赶上隋末大乱尚未平息，英气勃发、文武全才的李世民还大有用武之地。况且在推翻隋朝统治，助成其父帝业的战争中，李世民早就表现了他的武略文才，如此功劳焉能位居人下？时隔八年，在六月的一个早上，李世民伏兵玄武门，发动了宫廷政变，亲手杀死自己的兄弟。作为父亲的李渊眼看自己的儿子们相互残杀却无能为力，到李世民夺嫡成功，只得传位于他，自为太上皇。李世民从秦王到皇帝，依靠个人的才能和胆略终于取得天下至尊的地位。李渊虽为唐朝第一个皇帝，其文治武功也颇有值得称道之处，但从唐朝开国前后的整个过程中看，李世民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其父。

因此，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李家父子开创三百年唐朝基业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 （一）明君与直臣

唐太宗李世民在反隋战争及平灭各地割据势力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也在天下百姓和群臣之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加上他手握重兵，身居要职，故而使他在与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在他登基之后，天下基本平定，武力的征伐已退居其次，修明文治成为首要的任务。唐太宗出生在隋朝，经历了隋末动乱，深知隋王朝覆灭的原因，故而励精图治，希望成就天下大治的不朽功业。

我们在考察封建社会治乱兴衰的原由时，往往强调社会政治经济的背景因素，容易忽略作为统治者的封建帝王的个人因素。实际上，封建王朝的统治与作为最高权力者的皇帝关系极为密切。其它王朝可暂不置论，即以隋朝为例，从隋文帝开始，便暴露出皇帝个人决策的种种失误，及至炀帝，行为更加放肆，其昏暴奢淫，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唐太宗亲身经历了隋朝亡覆的过程，因此深以为鉴。他曾不无感慨地说：

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这样的认识，使唐太宗比较清醒地看到皇帝个人与天下百姓之间的关系能否处理妥善，常常决定国家的治乱兴亡。由于对皇帝的作用有较为客观的估计，唐太宗在统治期间比较注意摆正个人的位置。

李世民十八岁随父举兵起义，二十九岁就做了皇帝，尚未到“而立”之年。在此之前，太宗弯弓长剑，戎马生涯，无暇习文读书，其治国治民的经验并不丰富。面对隋末战乱的残局，唐初百废待兴的形势迫使太宗一方面加强自身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只有充分依靠群臣的共治。因此在太宗统治的最初阶段，君臣关系十分良好，从而为贞观之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历来称颂贞观之治的美好，无一不赞扬唐太宗的虚心纳谏。确实，纳谏作为贞观政治的一大特色，是太宗留给后人的重要统治经验。贞观二年，太宗曾向大臣魏征请教明君与暗君之别，魏征意味深长地告诉他，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故而太宗以明君自况，务于兼听。在唐太宗的多次求谏之下，一批著名的谏臣涌现出来，魏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集团中的人，建成被

杀，太宗不计前嫌，继续重用他。魏征以太宗为知己之主，因此“思竭其用，知无不言。”许多政治上以至个人生活中的过失，魏征直言相谏，唐太宗也肯于接受。即使魏征言词激烈，惹得太宗大发雷霆，但事过之后，君臣关系依然不错。魏征曾上疏列举太宗十条“渐不克终”的缺点，由于意见中肯，太宗将其书于屏障，朝夕观阅。太宗对魏征甚至有几分惧怕。有一次，他正在玩耍一只鹞鹰，远远望见魏征走来，因担心魏的批评，急忙将鹞鹰揣进怀中，等魏征走后，太宗掏出一看，鹞鹰已被活活闷死了。魏征死后，太宗十分悲伤。他感叹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呵！太宗对待魏征的态度，可以作为他虚心纳谏的一个例子。

皇帝纳谏，自古有之。历代统治者，为保证自己决策的正确，都曾设立专门机构作为监督和补遗。中国封建社会的言官就是为此而设置的。不过，在唐太宗统治期间，言官的作用发挥得十分充分，而且不仅局限于这些人，诤言直谏几乎成为一种风尚。后代的帝王虽屡有仿效，但都无法与其相比。这确实是太宗的过人之处。

虚心纳谏成为后世衡量封建帝王的重要标准之一，这是唐太宗留下的治世法宝。不过，我们也不可过高估计纳谏的意义。因为纳谏的本身仍然是专制制度的一种表现。皇帝纳谏的目的，也无非是要更好地维护其统治。而且，纳谏往往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这与民主政治有着天壤之别。以唐太宗而论，他在纳谏的同时，也很不情愿。有次退朝回宫，太宗怒气冲冲地叫着：我一定要杀了这个田舍翁。他的长孙皇后问他杀谁，他说：“魏征每廷辱我。”长孙皇后不愧是一位贤内助，深知太宗心理，连忙换朝服以示祝贺。太宗不解，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明故也，妾敢不贺。”一番话说得太宗喜滋滋的，而且解了魏征的围。可见，唐太宗未必愿意他的臣下直言劝谏，但考虑到明君的名誉，不得不屈己从人。

皇帝的纳谏不仅有迫不得已的原因，还受到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在唐代已近定型，各种制度臻于完善。制度化的工作经两汉以来历代王朝的努力已接近完成，无论封建帝王或臣僚官吏，都被固化在封建制度整个链条之上，作为其中的一分子，皇帝的个人才能固然十分重要，不过相对于整

个社会制度而言，整体的力量更为突出。尤其是官僚集团中的上层人物，他们所拥有的权力由制度化的规定，更觉重要，甚至比之于皇帝更能左右国家大局。皇帝与臣属的关系已突破旧式的从属囿限，而表现出祸福与共，治乱同源的特征。唐太宗曾经指出：“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只有“君臣相遇，有同鱼水”，才能共享太平。正是基于对国家治乱以及个人身家性命的考虑，唐太宗才如此虚心纳谏，他的臣子们也才如此劝谏。

谏言和谏臣并无更大的力量来决定国家的大计方针，充其量不过是拾遗补阙。但即使如此，封建帝王也不可能始终保持这一作风。到唐太宗统治后期，个人经验日益充分，个人独断的痕迹暴露无遗。魏征曾列举十条太宗“渐不克终”之处，其中就有这样的话：今陛下骄侈之情日增，又怕臣子劝谏，便以种种理由为借，企图杜谏者之口。事实证明，在魏征死后，太宗以某种借口将他为魏征书写的墓碑砸碎，使这位贞观时代著名的直臣饱受死后之辱。可见，唐太宗的纳谏是出于对个人统治的考虑，并没有根本改变专制制度的本质。

纳谏之风盛行于中国，尽管它是封建制度

的产物，但对后世影响极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虽然在社会制度上已完全不同于封建社会，但在某些作法上仍深受其影响。例如，我们一贯提倡的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带有纳谏的味道。实际上，批评也好，自我批评也好，只是对个人行为的软性约束，不足以保证政策的长期正确与稳定。而一旦个人独断意识膨胀，那么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无能为力了。

明君和直臣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但是，明君和直臣就其产生的条件论，实在是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我们无意贬低唐太宗的为人和政绩，事实上太宗作为封建帝王之中的杰出者，仍然可配明君之称。太宗手下的大臣如魏征等人，都可算封建官吏中的佼佼者。不过，如果只是因为“主明而臣直”，那么“主昏”则臣佞了，君臣一体，相互依存，并不能永远保证社会的稳定繁荣。只有当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在中国彻底建立，才会成为约束当权者的最好机制。而作为一名普通的个人才能真正获得表达个人意见的自由。

## (二) 对读书人优礼有加

中国历代有所作为的帝王无不十分注意处理与读书人的关系，唐太宗也不例外。太宗统治期间，国力强盛，政治清明，不能不说与他妥善处理了与知识阶层的关系，大量重用读书人参与政权统治有关。

隋末天下大乱，各地豪强并起，武力的作用很突出。武人借攻伐战守的功劳在唐初政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崇武轻儒”的风气曾盛行于世。唐太宗继位后，深感武人为官不仅难以适应他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的需要，而且对新兴的唐政权还构成一定的威胁。鉴于这种情况，太宗李世民在用人策略上改变了态度，重点倚靠文人出身的官吏，从而确定了唐初知识阶层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早在李世民为秦王时，就已表现出对于文士的器重。武德四年，李世民开设文学馆，广招英杰才俊，延聘学士十八人，号称十八学士。李世民对这些人优礼有加，引为心腹。史载：李世民把十八人“分为三番，更日值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并且在“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这样

的恩遇对于当时人心向背有着极大影响，十八学士渐渐成为李世民的秦王府智囊团。在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八学士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李世民统治天下的得力助手，其中如房玄龄、杜如晦更是贞观时代的名臣。

李世民做皇帝后，对于人才的渴求更加强烈，不仅对于旧属秦府的官员委以重任，而且广开才路，不避亲仇。过去在与李建成的斗争中，曾有许多人得罪了唐太宗，但他尽释前嫌，用之不疑，贞观名臣如魏征、王珪都曾参与李建成对秦王的谋害，太宗当政后委以重任，虚心下之，以德报怨，化敌为友。

隋末战乱之中，许多读书人隐居岩穴，待价而沽，期望受到明主的礼遇。大量散布在低层的读书人中，有许多卓异之才。太宗本着“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思想，反复要求大臣们举贤荐才。一旦发现人才，太宗都量才授职，使他们各得其所。马周在武德年间只是一位州学校的穷教师，后被太宗发现，破格提拔，一直当到中书令这样的大官。太宗对马周感情甚深，曾说过：我要是几天不见马周，就很想念他。这种态度无疑对广大读书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他们死心塌地地效命于唐王朝。

为了保证人才的选拔有正常的渠道，唐太宗完善了隋朝创立、唐初恢复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考核选举的制度，科举在它刚刚诞生之初确曾发挥过重要作用。魏晋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官吏的人选被豪门大姓、世家子弟所把持，形成“上品无寒门”的局面。广大出身中小地主阶级的读书人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才干，科举制度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制定的。为了使所有读书人都有机会晋身仕途，唐太宗改变了旧的科举制度，每年冬天举行考试，而且还由有人数限制的规定，改为“四时所选，随阙注拟”，不再限定人数。这样，大量的读书人便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凭藉个人才能走上仕途，孔子所谓“学而优则仕”的理论，逐步变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行动了。与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度还是较为公正的。许多一般的读书人，甚至出身穷苦的士子，只要自身努力，是有望进入政权机构的。而且科举制度所要求的知识积累，也为读书人提供了学习的动力。一般而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对于读书人还是比较尊重的，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社会风尚中尊重知识、尊敬读书人，也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的一种积极影响。

唐太宗对于读书人的礼遇，固然出于他作

为封建皇帝的政治需要，但其中也有另外较为深刻隐藏其后的社会历史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士人与政权的关系十分复杂，其特点表现为强烈的政治依附性与精神离心倾向。一般来说，中国的知识阶层缺少专业化的职业特征，无力通过职业劳动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绝大多数人只有通过参与政治，为官为吏获取俸禄。这样就把大多数读书人束缚于政权之中，人身依附的特征十分明显。太宗时科举尚有六项，其中明法、书、算都是专业化很强的科目，但很少有人感兴趣，进士一科属于治国治民才干的考试，及第者往往授以实际的官职，因此很受士人青睐。由此可知读书人是抱定一种为官的愿望参与政权的。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知识阶层又在精神上独立于政治之外，自己坚持一整套传统的士君子价值标准。中国传统读书人往往以帝王师友自居，在直接参加政治的同时，还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理想。所谓的“邦有道则居，邦无道则去”，就是人格独立的一种实际表现。传统观念中“士为知己者死”，既是士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又是给封建君主提出的条件。正是由于这种普遍存在于广大士大夫身上的双重倾向，即政治依附性和人格理想的独立性，使许

多封建帝王在处理同知识阶层的关系时，既要考虑到自己的政治需要，又要照顾读书人的人格尊严，故而往往表现为压制与拉拢相结合，也就是采用“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较好地运用了这一政策。

唐太宗对读书人优礼有加，确实对贞观政治起了很好的作用。不过我们应当看到，太宗的政策使读书人渐渐走上与政权密切结合的道路，从而失去了许多独立地看待人生和社会的宝贵思想。中国封建社会在魏晋时代曾经出现的一丝个性觉醒的光芒，也由于唐太宗的政治手段而趋于泯灭。有唐一代，文学艺术、政治经济都堪称中国历史的高潮期，唯独思想的成就显然与大唐鼎盛的时代不甚匹配。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读书人都被政权收买入仕朝廷，而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思想领域的哲学创造便大音微茫了。

中国封建社会如此地漫长，既是政治社会结构所造成，又与知识阶层有密切关系。作为精英分子的阶层一旦被政治权力所引诱，失去自己独立批判社会的功能，在宦海中浮沉且乐此不疲，那么就很难在推动社会前进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们知道，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其中很大一部分成绩应归功于知识分子

的觉醒与参与。法国革命与卢梭等人的推动有密切关系，一部《社会契约论》，奠定了现代西方自由平等人权的理论基础，而富兰克林更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灵魂人物。可见，知识分子的独立，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唐太宗李世民不愧是一代雄主，他运用各种手段将读书人笼络在自己的周围，既利用了这部分人治理国家的特长，又消除了他们与政权离心力带来的危险，以致后代读书人不仅盛赞太宗时代的清明政治，而且将太宗与读书人的关系理想化，成为梦寐以求的楷模。优礼读书人固然为贞观之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帮助，但也未尝不给后代留下不算小的隐患。唐太宗曾经十分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实际上，中国知识阶层一直就在封建制度这个大“彀”之中，只不过唐太宗技高一筹，让他们自愿地钻进他设下的大网之中，且有鱼水同乐的感觉罢了。

### （三）大唐的胸襟

今天，在西方许多国家中都有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如同用“秦”的音译“支那”来称呼中国一样，“唐人”作为中国人的称呼也在世界

上许多国家通行。今天的中国一改几十年闭关锁国政策，开始把目光集中地投向我们辽远的边界线之外，强劲的西北风把中国刮向东南沿海，借助这股劲风，大批的中国人漂洋过海，向日本，向美国，向能够带来文明与富庶的地方奔去。中国西北地区作为黄土文明的典型地区已被一片落后封闭的阴影笼罩。但是，曾几何时，中国也有过世界中心的兴盛气象，长安古城，也曾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我们的祖先也曾把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唐太宗李世民便创造过这样辉煌灿烂的宏大国威。

唐太宗时代是中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之一。在与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不断发生冲突的同时，太宗采取恩威并重的政策，一方面通过武力征服四裔，另一方面利用汉民族先进的文化成果同化和收降各地少数民族。著名的文成公主和番，便是太宗怀柔政策的典型例证。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的先进文明成果，像汉族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制墨、酿酒、冶金等技术随文成公主进藏，先后在藏族人民中传播开来，促进了西藏地区的发展。公主和亲，自汉代以来就频频出现，有时是由于国力衰落，不得不以此安抚边疆少数

民族；另一方面，为了显示国家的强盛，稳定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公主和亲也带有开放的意义。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对外开放，从根本上说应当是指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外来文明固然是开放的重要含义，而传播自己的文明也正表现出一个民族具有开放的气魄。

除了加强与四周少数民族的关系，唐太宗还开展了与四周邻国的交往。在贞观时代，唐朝首都长安及洛阳、广州等大城市中，各种皮肤，各种口音的外国人屡见不鲜，许多外国人长期居住中国，有些人还与中国人结为夫妻。唐太宗设立了鸿胪寺，专门接待外国使者。许多远隔万里的国家，像今天的印尼、伊朗、阿拉伯，都曾与唐朝书信往还。在丝绸之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驼铃声声，马蹄嗒嗒，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被运往波斯等地，再由那里转运到西方。波斯等地的药材、香料、蔬菜也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中国。唐朝的使臣、僧侣和商人，足迹遍及亚洲各国。我们人人皆知的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就是在太宗时代发生的。

唐朝的先进文明，对东亚各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朝鲜在接收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太宗贞观五年，

日本派遣第一批遣唐使者，从此，遣唐使和留学僧不断来到中国。贞观十九年，日本吸收了太宗实行的均田制、租庸调制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开始了日本历史上意义深远的“大化革新”，建立起完备的封建制度。直到今天，儒学传统的影响在东亚各国仍然十分深刻，以至人们在寻找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原因时，还不得不从接受儒学影响上找寻根据。如果以历史的眼光看，唐朝的对外开放与传播汉文化，未尝不是今天东亚诸强的发达根源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一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君王，而且也是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皇帝。与其他世界史范围著名的帝王相比，唐太宗更具有独特之处。无论是查理大帝还是亚历山大，他们的功业是建立在向外扩张，以武力征服世界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建立的大帝国虽幅员广阔，横跨欧亚，但时间之短暂，统治之不稳，都无法与唐代相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亚大帝国的君主们的功业是建立一种武力强权的形象，以掠夺破坏为能事，而唐太宗是以远来近服，战胜于朝廷为自己统治的特色。人类文明的发展，固然有许多是以武力为媒介得以成熟的，但更为适于人类自身需要的却是通过和平的使者播种文明的种子。我们固然可以把世界

当作一个大家庭来看待，但在这个大家庭中，仍然有各式各样的小家庭，每个家庭由于个性的不同，都可以通过自己特殊的方式达到各自的繁荣。如果我们应当承认每个人都具有个性，那么我们也应当允许每个民族都具有特点。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没有勇气与外界交流的民族，封建社会后期的闭关自守自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我们不能注意到封闭的时代而忘记我们曾有过走向世界的过去。开放意味着中国人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要走进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具有盛唐时那种自信心和气魄，能否使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从而产生足以与外界交流的力量！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对外吸收和索要，而忽视我们自身的建设与民族个性的培养，那么我们很有可能既无法真正学到外来的先进东西，同时也不会肩负起中国对世界所应承担的责任。还是想一想唐太宗时代的大唐帝国吧，回顾历史固然有妄自尊大或是自我陶醉的危险，但数典忘祖，妄自菲薄，难道就没有丧失民族意识、自信心崩溃的危险吗！真正的忧患意识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客观认识和清醒分析之上的，忧患与自信并不矛盾，没有充满自信与自豪感的民族，是无力担负建设未来重任的。

## 六 查理和查理曼帝国

就在唐朝成为世界东方文明的中心之时，在西欧则崛起了一个强大的查理曼帝国。这个帝国的缔造者就是查理大帝（768—814 在位）。查理曼帝国的疆域几乎囊括了西欧大部分地区。查理曼帝国的建立，对欧洲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的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三国的形成史都和查理曼帝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查理大帝的功业非凡，在欧洲对查理大帝的传说很多，几乎把他塑造成了一个神话人物，一个神圣的人物。其同时人为查理大帝所写的传记流传下来的抄本就有六十部之多，足见查理和查理曼帝国在欧洲人心目中有着怎样的地位了。这和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谈论唐朝和唐太宗功业的情况是几乎相同的。

查理真是一个神圣的人物吗？恩格斯曾对查理的功业评说道：“在占领高卢时构成了全部

法兰克人中的普通的自由人等级消灭了，人民分裂为大土地占有主、臣仆和农奴，这就是查理为取得他的新罗马帝国所付出的代价。随着普通的自由人的消灭，旧的军事制度瓦解了，随着两者的消灭，王权也崩溃了。查理把他自身统治的唯一基础破坏了。他还能勉强维持下去，可是一到了他的后继者们的手里，实际上由他亲手造成的东西，却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查理曼帝国随着查理的死去也就分崩离析了。但是查理大帝和查理曼帝国在欧洲史上却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 （一）席卷西欧的战争旋风

查理曼帝国虽然是由查理一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有条件建立这样一个大帝国，这不得不从他的父亲说起。查理的父亲丕平原是法兰克人墨洛温王朝的希尔德里克国王的宫相。所谓宫相即王宫总管，管理宫廷一切事物，本来权力有限。但到丕平时，则不仅管理宫廷内部事物，且把王朝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手。因为从丕平的祖父、父亲就一直担任宫相的职务，他们家族曾为国王争夺王位立有大功。而到丕平时，他并不甘心只担任宫相和臣

子，在七五一年丕平竟废掉了国王希尔德里克，将希尔德里克幽禁到修道院里，而丕平自己担任了国王，建立了新的加洛林王朝。此时其国土有限，丕平野心勃勃希望扩大疆域，在他登上王位十五年之间，就打了十来年仗，但是收效并不显著，他怀着遗恨病死在巴黎。他的遗愿正是由儿子查理来实现的。

查理是加洛林王朝的第二代国王，但是真正开拓了疆域，建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君主则实际上应是查理。这和强大的唐朝开国历史极有相似之处。唐代第一个皇帝是李渊，但真正打下唐代疆域和强盛局面的人物则是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不是长子，他登上帝位是经过了一场斗争的。同样丕平也不是只有一个儿子查理，查理还有一个七弟卡洛曼。按照当时规定查理和卡洛曼要平分国土，兄弟之间的战争如箭在弦上，只是由于卡洛曼很快病死，查理才成了唯一的国君。

查理当上国君之后就开始行使他的扩张领土的计划。他统治的四十六年之内，曾进行过五十多次战争。可以说查理一生都在征战，他把战争的旋风席卷了整个西欧、北欧。他征战不像他的父亲那么宽和，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他一定要使被征服者投降臣服才肯甘休。

他不怕任何艰难困苦，高入云端的阿尔卑斯山，杳无人烟的山峦都不曾使他退却；波浪翻滚的波罗的海、地中海也不曾使他畏惧。他强化陆军，建立海军，东西南北四面出击。他以坚定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仅萨克森战争就从七七二年一直打到八〇四年，连续了三十二年才把萨克森征服，使萨克森人抛弃了本族的宗教，皈依于基督教，和法兰克人融合为一个民族。查理进行战争常是几条战线同时并进。在三十多年的艰苦的萨克森战争进行中间，他还更早地发动了对意大利的进攻。不过意大利战争结束得早一些，然而那里战争一结束，他就又派兵跨越比利牛斯山进攻西班牙了。他又发动了巴伐利亚战争，对斯拉夫人的战争，对匈奴人和阿瓦尔人的战争。在萨克森战争结束后，他又对波希米亚、卢内堡和丹麦发动了战争。在这些频繁的战争中，艾因哈德——查理大帝的宠臣在他的《查理大帝传》中写道：查理“无论在哪一次战争里，尽管条件艰苦，也从未订过停战协定。因为这位国王，这位在当时统治世界各国的诸王中最英明、最高尚的国王，从不因为所需要付出的辛劳而拒绝承担或从事任何事业，也从不因为害怕危险而退缩。”正是通过这些胜利的大大小小的战争，

通过战争的掠夺，使得法兰克富足了起来，使得法兰克的国土扩充了一倍。一个强大的查理曼帝国就在战争的胜利中建立起来了。

查理刚继位时，他的国土只限于莱茵河、卢瓦尔河和地中海以西所环绕的地区，还有莱茵河和萨尔河所围绕的地方，但是查理曼帝国却包容了比利牛斯山直至埃布罗河的西班牙地区、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山的意大利全部，另外向东包容了萨克森、多瑙河流域。战争是残酷的，有许多的流血和牺牲，但是查理在战争的血泊里所建立起的大帝国加速了欧洲各民族的融合和交流。他的战争摧毁了奴隶制王国和部落的一个个碉堡，加速了欧洲封建化过程的急剧进行。奴隶主统治被打碎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被确立了。虽然不能说查理曼帝国在封建制社会的强大和兴盛方面能和唐朝相比，但是或者可以和秦朝相比并吧。查理大帝在欧洲发展史上的功绩自不可抹煞。

## （二）频繁的民族友好往来

统一的大帝国把四分五裂的西欧变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强大又足以震慑当时世界上其他强国。以游牧为主的匈奴人不仅骚扰秦

汉隋唐，而且也不断掠夺欧洲。正如汉唐抵御了匈奴的入侵，查理也以其强大的武力征服了强悍的匈奴。强国之间互是对手，在不能彼此吞并的情况下，就形成了互相往来。这种往来就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和发展。

查理派遣使者到过君士坦丁堡。查理同阿拉伯帝国的国王诃论建立了友好关系。诃论还派使者到法兰克，送给了查理大量礼物，特别是把他喜爱的一头大象也送给了查理。在这当中流传下不少有关使者机敏的故事。如查理使者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贵宾的礼遇，可是使者不知那里宴会有一种规定：对于菜肴只能吃上面的部分，比如鱼不能吃完上面再翻个吃下面。使者不懂这风俗，他看一条鱼吃完了上面，就把鱼翻了一个身，还招呼大家吃。不料当时在场的显贵们一起站立高喊：“陛下，他这是有意侮辱您！”国王叹息了一声，对使者说：“你必须立即被处死。但你可向我请求任何你所希望得到的恩惠。”使者突然遭到这种变故，他略想了想对国王说：“皇帝陛下，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国王说：“你说吧，我一定满足你。只是不能给你生命。”使者缓缓看了一眼在场的显贵说：“陛下，我只求您挖去看见我转翻那条鱼

的人的眼睛。”国王大吃一惊，他马上宣布他什么也没看见，只是听别人说。王后也赶紧说她也没看见。其他显贵们也都争先恐后地嚷叫：“我没看见，”“我也没看见！”既然谁都没看见使者翻转那条鱼，罪名也就不能成立了。

希腊的使臣们也曾到查理帝国，由于希腊使臣的傲慢，查理先叫人引导这些使臣在山脉和沙漠中穿行，直到使者钱也花光，衣服也磨破时，才领他们进到都城，而一个个高贵华装的官吏们都高坐在上，使希腊使者每见一个都以为是查理大帝。折腾了许久，希腊使者的傲气已经打尽，查理才满身宝气珠光地接待了使者。从此他们再也不敢小瞧查理帝国了。

波斯王国的使臣们也曾到查理帝国，他们遭到了与希腊使臣同样的戏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威震全球，可是当他们倍受挫折才见到查理时，他们才想到能被查理接见才是一种特殊的礼遇。但是这些波斯使臣也够聪明的，在宴会上他们对查理说：“我们波斯人对您比对诃论还要敬惧。希腊人、马其顿人也一样。我们一路经过的地方莫不如此。可是您本国的贵族却只有当您的面才敬重您，其实他们是不尊重您的。”查理问何以证明。使者说：“我们作为您的客人远道而来，各地方贵族并不把我们看重。

我们想尽快见到您，给您送上诃论的礼物，他们一点不理睬，他们不是瞧不起我们，实在是不把您放眼里呀。”查理当即大怒，按使臣们所提供的名单，把那些地方官一一进行了处罚。经过这种较量，希腊、波斯与查理帝国往来就更频繁了。希腊的风琴，波斯的香料都传到了欧洲大陆。

另外阿非利加人的使者送来了狮子、狗熊，还带来了西班牙的铁和颜料，查理也把欧洲的谷物、油、酒作为礼物回赠给阿非利加。不仅当时世界的强国和查理帝国有友好往来，就是一些小国也纷纷派遣使者到查理曼。当然由于这些小国势单力弱，他们的使者到查理曼总是要卑躬谦和地称颂查理大帝。如伊比里亚半岛的加利尼西亚和阿斯图里卡的国王阿尔德丰苏斯的使臣总是称他们的国王是法兰克国王的人臣，苏格兰国王的使臣总是称他们国王是查理顺从的仆人。由于这些小国不敢傲视查理帝国，查理对这些小国的使臣反而比对波斯、希腊等强国的使臣在态度上更加友好，彼此关系更为密切。故而艾因哈德称查理“他非常喜好外国的来客，并且花费很大的力量招待他们。外宾数目之多，可以公正地看作不仅是宫廷的负担，而且成为整个国家的负担了。但是出于一贯的

高尚精神，他不大注意这种费用。因为在他看来，与上述行为俱来的慷慨的令名盛誉，对于哪怕是严重的不利都足以补偿。”

查理的这种作为表现了一种大国风度，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赞誉。查理帝国和大唐帝国实际上已成为当时世界上两大文明中心。欧洲诸国朝拜查理帝国就如同亚洲诸国朝拜大唐帝国一样。这种文明中心的建立促使了世界性的文化交往，加强了各民族的友好往来。而位于欧亚之间的阿拉伯帝国则成为东西交通的桥梁。在中世纪的欧亚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国际间的交往和贸易是频繁的，虽然这中间伴随着战争和掠夺，但也不乏友好往来。

### （三）查理大帝的复杂性格

查理大帝一生都在征战中度过，他具有高度的权势欲和崇高的威严。后世据此便把查理描绘成了一个神圣的人，一个与凡人不同的圣贤，好像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非常庄严的，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的，是神秘莫测的。历经患难查理不死，乃是天的意志。好像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普通的人们也往往相信这一点：伟人总是伟人，他们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其实从了

解查理的同时代人来看，查理也并不神秘。

查理的衣着是经常穿着本民族的法兰克人的简朴服装，衬衣衬裤全是麻布的。他在普通的日子，服装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只有在接见外国使节和重大节日里他才穿上盛装。他饮食有节制，憎恶酗酒，平时只吃四个菜，并不像某些中国皇帝的御膳那么丰盛。

查理并不是生而知之的圣贤，他的学识是从学习中得来的。他不畏艰苦地学习外族语言，他的拉丁语说得就和本民族语一样流利，对希腊文他也能够通晓。他对于有文化知识的人极为敬重。他就像秦始皇初期一样任用各国有才干的人，肯于拜他们为老师，虚心向他们求教。七七四年查理远征意大利时，将意大利著名的学者彼得等人带回法兰克，让彼得为他管理教会学校，他则亲自向彼得学习文法。而来自不列颠的撒克逊族的学者阿尔昆，查理对其更是毕恭毕敬。他向阿尔昆学习修辞学、辩论术，特别是天文学、数学，他还亲自观察星辰的运转。他对于书法学习更是刻苦，常常把练习写字的纸张带在身边，放在卧榻的枕下，一有空闲就练习。他曾记录古代征战的歌谣，试图编写本民族语言的文法书。他不仅自己学习，而且希望全国都有一种探求学问的风气。他曾为自己

时代的文风比不上古罗马、古希腊而忧郁不安，他曾对阿尔昆说：“但愿我有十二个像耶罗姆和奥古斯丁那样在各门学问上精通，又受过全面训练的教士。”（耶罗姆是公元四世纪时基督教会的著名学者；奥古斯丁是公元四世纪时著名的教会作家。）

他热心办学，曾经有这样一件有趣的事：两个不列颠人在市场上高叫，“嗨，谁要需求知识，请靠近来，从我们的手上领取，因为我们出售的就是知识。”人们以为这是两个疯子，有人把这事传给了查理。喜爱追求知识的查理却下令立刻请这两个人，问他们要什么代价。这两人说：“我们不要任何代价，只要有一个适当的地方来讲学和要一些有明快头脑的人来受业。另外就是要有食物吃，有衣服穿就可以了。”查理很高兴，就叫一个学者在高卢办学，叫另一个到意大利办学。他并且还亲自检查学生们的学业。他并不因为学生们的出身门第而原谅那些出身高学业不好的子弟。对于那些出身低微而学习成绩很好的人，他说：“我将赐给你们主教管区和华丽的修道院。你们在我的眼睛里永远是光荣的。”他对那些学习不好的人说：“你们这些贵族，这帮大官们的少爷，你们这群超等的花花公子，你们仗着出身、财产、地位，你

们忽视学问，你们恣纵奢侈和嬉戏，沉溺于游手好闲和玩乐。”他斥责他们：“上帝在上，我比不上你们高贵的出身和漂亮的仪表，除非你们奋发读书，弥补从前的怠惰，你们永远不会得到查理的任何恩宠！”

查理在用人上的确也是不计较出身和名位的。有一个主教死了，很多达官显贵的友人都想谋求主教的职位，连皇后也来托关系，请求把主教位置让给她熟悉的教士。查理却选定了他认为有能力的一个宫廷不知名的教士为主教。对于那些矜于地位好虚荣的人，查理总是给予必要的警告。有这样一件很有趣的事：

查理得知一个主教过分追求虚荣，就想警告他一下。

一个犹太商人抓住一只老鼠，把老鼠体内填满了香料，然后向那位好虚荣的主教兜售。他说他那老鼠是稀世奇珍，是从外国带来的。主教很高兴，答应出三磅银子买那只老鼠。犹太商却说：“这么贵重的奇珍，我宁愿把它扔到海里，也不允许任何人以如此低的价钱买到它。”这个从来不肯济贫的吝啬主教马上出十磅银子，犹太商还是不卖，用贵重的绸巾裹住老鼠装做要走的样子。主教真以为这是无价之宝，马上出了巨量银子买下了那一“奇珍”。然后这位

主教把那老鼠献给了查理。几天后查理召开首脑会议，叫犹太商把银子放在宫殿中间，他说：“主教们，长老们，你们应帮助穷人，或确切说，应帮助附在穷人身上的基督，而不该追求浮华。但是看吧，有的主教却又虚荣又贪婪，为一只老鼠，就把这么多银子给了一个犹太人。”那位主教此时才知他买的是一只老鼠，他跪在查理脚下，叩头求饶……

查理有一次听一个主教宣讲，当时有一个毒蜘蛛从天花板上坠落下来，在主教头上结丝，由于主教面对皇帝讲经，他不敢用手把蜘蛛抓走，只是忍着奇痒讲完了，但当他离开教堂时，脸都肿了，一小时后便死了。当时查理知道主教死于毒蜘蛛的咬伤，他很难过，因为他看到了那个蜘蛛在主教头上爬，但他不知是毒的，也没有打断主教讲述，结果发生了不幸。查理就认为自己犯了杀人罪，公开做了忏悔。

查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每年要向教堂输送大量金银、宝石，并不断地装修教堂。他曾自己出资在他的家乡兴建一座辉煌的教堂，而查理死后由于没有遗嘱，人们就把他的遗体安放在这座他亲自修建的教堂里了。他的坟上树立了一座镀金的拱门，上面有他的雕像和铭文。铭文这样写道：

在这座坟墓之下，安息着伟大的信奉正统宗教的皇帝查理。他崇高地扩大了法兰克人的国家，隍盛地统治了四十七年，他逝世时年逾七十，时值我们主的第八百十四年，即小纪之第七年（小纪为西欧中世纪纪年单位，十五年为一小纪，从三一二年九月起始。八一四年即第三十四小纪第七年），二月朔日的前五天。

查理开创了查理曼帝国，在欧洲史上留下了他的不平凡的业绩。他有三个儿子，有两个死得比查理还早。路易继承了帝位。路易的三个儿子却没有能保持帝国的统一，他们为争帝位，互相攻打，于八四三年订立凡尔登条约，三分帝国，形成了东方的德意志、中部的意大利和西方的法兰西，这就是今天德、意、法之国的雏形。至于以后德意志帝国奥托一世征服意大利，于九六二年建立神圣罗马帝国，则又使欧洲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 七 善弄权术的宋太祖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正当周恭帝和大臣们欢渡新春佳节的时候，边报告知北汉和契丹联合向后周进犯了。谁也不知军情，周恭帝只好听丞相建议叫赵匡胤出兵，将全部军权交给了赵匡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赵匡胤玩的政变把戏。赵匡胤到了陈桥驿不去迎战什么来犯之敌，却回师向京城开封，迫使周恭帝退位，当上了北宋朝的开国皇帝。

### （一）陈桥兵变的真相

中国封建王朝以汉、唐、宋、明、清统治时期较长。这几个朝代的开国皇帝多是借助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了旧王朝，然后由他们又建立起一个新王朝，诸如刘邦、李渊和李世民、朱元璋等莫不如此。就是清朝的开国皇帝也是在李自成起义推翻了明王朝的基础上才建

立起他的统治王朝的。这其中唯独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建国立朝很独特，他是靠兵变当上了开国皇帝的。

赵匡胤本是后周王朝皇廷禁军的最高统帅，官任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尉，又兼归德节度使，手中掌握着军事实权。后周显德六年（959年）雄心勃勃的后周皇帝柴荣去世，他的年方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当上了小皇帝。手中掌握军事实权的赵匡胤如果是一个忠心耿耿、知恩必报的护国大臣，那末他将会保护幼主，维护后周的天下。如果他这么做，或许他就是周公旦再世了。事实上赵匡胤是一个野心家，他因得遇柴荣而仕宦显达，大权在握，柴荣在世，他的野心不敢暴露，反而因他的谦恭忠诚取得了柴荣的信任。本来任殿前都点检之职，掌握禁军实权的是张永德，可是有“点检作天子”的谣传，柴荣就疑心张永德，以赵匡胤代之。柴荣万没想到恰恰是这个赵匡胤时刻在觊觎着帝位。

经过周密的策谋，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赵匡胤终于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当上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兵变夺权当皇帝似乎是不光彩的，所以正统的史书向来为皇帝讳，不言赵匡胤的阴谋野心，却道是众军士

拥戴赵匡胤，强迫他黄袍加身当了皇帝，赵匡胤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真是欺骗小孩子的谎言。不过赵匡胤既然事实上已当了皇帝，谁又去捅马蜂窝找麻烦呢。

《宋史》是这样记载陈桥兵变的：

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即赵匡胤，赵匡胤之弟）入白太祖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

就从这短短的记载中明眼人也能看出陈桥兵变是一种有预谋的行动。幼主当国，外敌入侵，如果赵匡胤没有当皇帝的预谋，他也应当劝导军士御敌保国。事实上为了发动兵变，赵匡胤先做了舆论准备，苗训的那一套鬼话，很可能就是赵匡胤的指使。至于军士聚集，其首领乃系赵匡胤的亲信和弟兄，诸军校露刃于庭胁迫赵匡胤为天子则纯粹是作戏。至黄袍加身

赵匡胤乃说“我有号令，尔能从乎？”正暴露了他对自己所导演的这一幕闹剧该怎样收场，是早已胸有成竹的。所以一旦黄袍加身他就再不去管什么御敌，反而奔回京城，急于登基称帝了。称帝之后他对陈桥兵变中那些拥戴他的亲信和将领都视为有功之臣，如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等人，他都一一加官晋爵，给了封赏。对于他的兄弟赵匡义和军师赵普则待遇更加优厚，一个做了殿前都虞侯，一个做了枢密直学士。因为他在当皇帝前曾兼任宋州归德节度使，所以他当皇帝后就定国号为宋。这一切都是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的，怎么能说赵匡胤没有预谋呢？

诚然，以兵变、政变夺取政权当上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赵匡胤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在世界历史上以这种手段夺取政权，掌管国政的帝王、总统们也有的是。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能够用兵变手段取得政权，建立新的朝代，并使一个朝代能延续几百年之久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当是绝无仅有之人。像这样的人在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出几个。为什么赵匡胤兵变夺权能够避免短命皇帝的厄运？这除了当时社会在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情况下，人心思治，人心希望统一的客观条件，还主要在于赵匡胤能

够老谋深算，善弄权术。

过去的兵变、政变的篡权者，往往一上台就大行杀戮，以排除异己，稳固自己的地位，或大力推行新政，将过去的一切全部推翻，以表明自己的高明和有所作为。其结果往往立脚不稳，便四面树敌，人心还未归拢，便众叛亲离。赵匡胤不同于以往那些目光短浅的兵变者，他正是从那些人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知道他的天下不是靠他一枪一刀打下来的，他当了皇帝首要的工作就是要争取各方的支持。所以他除了封赏那些有拥立之功的将帅、大臣之外，对于后周旧有的王公大臣，他一一采取了安抚政策，凡是不公开反对他的，他都给以优礼相加，这就稳住了他的阵脚，减少了反对他的敌人。就是对于后周的小皇帝也仍然封他为郑王，封小皇帝的母亲依然为太后。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大行杀戮，那末后周的一些“忠臣义士”必然会群起而攻击，赵匡胤怕也未必能坐稳江山。当然，就是赵匡胤如此做了，也仍然有人反对他，如山西的李筠，江苏的李重进就不甘心对赵匡胤称臣。但这毕竟是少数人，在赵匡胤的大军攻击下，李筠、李重进都先后兵败自杀，原先后周的全部天下也就成了赵匡胤的大宋天下。由于赵匡胤坐稳了江山，陈桥兵变、黄袍

加身似乎也成为历史美谈。然而，假若赵匡胤的皇帝位子没坐长久，人们对陈桥兵变恐怕就将别有议论了吧？

常言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对于皇帝开国的功过，自然也不应仅从其所建立的朝代历时有多久来评价。无论怎样讲，陈桥兵变也是一种篡权、夺权的行为，是一种阴谋行径。赵匡胤靠这种手段当上了开国皇帝也总是不光彩的皇帝。也正因此如此，赵匡胤才时时忐忑不安，唯恐他的臣僚模仿他的榜样，也来一次什么兵变。所以他当皇帝起，就加紧了内部防范，对于外寇的入侵倒比较的不放在了心上。有这么一位开国皇帝，他的子子孙孙，无论北宋、南宋的历代皇帝们在对外政策上也就都表现得十分懦弱，一代又一代皇帝连连对外议和、割地、赔款、朝贡。由赵匡胤所开创的大宋王朝已失去了汉唐的气魄。宋朝的皇帝们为了能保住自己的皇帝位置，是能忍就忍，能让就让，他们毫无进取之心，毫无强国之志。翻开大宋王朝的历史，一页页读下去，几乎历朝历代都是小人当道，奸佞掌权，正直忠良之士受压，爱国抗敌之将受戮。宋朝的君主几乎找不到一个有雄心壮志之人。他们不是平平庸庸、浑浑噩噩，就是贪生怕死、只会玩乐。对于人民，对于内部，

他们一压再压，唯恐内部发生变乱。宋代理学大兴，正是适应这种朝代特点的产物。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朝已经开始走向了下坡路，赵匡胤就是这下坡路的一个引头人。

## （二）巧妙的杯酒释兵权

大凡皇帝都是猜忌心极重的人，他们称孤道寡无不谓世间真龙天子只有一人而已。但是皇帝既要统治人民，治理国家，他就不得不任用官吏，不得不给官吏一定的权限，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奖功罚过的措施。当官吏们的才干卓越、功劳卓著时，皇帝往往就会猜疑这些官吏是否怀有贰心，这时若再有一些佞臣小人在皇帝耳根进些谗言，那些才华横溢的官吏和功勋卓越的将帅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天外横祸飞来。历代的名臣显宦多有悲惨凄凉的结局，其原因就在于此。故而聪敏的张良功成告退，贪功受害的韩信感叹“狡兔尽，良弓藏”，人们总结出“伴君如伴虎”，与帝王只可同贫贱不可同富贵的深刻教训。

赵匡胤以兵变的手段夺取了后周的政权，他的内心是十分恐惧的。他最怕他的手下也对他照方吃药，所以他对于官吏，特别是握有兵

权的武将猜疑尤深。他未及那些武将功勋卓立时，就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在他当上皇帝第三年就对曾拥戴他当皇帝的那些握有军事大权的将领们演出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把戏。

《宋史》石守信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

像石守信等当初曾以武力支持赵匡胤兵变的人一一都被解职，因为赵匡胤没有把这些有功之臣一个个杀戮，反而给他们优厚的待遇，让他们颐养天年，对于赵匡胤这一“杯酒释兵权”的狡诈行为，还有不少人称颂，实际上只不过赵匡胤更善于玩弄权术而已。这些武将都

手握重兵，各有羽翼，赵匡胤杀了这些人，却并不能将他们的羽翼全部杀光。况且他只是刚登帝位，他需要的是笼络人心，聚集实力，他以“和平”的“机智”手段，使这些将领们“自动”放弃兵权，这些将领的部下没有理由反对他，同时又将都受他的管辖，这一“杯酒释兵权”的策略不谓不高。但是赵匡胤终不能一人带领全国各地的军队，国家也不能没有军队。赵匡胤不敢把兵权交给能征善战的武将，他就改用了文官治军的办法。他叫文臣做各地的长官，掌管军事，而节度使则成了有名无实的虚衔。石守信等人被解除兵权后就被派到各地方当了有职无权的节度使。文官掌管军事，文臣代替武将，只懂笔墨而不懂治军的人带兵打仗顶多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试想这样的治国策略还能够有强兵卫国吗？俗语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那末文弱书生手下怎么能使军队有强大的战斗力呢？这就难怪宋朝一代只是文治兴隆，而武治却十分衰弱了。宋朝不仅不能像汉唐那样开拓疆域，甚至连自己本土也守卫不住，这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就已经种下了宋朝一代必定是在强敌面前屈辱求和的苗子。

由赵匡胤所决定的文臣治国的策略，贯穿北宋、南宋，宋代的将帅皆受到文臣的辖治。因

此宋朝的防卫力量极其薄弱，汉唐们奠定的疆域，到宋朝时已大大缩小。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实际形成了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辽、夏、金王朝纷纷兴起，他们不断和宋王朝发生战争纠纷，而每一次几乎都以宋王朝失利而告终。一〇〇四年辽宋大战，宋名相寇准主战，宋真宗被迫亲征，宋军自卫反击，作战勇猛，获取了大胜，然而宋真宗却无心抵敌，恐怕他也像乃祖赵匡胤一样，不愿军帅在对敌战斗中建立奇功吧，竟以送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条件，使失败的辽军获利而退。一〇四四年西夏与宋大战，宋仁宗依样画葫芦，满足于西夏国主对宋称臣，可宋却要给西夏岁币七万多两、绢十五万多匹。金宋大战，宋已无力抵御，也无心抵御，主战派李纲虽有保卫京城之功，但仍然被撤职。软弱的文官也只求保住个人的私利，他们向金投降，随着宋徽钦二帝被金人掠走，北宋王朝便宣告灭亡。南宋虽有抗金名将岳飞，但他受文官秦桧的掣肘，终于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死，因为宋高宗根本就无心恢复失地。

历来称宋代是爱国主义高涨的时期。宋代出现了像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出现了像陆游、辛弃疾等爱国诗人。岳飞的《满江红》，

文天祥的《正气歌》，陆游的《书愤》、《示儿》诗，辛弃疾的《水龙吟》、《摸鱼儿》词的确都慷慨激昂，可是它们却和唐代的建功立业、报效边疆的爱国主义作品有绝不相同的内容。唐代的是一种民族自豪感，宋代的则是一种民族屈辱感。而造成民族屈辱的罪魁祸首就是赵匡胤，是赵匡胤的文官治国的政策，是他的对武将不敢信任的政策。

赵匡胤不给地方武官以兵权的同时却对中央所属的禁军实力大大加强。他从各地方军队中挑选精壮强悍的步卒充当禁军，十万禁军守京城，十万禁军守卫外郡，外郡的禁军定期换防，防止他们地方化，防止形成新的军阀，掌管禁军的大权全由赵匡胤一人独揽。赵匡胤是深深懂得枪杆子后面出政权的道理啊！他同时又派出转运使监察各地官吏，掌管各地财政收入。军权、政权、财权赵匡胤都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里，这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集权皇帝，是一个心计甚深的皇帝。

### （三）卧榻之侧难容他人

作为开国皇帝一般都不是庸常之辈，赵匡胤虽然不是凭着战场厮杀打下的江山，但是他

也不是靠着祖宗留给他的皇位当上开国皇帝的。历史上凭借发动政变、兵变当上皇帝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建立的都是短命王朝罢了。赵匡胤能当上开国皇帝，并使他建立起来的宋朝能够传位三百余年，这本身说明赵匡胤也很不简单。尽管他所建立的宋王朝是懦弱的，在版图上比不上汉唐，也比不上元明清，但是这毕竟是一代王朝，历史也将永载他的功勋。这功勋就是他结束了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使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分裂之后再次走向了统一。赵匡胤的善弄权术是为他的统一大业服务的。他的杯酒释兵权的狡猾也好，他的运用文臣治军治政也好，他的派转运使监察地方也好，他的加强禁军也好，如此等等不过都是为了维护他的统治所采取的手段和策略。这一切作为在赵匡胤来说都不过是为了强化他的政权，至于其恶果和影响这是赵匡胤所始料不及的。赵匡胤之所以善弄权术，就在于他有统一中国的雄心。统一大业的建立有的靠的是强大的武力，有的靠的是灵活的政治手腕，这两者之间很难说哪一种好哪一种坏。事实是能够结束分裂，能够制止混战，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能够使社会向前发展，这样的统一功勋，在历史上是永远被肯定的。因此赵匡胤所说的：“卧榻之侧岂

容他人鼾睡”也成为千古名言。

赵匡胤做皇帝时，不过继承了后周的地盘，当时其北方和南方还有六七个小朝廷并存。这些小朝廷的国主多无进取之心，这就为赵匡胤消灭这些小国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消灭这些小国的过程中赵匡胤也充分运用了他的权术，能不战就不战，如对南平他只是以大兵压境作为威胁，而用孙光宪说降了南平国主高继冲。南唐大将林仁肇是宋平南唐的最大敌手，赵匡胤使用反间计，用重金收买林仁肇的侍者，弄到了林仁肇的画像，等南唐使者到宋朝时，赵匡胤就借机对使者说林仁肇要投降宋朝，先送来了画像为凭。使者回报了南唐后主李煜。李煜空有一肚子才华，作诗写词、调律绘画尽管很在行，可是对于政治斗争他却很幼稚。他一听林仁肇要投降宋朝，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林仁肇毒死了。而李煜又一心崇拜僧道，甚至把赵匡胤派到南唐去的一个能言善辩，又懂佛法的少年间谍称为“一佛出世”，以师事之。本来南唐的国力是雄厚的，可是国主不问世事，大将无辜被杀，赵匡胤在这种情况下进攻南唐，还不是所向披靡。等到李煜发现自己在京都已被包围时，宋军围困金陵已很长时间了。李煜派使臣徐铉向赵匡胤请求给他留下一席之地，他表

示决不会反对宋朝，而且讲过去他们就承认宋朝，一直朝贡。赵匡胤乃说出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名言，表达了赵匡胤要统一天下的决心。

后蜀也是一个比较富足的地区，蜀主孟昶却不会用人。他预料到赵匡胤必然对他发动进攻，就派赵彦韬带着蜡书去北汉联络，却谁知赵彦韬竟背弃了他，将蜡书献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对后蜀国情知道得一清二楚，于是就向后蜀进攻了。时值隆冬，天气严寒，一天大雪飘飞，赵匡胤脱下自己身穿的紫貂裘说：“我想起出征的将士，如此严寒，他们怎能吃得消。”于是派人骑马把自己的御衣送给前线的指挥官王全斌，并捎话给前线士兵说：“我真想每人送你们一件，可是实在做不到啊！”赵匡胤的这种做法使王全斌等深受感动，在征蜀中尤为卖力。看来赵匡胤是能用权术的地方一点也不放过啊。其实权术和才智之间并没有鸿沟，没有才智的人是不会耍权术的，凡善弄权术者必有一定的才智。而有才智弄权术之帝王则尤刻忌，他决不允许才智超过其上者在他身边构成威胁。汉代、唐代、以至明代开国都出现了有张良、魏征、刘基那样的政治家，像刘备那样的小国也出现了著名的政治家诸葛亮。可是赵匡胤如同

曹操一样，他们也用人，但所用的人必需听命于他，俯就于他。这种人当皇帝就不可能出现大政治家，如果说有政治家那就是他们自己，因为除了自己他们谁也不信任。

赵匡胤当皇帝时也有一个著名的丞相，那就是曾参与陈桥兵变之谋的赵普。赵匡胤和赵普关系极为密切，“雪夜访普”历来也被传为君臣遇合的佳话。其实赵普不过是一介书吏之才。正因为如此，赵匡胤才对赵普放心大胆地使用。“雪夜访普”未必不是赵匡胤私下对赵普的监视与考察。赵普知道赵匡胤爱私访，也时常提心吊胆。尽管这君臣曾经在雪夜围炉饮酒，其实也是人心隔肚皮，谁知道谁怀的什么鬼胎。

《宋史》赵普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六年（968年）帝又幸其第，时钱王俶遣使致书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庑下。会车驾至，仓卒不及屏，帝顾问何物，普以实对。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帝叹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

这一段记载正好说明国家事并不由赵普这样的书生决定，大权乃在皇帝手里。善弄权术者必是一个专权之人。善弄权术而不能胸纳百

川，就是当了一国之主，也决不会从善如流，因而他也决不会成为一个英明的君主。尽管赵匡胤当了皇帝，实行了不少加强其统治的措施，但是比起唐太宗李世民来，他终究是一个逊色的皇帝。

《宋史》对赵匡胤称颂说：

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乌乎，创业重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

这段评赞道出了赵匡胤创业的艰难，指出了其开国的功勋，可谓所说不无道理。然而说宋与汉唐无让，则是夸谀之词。赵匡胤既缺乏刘邦的气魄，也没有李世民的才略，他更没有刘邦、李世民的经历。宋代也没有汉唐的恢宏

气势，比之于汉唐的雄伟殿堂，宋不过是一座小庙而已。

## 八 沙漠旋风刮来的皇帝

宋咸淳七年（1271），忽必烈依照大臣刘秉忠的建议，在大都（今北京）宣布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这就是大元帝国。这个元帝国虽然历时仅九十八年，但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元帝国的前身蒙古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更是赫赫有名。蒙古族和成吉思汗的名字是永远联在一起的，至今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还留有成吉思汗西征东讨的遗迹。

### （一）空前的蒙古大帝国

在公元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从蒙古高原的荒漠中，突然刮起一阵强劲的旋风，在旋风中涌现出一位震撼世界的蒙古人——天之骄子铁木真。这就是建立起蒙古大帝国的首领成吉思汗。

蒙古人在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前，约有一百个游牧部落，分散在克鲁伦河、鄂嫩河、土拉河、呼伦贝尔湖、额尔古纳河、色楞格河和阿尔泰山地区，相互之间不断进行着抢掠和残杀，有的部落解体了，有的部落强大了。乞颜部落的首领铁木真用了七年的时间统一了蒙古高原的诸部落，一二〇六年在鄂嫩河源头召开了部落首领会议，建立了大蒙古国，被称为成吉思汗，即拥有四海的大汗。成吉思汗雄心勃勃，他要向四面八方扩展他的势力，掠夺那里的财富。他带领着成千上万的蒙古铁蹄，像沙漠上刮起的一阵旋风，向西、向南猛扑，一路烧杀抢掠，席卷一切。所以西方称蒙古人这次远征为“黄祸”，至今谈起仍然变颜变色。

成吉思汗西征的对象主要是花刺子模和钦察。花刺子模统一中亚和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是同一时期，由于双方互相觊觎对方的财富，花刺子模又杀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所以成吉思汗就亲自西征。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人，对于农业和城市的破坏是毫不心痛的。为了彻底摧毁花刺子模，成吉思汗下令决堤，将花刺子模首府玉龙杰赤变成了水乡泽国，使富庶的布鲁绿洲变成了一片荒芜之区。又由于被成吉思汗击败的蔑儿乞部首领西逃，成吉思汗又率兵西

进，越过高加索，直达里海、伏尔加河、多瑙河。同时由于女真、党项、契丹政权紧临蒙古帝国，双方多年以来就有矛盾，成吉思汗西征之时，又同时派兵南征金和西夏。蒙古人只是掠夺财物、工匠，而对于一般人毫不放在心上，每攻下一座城池，往往实行屠城政策，因此中原人口大减。元代初年学者刘因曾记叙说：“河朔大乱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这股旋风的确给它所到之处留下了一片灾难。这位不可一世的蒙古国大汗终于在一二二三年病逝了。他的儿孙们继续秉承他的遗志，东征西讨，到处掠夺，到处烧杀。这期间如果不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更改蒙族习俗，大力效法汉人，也许蒙古族至今还只会游牧，也许这股沙漠上的旋风带来的只是破坏。当日随着成吉思汗的逝世，蒙古族也许会衰落下去。可是蒙古族值得庆幸的是出了一个成吉思汗将蒙古族统一成一个整体，又出了一个忽必烈，使蒙古族竭力吸收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使这个民族终于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终于建立起一个在当时来说可谓世界上第一流的统一大帝国。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继

承了汗位。窝阔台灭掉了金，占领了中原。他死后，他的妻子和儿子贵由掌政，但时间都很短，成吉思汗另一个儿子拖雷的长子蒙哥又继承了汗位。蒙哥之弟，拖雷的第四子就是忽必烈。蒙哥、忽必烈继续南征大理和南宋。在攻打四川合州时蒙哥身亡，忽必烈就于一二六〇年称汗，并用中原王朝以年号纪年的方法，宣布这一年为中统元年。但是忽必烈的兄弟阿里不哥也早就想称汗了，兄弟俩经过激战，阿里不哥大败。为了庆祝胜利，忽必烈又改年号为至元，这是公元一二六四年。到至元八年（1271）十月，忽必烈采纳了汉人刘秉忠的建议，按《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元”，这就是继宋金夏分裂之后又一个统一的新王朝——元朝。元朝刚建立时，南宋还依然存在。不过从忽必烈继承汗位后的第二年起，一直在进行着消灭南宋政权的战争。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终于攻到南宋首都临安城下，宋帝投降。但皇族赵昰和赵昺又被南宋大臣拥立，形成了小朝廷，流亡到福建和广东。直到至元十六年（1279）元军攻克崖山，陆秀夫抱赵昺投海而亡，南宋政权就再无踪影了。到此忽必烈可谓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的皇帝对全国进行统治的封建王

朝。少数民族入占中原当皇帝，忽必烈不是第一人，但是建立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忽必烈却是第一人。至清代福临称雄中国，那只能说是步忽必烈之后尘，已是三四百年之后的事了。

这个被沙漠旋风所刮来的皇帝，继承了乃祖成吉思汗的雄心，建立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帝国，奠定了我国现今疆域的基础。忽必烈一扫赵匡胤的屈辱国风，恢复了汉、唐的宏大气魄，《元史·地理志》记述元代疆域情况时也充满了一种喜悦感，志说：“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忽必烈在混同江口设了征东宣慰司，在叶尼塞河上游设立了吉利吉思、谦州、益兰州等断事官，在西藏设立了纳里速古鲁孙等宣慰司，元代的疆域比后来清朝全盛时期的版图还要大。这是中国封建王朝疆域最广的一个朝代。此前，女真、契丹、党项、蒙古与汉人等民族政权并存，有说不完的纷争和解不清的矛盾，元朝的统一就结束了五百多年

的民族纷争的战火，使中国又恢复了汉唐以来多民族和平共处，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重建家园的局面。忽必烈所建立的王朝与秦始皇所建立的王朝在历史意义上极有相似之处。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的分裂局面，忽必烈统一中国则结束了自五代两宋以来的割据局面。忽必烈的统一在地理范围上比秦始皇要更广，形成了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统一的国家。秦始皇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他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建立郡县制为汉唐所继承，影响深远。忽必烈结束了地方政权各自为政的局面，罢诸侯世守，实行军民分制，在中央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特别是行省制的建立，不仅为明清所继承，且为今天的行省制打下了基础，其影响比秦的郡县制不在以下，也可以说行省制是郡县制的完善和补充。至于忽必烈统一货币，发行在全国流通的纸币，统一驿道，开凿运河，创立文字，在西藏设立宣政院，大规模地建设都城——即今天北京所在地，对后世的影响也都是极其重大的。可以说这位沙漠旋风刮来的皇帝，也给中原带进了一股新鲜空气。中原的社会传统到了唐代已经发展到顶峰，宋代不能有所改革，软弱屈辱，使封建社会的发展趋于停滞，而元代

的开国皇帝们则使僵化的封建社会又有了蓬勃发展的新机。

## （二）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文化是多民族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文化。从周秦到汉唐、两宋，各民族之间不管是互相攻打也好，还是和平相处也好，这种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着。元代的统一大帝国却使这种交流融合的范围和速度更加扩大和加快了。元代呈现出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局面。故人称当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于是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成吉思汗西征，据说灭国四十，破坏是巨大的。但是他一路建立驿站，架桥铺路，还设置了卫士，颁布了保护来往商人的法令，这就使东西交通大开，消除了从太平洋到黑海的疆界关卡。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印刷术、纸币等传到西方，促进了欧洲的文明发展；而西方的传教士和旅行家也源源来到中国，带来了医学、天文、历法及科技成果，又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成吉思汗的西征一时期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但是中

西交通的开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一功绩也不能抹煞。忽必烈在沟通中西文化和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上所做的贡献，可以说比成吉思汗更为杰出。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忽必烈比其父祖高明就在于他认识到了中原文化的优越性。在忽必烈还没有称汗以前，在他的金莲川藩府，就广揽各种人才。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就是忽必烈没有受狭隘的民族观念的限制，他招揽的人才各族人都有，特别是汉族人，被一般蒙古贵族所歧视，而在忽必烈那里却得到了尊敬。翻开元史，汉人在元代中央和地方担任显官要职的，数量最多、成就最显著的也都在忽必烈时期。忽必烈时期第一代翰林学士王鹗就曾为忽必烈亲自讲解《尚书》、《易经》、《孝经》等等儒家经典，一讲就是彻夜。而忽必烈听讲十分认真，不时还提出问题。他感到儒家所论确实是治国之论，他感到要想占领中原，就必需懂得汉人文化。对于许衡说的“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徐世隆所说的：“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忽必烈都十分赞赏。他认为儒家学说对于他治理天下是太有用了，就越发对中原儒士优礼倍加。所以元好问和张德辉竟然请忽

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又叫许衡掌管教育广设学校，他自己也叫人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译成蒙文诵读。忽必烈的这一系列做法和传统的蒙族贵族的作为大相径庭，因此遭到蒙族贵族强烈反对。他的哥哥蒙哥大汗听后很恼火。蒙哥“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自我封闭，因循保守，所以就派使者调查忽必烈的作为，竟把忽必烈在其藩地依照汉人所设立的机构全部撤消。忽必烈无可奈何，但他心里却不以为然。等蒙哥一死，正是在汉人参谋集团的策划下，忽必烈承继了汗位。又是在诸多汉人参与下，他才巩固了自己的帝位。忽必烈对汉文化更加心悦诚服。正是汉人政治家刘秉忠帮忽必烈制定了元朝的国号、国都、国仪、官制。忽必烈离不开汉人的辅佐，经常向汉人张德辉、许衡、窦默、姚枢、张文谦等等询问治国的道理。汉人已成了忽必烈的智囊团。而汉人刘整、史天泽、张弘范、商挺等又成为他军事上所依靠的重要将领。忽必烈能够听这些汉人之言，用这些汉人之计，发挥这些汉人之才，这就使忽必烈跳出了仅仅是蒙族首领的范围，也得到了汉族上层人物的拥戴。不仅对汉族如此，对西域各民族人才忽必烈也都言听计从。查看元史，色目人在忽必烈时期为官为

宦，屡立功勋者也人数众多。如廉希宪家族、阿里海涯家族、赛典赤家族等等。因为忽必烈能兼蓄并收，在他的政权机构里能够联合各族的上层人物，他才能牢固地统治中国各民族，拥有前所未有的疆域。在这个疆域内各民族文化得到了空前的融合和交流。

蒙古族在忽必烈以前没有文字，蒙古文字的创立正是从忽必烈开始的。他尊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创制蒙古文字。八思巴在畏兀儿文基础上研制出来了蒙古文字，这就是八思巴字。八思巴字就是维吾尔、蒙、藏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忽必烈叫蒙古人学八思巴字，同时也还设立了国子学，选蒙古贵族子弟学习儒学，学习汉文化。他还把孔子的地位大大抬高，鼓励修孔庙，孔子作为圣人，虽然在元以前就已经基本确立了他在思想界的地位，但是到元代才把儒家和佛家一样都看成了一种宗教来信奉。大批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文化，就使得少数民族出现了不少学者和文学家、艺术家，如出将入相的蒙古族伯颜就留下了气势雄壮的汉文诗。其《鞭》诗云：“一节高兮一节低，几回敲镫月中归。虽然三尺无锋刃，百万雄师属指挥。”可谓咏鞭诗的绝唱。他的《奉使收江南》诗云：“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

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气势磅礴，气概豪迈，可谓蒙古族要统一天下的宣言书。他的《过梅岭冈留题》诗云：“马首经从庾岭回，王师到处即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表现了这一蒙古将帅的神韵和风度。伯颜不仅能诗而且还善写散曲。其他如《元史》所载蒙古人朵尔直班、阿荣，以及帝王英宗、文宗、顺帝等等皆系能写汉文诗之人。这也正是汉蒙文化交汇的结果。至于色目人通晓汉文化的就更多了，畏吾儿人廉希宪笃好经史，人誉为“廉孟子”，西夏人高智耀精通僧学，康里人不忽木是名散曲家，其儿子则是名书画家，以后像萨都刺、马祖常、贯云石等等更是蜚声文坛曲坛。在史学上，《辽史》、《金史》、《宋史》的编撰，蒙人脱脱、色目人廉惠山海牙、楔哲笃、沙刺班、岳柱、全普庵撒里（即全子仁）都起过重要作用。

不仅蒙人、色目人吸收了汉人文化，同时蒙人、色目人也把他们的文化传给了汉人。尤其是音乐、舞蹈，直接促进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成熟。由于蒙人、色目人的民族习俗酷爱歌舞，他们的音乐乐器独特，音声粗犷，这些歌舞的传播，就一扫中原流行的柔靡歌舞。民间小曲先吸收了这些少数民族的乐章，继而文人也模

仿创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唐诗、宋词的新诗歌——散曲。用散曲表演故事就出现了中国最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元散曲、元杂剧中有不少少数民族的曲牌，和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内容，足以证明中国古典戏曲的成熟也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产物。

民族融合不仅是文化交流、艺术交流，而且还表现在民族间的通婚、联姻、同化。今天在中国境内的回族，其祖先乃属于西域各个部落、各个民族，他们正是在元代由西域到中国而逐渐聚合形成了一个地域基本固定、信仰相同、习俗一致的民族。而女真、契丹一些入到中原的民族由于和汉族长期同劳动同生活，已没有信仰的区别、地理的区别，在元时已把他们都归入了汉人的行列。

元代是一个各民族文化相结合、相交流、相碰撞的时代。元代时间虽短，但在天文历法、农业医药、文学艺术等等领域都出现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忽必烈作为这样一个朝代的开国君主，自然应当充分肯定他的功绩。

### （三）臭老九和四等人

“臭老九”在文化大革命时叫得很响，人

人都知道是指知识分子。那时“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知识分子无一例外被看作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被改造对象，其地位如同地、富、反、坏、右一样。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的叫法就是儒生，而因为宋遗民郑思肖曾说过蒙古王法是分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盗八娼九儒十丐，而儒恰恰被排在第九位，仅比乞丐地位强一等，竟不如强盗和娼妓，自然儒生就是“臭老九”了。据说文化大革命“臭老九”这一叫法就来自郑思肖。那末忽必烈是否定过这一条王法？人们歧说不一。特别是对元代杂剧兴起，人们论说众多文人去到市井间写作杂剧，就是因为元代八十年停止了科举，对读书人不予重用，所以文人才自暴自弃，这样看九儒十丐说不无根据。然而忽必烈却又在未称帝前就组成了儒生幕府，登基后许多儒生都做了高官，还崇拜孔子又如何解释？到底忽必烈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什么政策，回答只能是忽必烈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利用政策。但是蒙古贵族与忽必烈的认识、做法并不全都一致，无论是读书人和非读书人，在蒙古贵族看来都一样是他们占地的俘虏，统统只有劳动力的价值。蒙古贵族文化落后，只重僧道医工，不知发挥读书人的特长，对儒生不杀已是十分宽大了，留

着他们也只是叫他们去做苦力，这就使知识分子自感地位和乞丐相若了。郑思肖所说的情况不谓不真实，不过是不成文的法律罢了。但是忽必烈在他统一中国的实践中体会了儒生的价值和作用，他还是希望能够重用儒生的，这就是忽必烈比一般蒙古贵族的高明之处。但是刚刚立国，他的所想未必全都能实现，他未必敢得罪蒙古贵族，他还要处处维护蒙古贵族的利益，因此在他立国时就定了一套见诸典章的法令，即人种四级制。不管你是不是知识分子，首先看你的种族，由种族而决定你的社会地位，这就比所谓“臭老九”更能维护蒙古贵族的利益了。这种种族统治可以说开了希特勒以德意志为最优秀民族迫害犹太人的先河。

四等人的规定是很明确的。一是蒙古人，二是色目人，三是汉人，四是南人。四种人又可分两类。蒙古、色目为一类，汉人南人为一类。中央和地方官吏的长者汉人南人是无权问津的，即使皇帝想给汉人南人这样的官职，蒙古贵族也不允许。这条法令就是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特殊利益，他们才要忽必烈定的。他们以征服者的面目自居，怎肯俯首听命被征服者的号令呢？所以耶律楚材被皇帝信任，蒙古贵族就曾多方诬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汉人太平

为中书左丞相，蒙古贵族就大鸣不平。忽必烈重用的一批儒臣，也多受到蒙古贵族排挤。蒙古人担任达鲁花赤，即监视各地各部门官吏，这一职务是汉人南人绝不能担任的。所以汉人为官多受限制，且要仰蒙人眼色行事，而汉人能为官者又多是儒生，儒生进官场不易，进了官场仕途也不如意。所以元代儒生文人牢骚最多。陈高写的感兴诗云：“客从北方来，少年美容颜，绣衣白玉带，骏马黄金鞍。捧鞭揖豪右，意气轻丘山；自云金张胄，祖父皆朱轡，不用识文字，二十为高官。市人共咨嗟，夹道纷骈观。如何穷巷士，埋首经卷间，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就足以说明了有元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不平。

知识分子不平比起老百姓的愤怒就差多了，因为老百姓不是当官不当官的问题，而是生命有无保障的问题。杀人偿命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蒙古人杀了汉人就不偿命，只罚出征了事。而汉人只要伤着蒙人，就可招来杀身之祸。多桑《蒙古史》曾写道：“成吉思汗法令，杀一穆斯林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值仅与一驴相等。”元代《通制条格》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许还报，只能告官；如有违者，严加惩罚。如此的不平等，民族压

迫，汉人怎么能不起来反抗？当然这种反抗首先是反抗阶级压迫。蒙古贵族为防止人民反抗早就下令“禁民间私藏军器”，甚至连汉人持弹弓射鸟鹊者也不许。《元典章》规定“若有违犯之人，捉拿赴官，追收弓弩，痛行断罪施行。”而汉人拿弓箭打猎就更不许了。还规定禁止汉人习武艺、相扑，甚至人众祈神、划龙舟，连集市买卖都禁。看来忽必烈想让蒙古人学习汉人文化的想法是有前提的，则必须是汉人为我所用。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蒙古贵族享有特权的大帝国。可是以其落后而统治先进，势不可能。四种人的规定使汉人南人遭到了不少的苦难，同时也遭遇到汉人南人强烈的反抗。在实际统治过程中蒙古政权离不开汉人，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就是蒙族贵族为首的与其他民族中的贵族相联合的政权。这个政权由于种种倒行逆施，越来越暴露出它的野蛮和残酷。忽必烈到灭宋以后，不知发展经济生产，仍然无休止地征战，对蒙古贵族的落后势力妥协，“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土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已开了后世皇帝只知搜刮挥霍的风气。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提供了一个社会经济条件的条件，这本来是绝大的功勋，但是不能抓住时机，利用条件，建设一个富强的

帝国；能打下天下，而不能为后代子孙留下治理天下的策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忽必烈尽管很佩服唐太宗，也希望身边能有魏征那样的谏臣，他虽然也组织了藩邸幕府，在他周围也一时涌现出不少杰出的人才，可是他毕竟没有唐太宗的器识和修养。在某种程度上他迁就了蒙古贵族的落后势力，为保护蒙古贵族的利益，忽必烈到晚年也就疏远了汉人智囊团。这疏远是从其登上汗位就已经开始，其导火线是李璿之乱。

李璿是山东军阀，摇摆于金宋和蒙古政权之间。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李璿在山东起兵反对忽必烈。这一事件给忽必烈很大的震动，也给蒙古贵族说汉人不可信有了口实。特别是李璿同谋者王文统在忽必烈身边竟做到了中书平章的要职，而忽必烈所借重的许多汉人将领竟和李璿有勾连。本来在中统建制时，忽必烈政权组阁，汉人比重竟达到百分之八十，中央实权都在汉人幕僚手中，汉人将帅也都握有实权。可是李璿变乱后，忽必烈怀疑起自己的幕僚了。他追究刘秉忠、商挺、张易、赵良弼推荐王文统的用心，商挺、赵良弼都受到拘捕审讯，握兵权的史天泽一家一日被解兵权十七人，张柔、严忠济等兵权也被解除。而

色目人从此被空前地重用。到打败了阿里不哥后的至元二年，忽必烈就宣布了“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的政令，也就成为元代一直尊奉的国策。真是“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个李璿变乱，就使得忽必烈再也不敢重用汉人，这才是因噎废食。当然李璿只是导火线，其根本还在于民族的防范心，民族的隔阂，这不是由忽必烈一个人所能解决的，这种狭隘民族观念也不是忽必烈能够轻易超脱的。

## 九 贫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

公元一三六八年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被赶出了大都，逃到了漠北，又一个新的王朝——明朝在南京宣告建立了。这是中国汉族所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他的开国皇帝是朱元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是由农民起义推翻的，以后汉、唐、隋、元、明几代王朝也都是由农民起义推翻的。农民起义的胜利也曾建立了几个政权，也曾有农民起义领袖当了皇帝，建立了新王朝，在朱元璋以前就有刘邦建立的汉朝。农民起义领袖当了皇帝，建立新的王朝，又被农民起义推翻。中国历史在工人阶级没有产生以前，就是这么周而复始地打着螺旋转，向前缓慢地移动着。

### （一）和尚、战士、皇帝

中国历代开国皇帝出身各不相同，其中出

身微贱、经过浴血奋战而当上皇帝的也不止一个，汉刘邦是其一，五代后汉刘知远也是一个，明代朱元璋又是一个。

朱元璋出身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往上数几辈也没有做官的，到他父亲朱世珍，又从江苏逃荒到安徽，住在了濠州太平乡，仍是种地为生。朱元璋出身穷苦，只得很小就给富人家去放羊。他十七岁那年又遇天灾瘟疫，他父母和兄长全死了。为逃活命，朱元璋就到家乡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和尚。可谁知寺庙没人进香，朱元璋只好到处化缘，说白了就是要饭。在要饭的路上他看到了人间的各种苦难和元代官吏们种种丑行，他真想有一天能使百姓过上舒心的日子，他真想狠狠惩罚那些贪官污吏。

饥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造反了。一三五一年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各地饥民纷纷响应，都聚在了红巾军的大旗下。郭子兴领导的义军攻下了濠州城。朱元璋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毅然脱下僧袍，投到了郭子兴部下，当上了一名战士。

朱元璋念过几个月私塾，又当了七八年和尚，经历见闻比一般人要多，更加上他无牵无挂，一心造反，所以在战斗中表现就非同一般。在千百人中，郭子兴识得朱元璋是一个人才，就

把自己养女嫁给了他，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马皇后。

朱元璋出身贫贱，身无娇贵之习，又无骄横之气，他懂得百姓的疾苦，因此他能体谅民众，不许士兵抢掠，只杀贪官污吏，所以百姓对他倍加拥护。在部队中他也有极高的声望。当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就当了元帅，受节制于刘福通所拥立的小明王韩林儿麾下。此时朱元璋还只是一支义军的领袖，在各路义军中还并不怎么突出，而像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乘时而起的义军则纷纷称王，独占一方，形成了割据势力。此时的形势很似秦末农民大起义，谁最后能得天下，还难见分晓。如果朱元璋没有雄心，那末他也就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军阀罢了。朱元璋并不满足于占领几座城池，他的目标就是要推翻蒙族贵族所建立的元政权。在他的内心已经萌发了要取代元的思想，所以他在行军打仗中就不仅仅是攻城掠地，而且随时留心访察那些可以帮他成就帝王功业的人。朱元璋出身贫穷，他痛恨贪官污吏，他未尝不想叫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历史的局限，使他除了知道当皇帝可以有权改变现实，别的就一无所知了。他的目标就是要当皇帝。十六、十七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还没有诞生，代表当时最先

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们，他们进行革命的武器依然只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仁政王道思想，而仁政王道的实行者仍然是皇帝。历史没有给农民阶级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革命理论，所以农民革命的目标不过就是祈求一个好皇帝。朱元璋也就只能以当一个好皇帝为他的奋斗目标。为此他以刘邦做为自己的榜样，努力找寻他的萧何、张良、韩信、陈平。终于在他周围聚集了李善长、宋濂、刘基、朱升等人。这些人纷纷向朱元璋献计献策，为他制定了取天下当皇帝的根本策略。

《明史》记李善长劝朱元璋以刘邦行事为法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濂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明史》记刘基为朱元璋献进兵之策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

《明史》记宋濂为朱元璋献治国之本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

《明史》记冯国用为朱元璋献定都之议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

《明史》记朱升为朱元璋献长远之计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可贵的是朱元璋对于这些建言皆一一采纳，并付诸于实践。从而使得朱元璋的每一步行动既有远大的目标，又有切近的效果。他经过近十六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将同时而起的豪强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明玉珍等等一一消灭，在一三六八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朱元璋从一个贫僧，到一个普通的起义军战士，继而成为一军元帅，最终成为开国皇帝，这期间除了朱元璋个人具有同时起义的其他领袖所没有的远见卓识，坚韧不拔的精神外，朱元璋能够用人，特别是能够发挥知识分子的才干是起了决定作用的。正如三国时刘备在未得诸葛亮辅佐前，他空有关羽、张飞、赵云等盖世名将，可是由于战略一再失误，总是被人打得东逃西窜。项羽刘邦争雄，项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刚愎自用，对于范增之言不但不采纳，反而还将范增赶出军队。元末各家义

军乘时而起，在战火中哪一支军队都磨练出不少骁勇的战将，朱元璋部下也出现了像徐达、常遇春等帅才将才，但是如果不是刘基、李善长、宋濂等这些运筹帷幄之士的协助，朱元璋也决不会成就帝业。如果没有众多的人才辅佐，特别是几个关键核心人才的辅佐，就是当了皇帝，所建立的王朝也不会持久。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规律。

皇帝与皇帝，朝代与朝代，在封建社会的大体系内，从本质上说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一朝有一朝特点，一个皇帝与一个皇帝有不同的作风和不同的品格。这种差异在老百姓心目中就会有好皇帝和坏皇帝之分，有明君和昏君之分。元代自忽必烈晚年之后，社会各种矛盾就越演越烈，享有特权的蒙古贵族骄横淫逸，无法无天，奸佞当权，法滥刑重，官盗一体，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爆发了起义。朱元璋从起义军战士，当上了封建皇帝，在他本人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由被统治者爬上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他由起义军代表广大民众的要求转为皇帝代表地主阶级的要求，这不是朱元璋的过错，历史造就了他当时只能走这条路。

作为元朝蒙古族统治的政权，由于其残酷的种族——阶级统治，就使汉族人倍感屈辱；更

由于元末皇帝妥懽帖木儿的荒淫腐朽，人们盼望有一个好皇帝来代替蒙人政权，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社会共同的心理。元末的统治者已不能使社会再向前发展，已经成为一种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取而代之，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使人民能够从高压下得到一点喘息，使停滞的社会又开始向前发展，这不能不说朱元璋当皇帝也有他的一份功劳。朱元璋一方面出身贫穷，知道民生疾苦，他又亲自看到了元朝的腐败，知道人民何以造反；一方面他当了皇帝就要为巩固自己统治着想，所以他建国之后就采取了一些对人民的让步政策。

## （二）小鸟不可拔羽

“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明初高启对朱元璋结束战乱，重建统一王朝的歌颂表现了明初广大民众对战祸平息的喜悦。几乎近二十年的动乱，社会生产力又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由于战争、灾荒，从华北到西北，从湘赣到江淮，几乎到处尸骨遍野。农田荒芜了，人口减少了，面对一片废墟，怎样使社会安定下来，怎样使人民摆脱困难，是朱元璋所建立的明王朝

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他不能解决，他的王朝就决不会持久，不会稳固。元末有一部南戏《琵琶记》很流行，朱元璋就对他的臣僚们讲：“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他为什么劝他的属下人人都要备一本《琵琶记》？因为《琵琶记》真实写出了元末社会的动乱和黑暗，写出了人民所受的苦难。这些苦难朱元璋是亲身经历了的，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也希望他的臣下从《琵琶记》的故事中能够不忘过去的苦难，其意就在于用艺术作品告诫新明朝的官吏们不可走元末官吏的老路。朱元璋的用心不谓不苦，他犹恐臣下不明其意，又谆谆告诫说：“夫步急则蹶，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殖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为了能够使民生安定，朱元璋下令奖励屯田垦荒，凡农民开垦的荒地归开垦者所有，三年免交赋税。为使人口大量减少的地区也能繁荣起来，朱元璋又大量移民，主要是从人口密集的江南移到江北、西北，至今太行山以西地区的人一谈起他们的祖宗还都能追述到明代，原因就在于此。对于军队朱元璋也要求各地驻

军屯田自给。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计量土地的工作。对于地主隐瞒的土地一一查清，按亩征税，凡隐瞒土地者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朱元璋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民以食为天，所以他的这一措施就得到了民众的欢迎。元代有一首民歌曾说：“天高皇帝远，人少相公多。一天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朱元璋知道并领略过元末地方土豪恶霸的狠毒，所以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到一个县视察，发现那个县官有贪污行为，立刻下令把县官杀掉了，并把那县官的皮剥下，内装稻草，挂在公堂之上，让下任县官为戒。为了监督官吏，朱元璋下令允许百姓到京城告状，规定凡贪污六十两银子的官吏一律杀头，剥皮填草示众。这在中国历代皇帝的举止上确是少有的，表明朱元璋确实想革新吏治，铲除害民之官。尽管这种做法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朱元璋自己的统治，但廉洁的官吏、清明的政治对于百姓安定生活和发展生产总是一种有利的因素。

知识分子在帮助朱元璋打江山时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元璋深知读书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打江山知识分子献谋献策，坐江山更需用知识分子为官为吏。唐代宋代大兴科举笼络了不少读书人，元代蒙古人不懂这一点，使

读书人牢骚满怀，怨气冲天。元代科举时行时停，读书人和元代统治者总是离心离德。读书人就是要做官，“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但是中国的书太多了，读书读不好就会反对朝廷，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要独尊儒术。从唐宋以来的科举朱元璋知道了四书五经是维护他统治的良好思想武器，所以一方面他大兴科举，另一方面就严格规定了科举的内容。他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唯一学业，要“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毋以仪、秦纵横坏其心术”。他和刘基一起严格制定了八股文程式，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命题范围，学生只能以朱熹的四书五经注为答案。从此读书人的思想就被四书五经所牢笼，所桎梏。读书人只要有书念，有官做，比如农民只要有地种有饭吃一样，也就不会反对大明朝了。朱元璋所行一切都是为巩固其统治服务的。任何皇帝都不会干出那样的傻事：他制定出一套有利于人们推翻他统治的措施。封建专制下不可能有民主，任何时代都要有维护和支持他的统治的思想和理论，需有一批在这种思想和理论熏陶下成长出来的官吏为其服务。这是治国的根本大计之一。

新王朝百废待兴，新王朝一批新贵又都图享富贵荣华。朱元璋深知民力国力的艰难，所

以他力主节俭，以身作则。在建都南京营造宫殿时，朱元璋把工程设计人员的华丽设计全砍掉了，却在宫墙上让人绘制了历代帝王骄逸亡国的故事以为自戒，在宫中的空地还让太监种菜以不忘根本。有人把陈友谅的镂金床送给朱元璋，朱元璋也拒绝了，并且说一张床就这么精巧，如此奢侈享乐，他怎能不失败。终朱元璋一世没有大兴土木之举，就是有一次要修南京城墙，也因户部侍郎杭琪说劳民伤财，耽误农时而中止了。这和秦始皇修阿房宫，汉武帝建上林苑，曹操修铜雀台，隋炀帝建迷宫相比，朱元璋的确是太俭朴了。这大概就是一个由农民而当上皇帝的特色吧。

朱元璋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曾说：“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这段话可以说是朱元璋当皇帝后的行动宗旨，唯恐殃民不过是堂皇之言，实则是怕其皇权不稳。但这样一个勤政不敢安逸的皇帝比之那些不问政事只图享乐的皇帝，这样一个在口头上还挂着惟恐殃民的皇帝比之那些不问民生死活的皇帝总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从巩固

自己统治出发，却也使百姓得到了安定与休息。逃亡的人回到了家乡，无业的人有了土地，农业、手工业、商业很快得到恢复，使明初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所以《明史·食货志》载：“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军饷不仰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朱元璋建立明朝结束了二十年战乱，结束了相对黑暗落后的元末统治，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前进。

### （三）皇权专制的恶性膨胀

历代开国皇帝，从秦始皇起，没有一个不想使他们的统治权，子子孙孙永传万代的。因此他们在当上皇帝之后，总是千方百计要加强皇权，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集中到自己一人手里。他们最担心大权旁落，最担心开国功臣们恃功邀赏，挟权谋私。从秦汉、唐宋，到元明，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就愈演愈烈。朱元璋为了把权力掌握到自己手里，也毫不例外地进行了政体和军事改革。从秦开始建立的丞相制和从晋建立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到朱元璋

时代统统废除了。大学士代替了丞相的部分职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直接对皇帝负责。中书省废掉了，以布政司、都指挥司、按察司直接对皇帝负责。全国的军队分属五个都督府管辖，但也只是管训练、管理军队，军队调动权属于兵部，兵部直接和皇帝发生关系。将帅任命也只有皇帝批准才可以赴任。也就是说到朱元璋时代，军政大权全集于朱元璋一身，他既是最高行政长官，又是最高军事长官，还是最高执法长官。封建皇权到朱元璋时代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皇权专制的恶性膨胀，固然是出于朱元璋维护统治的需要，但是也引出了朱元璋所意料不到的恶果。

人们对朱元璋一开始掌政都抱有种种希望和幻想，可是朱元璋对皇权统治的绝对化，就导致了特务横行的恐怖局面。朱元璋逃不脱所有开国皇帝对开国功臣所共有的疑惧心理，他所设立的锦衣卫，就是他的特务情报机构。锦衣卫兼管侦缉和审讯，专对文武官员进行监视。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朱元璋怕他有不利朝廷言行，明是派锦衣卫标尉去探视，实则观察吴琳的行迹，直到锦衣卫回来报告吴琳回乡确实不问政事他才放心。锦衣卫的特务遍布各处，大臣们的生活细小无一不汇报到朱元璋处，其

情报之迅速、准确真是历代莫比。钱宰罢朝回家吟了一首诗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转天朱元璋见到钱宰，劈头就说：你昨天写得好诗！我没有嫌你迟啊，把“嫌”改成“忧”字吧。钱宰吓得直叩头请罪。开国元勋宋濂一天在家饮酒，转天上朝朱元璋就问宋濂昨天请了什么客，做了什么菜，喝的什么酒。宋濂如实回答了。朱元璋点点头说，对，没有骗我。然后拿出一张宋濂宴饮图，那上面客人一个个画得清清楚楚。宋濂看后吓了一跳冷汗。朱元璋如此做不过是叫大臣们知道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瞒不过他的耳目，意欲使官吏们对他忠心耿耿，可是他哪知处于被监视下的官员们一个个胆战心惊，只好“莫谈国事”，以免招来意外之祸。官员们是“老实”了，“顺从”了，可是谁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而特务们却依靠皇帝所给的特权，有的就挟隙报复，陷害忠良，到后来闹得全国犹如一个大监狱一样，奸佞小人胡作非为，阉党大盛，刘瑾、魏忠贤等等靠打小报告，用特务行径爬上了高位。这种明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正是肇起于朱元璋啊。

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大开杀戒，管你是什么开国元勋，还是高官名士，只要锦衣

卫有报告，只要朱元璋感到他们对自己不利，就是一个字“杀！”因而明代的文字狱和杀戮功臣之惨在历代中也是赫赫有名的。

胡惟庸是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著名功臣之一。但是胡惟庸结党营私，坑害异己，朱元璋杀死胡惟庸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由胡惟庸，朱元璋竟行上下左右株连之法，造成胡党大狱，延续十年，诛杀三万多人。此间只要有特务指出某某是胡党，就立刻会遭到逮捕和杀害。因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女婿，所以李善长全家都被诛杀。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指为胡党，宋濂也被牵连进去。这一点连朱元璋的皇后马氏也看不下去了。《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载：“学士宋濂坐孙慎罪，逮至论死。后谏曰：‘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帝不听。”朱元璋在贫贱中和马氏结为夫妇，当了皇帝对马氏仍很尊重，这一点比一般的皇帝，甚至富而骄妻的高官显贵也强得多。但是马氏对朱元璋的劝谏也并不能都起作用。所以马氏一再劝朱元璋，“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然而帝王有几个可以同贫贱又同富贵的呢？马氏临死还是劝朱元璋：“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可是朱元璋空有一个贤德

的皇后，他并不能按马氏的愿望去做，继胡惟庸后，又有开国元勋蓝玉大案，被诬为蓝党者又一律诛杀，多达二万余人。

对于名士，朱元璋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诗人高启因辞官就被腰斩，文士姚润、王谟不愿做官，就都被杀头抄家。更有吹捧朱元璋而引起朱元璋疑心的名士也被杀了头的。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重宪”之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朱元璋以“则”字音和“贼”音相似，竟怀疑林、徐骂他，统统斩首。这种极端专制，使文人们都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大臣和文人都缄口不言，表面上一片顺从，实际造成一片政治黑暗。阿谀奉承之徒乘机得势，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充斥社会。所以终明一代的正统文化再没有唐时的辉煌局面。人们只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文学复古、文化复古逆流在明代兴起，其导源也就在于朱元璋的这种文化专制。

为什么朱元璋如此加强皇权，滥杀无辜？他的妻子马氏不解，他的儿子，太子朱标也不解。朱元璋一天把一带刺的手杖丢在地上，让朱标捡起。朱标有些犹豫，朱元璋就说：你怕刺不

敢捡，我为你把刺儿拔下，你不就好拿了吗？”一语道破朱元璋这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使他开辟的江山社稷能够传远啊。可是他没想到他的所做所为恰得其反。他把功勋旧臣一个个处死，让忠耿之士一个个噤若寒蝉，不过是在为小人奸佞张目罢了。一旦朝廷有事，可就再无可用之人。后来朱标死，朱元璋的孙子继承皇位，身边除了几个宦官佞臣再无忠贞耿直之士，朱棣来争夺皇位，建文帝失败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是最自私的人，也是最虚伪的人。不管他原来什么出身，只要他当上皇帝就会改变他的本性。朱元璋虽然是贫农出身，但是当了皇帝就已背叛了他的阶级而成为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朱元璋希望建立永久的朱氏王朝，用法律形式来保障他的政权永存。他在世时编定了《大明律》三十卷和《大诰》一书，希图把人们的行动都纳入到他所制定的法律规范中。为了推行《大明律》和《大诰》，他甚至规定犯罪者凡家藏《大诰》一书可减罪一等，凡能讲解《大明律》和《大诰》者皆得封赏。他对于自己的女婿犯法也坚决杀掉，对于义子犯法也不留情面地惩罚。可是在那个时代究竟是权大于法的时代，朱元璋自己定了法，却又亲自破坏了法，他的滥杀无辜、大兴文字狱，

早已抵消了他所强调的《大明律》和《大诰》的价值。《大明律》和《大诰》不过是一纸空文，除了专门研究者或利用它们做进身的敲门砖，在朱元璋以后，特务遍天下的情况下，谁还记得什么律诰呢？皇帝意志，长官意志，这才是最大的法。朱元璋可曾知道这一点？

## 十 努尔哈赤及其子孙

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到清朝为止，就走完了他的全部历程。清王朝也曾出现过康、乾盛世，经济也曾一度繁荣，国力也曾一度强盛，但不过是封建社会灭亡前的回光返照罢了。中国封建社会到清朝已成为一具失去活力的僵尸。在清朝建立的同时，欧洲已步入了人类社会发史上的更高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清朝从其建国就走着与历史发展相倒转的回头路，虽然此路没有走通，但与欧洲相比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却落后了一大块。

### （一）八旗制与其创立者

在中国东北部的女真族在十二世纪曾一度强大起来，灭掉了契丹族的辽国，而建立了金国。而后又灭掉了北宋，和南宋政权形成对峙的局面。一个世纪后蒙古族强大起来，建立了

强大的蒙古帝国，将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消灭，从此女真族就消沉了三百多年。这期间女真族分为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在十六世纪中叶，建州女真族出现了一个杰出的领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经过激烈的争杀，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一五八七年他先在费阿拉建起了城堡，一五九九年又参照蒙文创立了女真文字，也就是满文。一六一六年他在赫图阿拉称汗，定国号为金。紧接着他就挥师南下直攻明朝的城关。在萨尔浒大战之后，辽沈地区全被努尔哈赤占领。一六二一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一六二五年又迁都沈阳。一六三四年他的儿子皇太极将沈阳改为盛京。一六三六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洲。他继承乃父的遗志，对明朝江山虎视眈眈。他极力搜罗汉族地主上层人物，对俘虏的明将以优礼相加，其目的就在于使这些人被他充当攻占中原的鹰犬。皇太极未能实现他入主中原的愿望就死去了，继承帝位的是他的第九子六岁的福临，这是一六四三年八月的事。六岁的孩子当然理不了政，就由努尔哈赤的另一个儿子，福临的叔叔多尔袞摄政。多尔袞野心勃勃在一六四四年春又带兵直扑北京。

北京明王朝这时已岌岌可危，李自成的起

义军在三月就一举攻下了北京，明毅宗朱由检吊死煤山。但是李自成并不打算建都北京，他也没有料到多尔衮会驱兵中原，对于明朝的官吏他也没有安抚笼络，因此在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后，就使李自成面临了满明联合进攻的局面。山海关一战，李自成大败，匆匆撤出北京。多尔衮由吴三桂、洪承畴等引领在一六四四年五月即进入北京，受到了亡明官员的迎接。清朝可以说是借助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大起义的力量，在已经摧毁了明王朝的基础上，很轻易地取代了明王朝。这一年秋天，福临从盛京来到北京，当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一个七岁的娃娃当上了开国皇帝，他凭借的是什么？并没有什么先帝的遗诏，又没有什么祖宗的传统，当时，一个小孩子，他又没有什么得力的大臣，他又不是长子，这其中不能不说他得力于他的祖父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八旗制。

女真族原是个游猎民族。他们打猎分氏族而行，一般以十人为一单位，这十人的头目他们叫做“牛录”。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落，就以三百人为一单位，在牛录基础上又建立了“固山”。“固山”汉释为“旗”。一六〇一年他先建立了四固山，即：黄、白、红、蓝四旗，到一

六一五年发展为八旗，一旗下有五队（女真人称为“甲喇”），一队下有五牛录。新增加的四旗为镶黄、镶红、镶白、镶蓝四种。八旗共有六万多人，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事单位，努尔哈赤就是八旗最高行政和军事首领。八旗各有旗主，由努尔哈赤子侄担任，旗主拥有对旗务的绝对权力。努尔哈赤的命令通过旗主才能实现。八旗人平时生产，战时征战，他们必须绝对服从牛录指挥。这种八旗制在皇太极时期又增设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形成了二十四旗，他又削弱了八旗旗主的权力，使旗人完全听命于他自己的指挥。皇太极死时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八旗中正黄、镶黄、正蓝旗是他的嫡系，他的长子豪格为正蓝旗主，这三旗就拥戴豪格为帝。而皇太极之弟多尔袞有正白、镶白旗旗主拥护。况且当初努尔哈赤死时曾遗言让多尔袞继位，当时由于多尔袞年少，就被皇太极夺去了帝位，皇太极一死，多尔袞自然要争这个帝位。可是豪格所拥有的力量并不弱。两黄、两白四家旗主互不相让。豪格表示可以不当皇帝，但也不同意多尔袞当。这时多尔袞才提出让皇太极的第九子六岁的福临当帝，他来协政，等福临长大再把政权归给福临。福临就是在八旗势力抗争不下时，作为双方矛盾的缓

冲人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像这种开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其地位也是很危险的。但是八旗制又束缚了多尔衮的手脚，使他不敢贸然篡夺皇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已经把八旗制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特别是皇太极从一六二八年起把八旗建设得已井井有条。政事他建立了八旗官制官仪，刑法禁令，学校礼仪，从军事上他制定了军制军律，从生产上他制定了屯田重农的方针，他要求八旗官吏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对于开国所应做的一切皇太极几乎都想到了，都做到了，所以说清朝入主中原的开国皇帝虽然是福临，但是实际上的开国皇帝是皇太极。如果没有皇太极打下基础，福临这位开国皇帝是不可能稳坐江山的。

就是这样，多尔衮也总是在觊觎着帝位。他根本不把这个六七岁的小皇帝放在心上，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的王府比皇宫还要气派。他以皇父自居，占有了福临的母亲，孝庄太后。福临很有可能被废掉，但是只能说归于命运吧，多尔衮三十九岁时突然病死了，英亲王阿济格又企图策动两白旗大臣谋反，又被两白旗大臣告发了，十四岁的福临就这样以一个少年皇帝被人推到了历史舞台的前沿。他不得不亲政了，中国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就决定于这个十四岁的少

年了，满清王朝的未来也决定于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了。少年有少年的心计、办法，他虽然没有老年人的成熟干练，但是他却敢干、敢闯，硬是撑住了危机四伏的大清王朝。这里不仅有八旗对他的支持，同时还由于福临作为一个少年皇帝，确也有一套办法，很不简单。

## （二）孔子偶像再派用场

福临当政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因为满旗入主中原，汉族的传统意识很难接受，再加上满族以其民族习俗强加于汉人，就更引起汉人的厌恶和反感。李自成、张献忠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李自成、张献忠的部下却高举反清的大旗继续抵抗着清军的镇压。还有南明小朝廷的建立，仍具有极强的号召力。他们在外族入主之时，就和农民军结成了暂时的联盟。

就在福临当政的第二年，张献忠部下的李定国率军由云贵北上，直取桂林，逼使清定南王兵败自尽。收复了广西全境后，李定国又北取长沙，进攻江西。清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率兵十万还击，李定国又于衡州击毙了尼堪。李自成的余部也在李过、郝摇旗率领下坚持斗争，展转在四川、湖南的山区。在福临执政的

十年里，西南反抗的烈火一直燃烧不息。在东南则有郑成功坚持抗清，并漂洋渡海占领了台湾为根据地。在人心惶惶情况下福临怎样收拾这种局面呢？其策略就是刚柔并济，远攻近交。他一方面派兵镇压各地的反抗，一方面对所统辖的地区采用攻心战，安抚术。他首先把孔老夫子这位汉人们尊奉的圣人又抬了出来。

他亲政第二年就亲自到国子监拜奠孔子，发布谕旨说：孔子所讲的道理就像天上的太阳，国君按孔子的话治理国家，百姓也遵循孔子的话侍奉国君。他专门派特使到孔庙祭孔，拨出三万两白银整修孔庙，尊孔子为“至圣先师”。为了进一步安抚民众，他对民间尊奉的关帝爷也加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汉人们崇拜的文武两圣人，福临也给予了高度的崇敬。他意在宣扬满汉一家，消除汉人的反满情绪。他的这种做法无疑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为了治理中原，也为了从中国历代帝王的经历中吸取借鉴，他刻苦读书，一连九年，除了处理国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上消磨了。经史子集，他无所不读。多尔袞摄政时，不少大臣上疏要给福临选任教师，但多尔袞惟恐福临当政，他是想让福临越无知越好，所以根本不采纳大臣的建议。多尔袞一死，福临当政，乃用刻苦自学完

成了他作为皇帝所应具备的修养和学业。这在中国皇帝史上也是少有的。福临学习了汉人的优秀文化，也懂得了对汉人应当怎样统治。他抓住了忠、孝两字大作文章，抬出了孔老夫子作为他统治汉人的护法神。整个清代孔夫子的地位越吹越高，几乎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其导源就在于福临。

为了稳定明朝遗老遗少之心，对这批上层人物加以笼络，他一反李自成对明朝宗室的态度，公然以明室后人的姿态，为崇祯帝后发丧成礼，为明陵设守陵官，他还亲自祭奠崇祯，称颂他是“励精图治”之王。对于朱氏诸王仍保其王爵，对于死难者皆给以旌表，对于隐逸山村者，皆敦请出仕，除掉明代厂卫特务制度，对满汉官员一体看待，允许满汉官员共同议事，互相监察，甚至他还允许满汉通婚。他把皇太极的第十四女和硕公主嫁给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他把明太祖捧到了历代开国皇帝之上。《清史稿》载这样一段对话：

上问：“汉高祖、文帝、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陈名夏对曰：“唐太宗似过之。”上曰“不然。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

福临的这些做法就比忽必烈入主中原高出

一筹。忽必烈虽然也看到向汉人学习的重要，但是他还是定了种族阶级统治的四等人法，造成了终元一代民族矛盾始终尖锐激烈的后果。福临作为开国皇帝似乎看到了忽必烈的不足，故而并不强调满族的民族优越感。他尽力使被征服者的心理能够接受满族的统治，所以在一开始他允许中原人还穿明代的衣冠。这些做法就使他赢得了相当多的民心。

除此之外，他深刻地记取了明亡的教训，自他当政后，一再下谕严惩贪官污吏。他一亲政就说：“国家纪纲，首重廉吏。迺来有司贪污成习，百姓失所，殊违朕心。总督巡抚任大责重，全在举劾得当，使有司知所劝惩。今所举多冒滥，所劾多微员，大贪大恶乃徇纵之，何补吏治？”他又说：“国家设官必公忠自矢方能裨益生民，共襄盛治。朕亲政以来，屡下诏令，嘉与更始。乃部院诸臣因仍前弊，持禄养交，朕亲行黜陟，与天下见之。自今以后，其淬砺前非，各尽厥职，若仍上下交欺，法必不贷。”因此在他当政时曾多次减免赋税。他的这一系列做法，终于使清朝在中原稳住了阵脚。

福临可以说是一个年青有为的开国帝王，可是他二十四岁就去世了。在他临死前写下了遗诏，给自己定下了十八罪，这种自我省察的

精神在帝王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在罪己诏中他把明明做对的事也当成了罪错，对后世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比如他说：“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这里说的习汉俗，用汉官，是使清朝开国能够立脚的重要原因，可是福临去世时则一一否定了，这就造成了以后民族矛盾大大尖锐化的局面。在罪己诏中他说的有些还是正确的。如他说：“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然而福临的这一反省却并没引起他的子孙们的注意，明代受宦官之祸，到了清末宦官专权也成为了一大祸害。

福临为清朝建立在可能的条件下尽了他的心力，按照封建社会的昏君、明君的划分标准，他不失为一个明君。经努尔哈赤、皇太极，到

福临就为清朝统治中原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 （三）圈地和剃发的风波

女真族虽然在十二世纪曾建立过封建制的金王朝，但是建立金王朝的女真族和后来建立清朝的女真族，并不属于一个部落，且金亡后那些女真人又复散居，所以至努尔哈赤兴起，皇太极建立满清，这时的女真族仍是一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形态。直到福临入主中原接受了汉文化影响，女真族才又一次向封建社会形态转化，当女真族进入中原之初，他们是企图用落后的农奴制取代中原先进的封建制的，其表现就是满清进入中原所展开的圈地运动。

有趣的是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在欧洲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但是几乎同时在亚洲东部和欧洲西部进行的圈地运动其性质是绝然不同的。虽然他们共同是掠夺农民的土地，都遭到农民的反抗，但是欧洲圈地运动是由于毛织业发展，羊毛价格上涨，养羊成了有利可图的事业，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为了牟取暴利就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使他们变成了资本主义工场中的工人。以后圈地又使土地成为农业资

本家的大农场，农民又变成了农场工人。这些欧洲的圈地运动是使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产物，这一过程给农民带来了痛苦，但却是在阵痛中迎来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新胎儿。而在亚洲东部的圈地运动却是一种历史性倒退的性质。满清贵族把大片土地圈归己有，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奴隶。这是用落后的生产关系来取代先进的生产关系，所以最终满清的圈地运动是以失败而告终的。福临看到了汉人对圈地运动的强烈反抗，看到了自己民族的旗主、官员，实际是奴隶主们的暴行，他知道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不能不停止这种遭到汉人反抗的圈地运动，所以他就下令把圈占的土地还给百姓，直到他的儿子康熙帝（玄烨）处死想再挑起圈地高潮的大臣鳌拜后，清初的圈地运动才被宣布永远停止。从福临到玄烨可以说完成了清朝封建制的彻底确立，因而康熙朝才被称为满清盛世。在这一点上倒不是福临、玄烨父子有什么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观点，恰恰是说明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要想用落后的农奴制代替封建制人民并不答应。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习俗，穿衣打扮也各不相同。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应该尊重各民族的习俗。然而在封建专制时代，特别是民族矛

盾深重的时期，这种矛盾往往就从各民族不同的习俗，特别是从外观的穿衣打扮上爆发出激烈的斗争。汉族的传统是不剃发的，福临刚入关时，清朝实际掌权者，摄政王多尔衮还不敢下令改变汉族的习俗。但是当他占领了大片地域之后，在顺治二年（1645）就下了薙发令，令言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真重非，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过去剃头的人担着挑子满街转，还没有理发馆。剃头的见了留发的就强迫剃头，谁一抵抗，立刻就会被砍头，然后把头悬在挑子的竿上示众。各处都流行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告诫之语。

留发、剃发一时成为民族矛盾爆发的交点。“头可断，发不可薙”一时成为号召人民反清斗争的口号。这种斗争在江南江阴和嘉定两地尤为激烈。江阴民众把强迫民众剃发的知县投进了监狱，推出自己的首领守卫县城。嘉定人民也组织起来反抗清政府的剃发会。清军对江阴、嘉定实行了全城大屠杀，用血腥镇压强行推广

了他们的剃发习俗。山东知府孔文灏乃用“合理斗争”形式，上疏皇帝说，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逢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及明，制度虽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来未之或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他请求孔门后裔保留汉族蓄发的习俗。然而孔文灏却因此被革职，永不许用。汉人反对蓄发的斗争失败了，举国上下都剃了发，换上了满装。可是汉人的心并没有被征服。在这一点上多尔袞是不如福临聪明的，虽然福临迫于满族势力最后下了罪己诏，承认他习汉俗是一大罪，但实际上如果不是福临习汉俗的一些政策在清代得到实行，怕清政府的寿命也不会长过元朝的。就是清初人都剃了发，但是到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一起，人们还是恢复了汉族自己的蓄发传统。正是有清初的剃发，也才有民国时的剪辫子。剪辫子虽未必就是剃发的报复，但人们似乎学会了以衣着发式来判断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直到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拿起了剪刀，剪长发，剪裤腿，光头肥裤子就是革命了。这种形式主义简单粗暴的做法，又何尝能换得人心的贴服啊。可是封建统治者是不管人心服不服的，它行的就是强权政治、压服政策。多尔袞对百姓如此，对福临也

是如此，可是他哪里会知道他死后第二年尸体就被福临下令扒了出来，又是棍子打，又是鞭子抽，最后被砍掉了脑袋，暴尸示众。高压者的下场，大体多如此吧。

由于清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和执政者对于汉族问题，对于民族政策始终拿不出好的主意，所以终清朝一代，民族矛盾也是十分尖锐的。又由于他们都是刚刚从氏族部落、奴隶制的社会迈向封建社会，因此他们多自私保守，在世界已进入向资本主义大变革的时代时，他们不可能跟上世界潮流。从清代的开国几位皇帝和执政者的所作所为，也就决定了清朝必然要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当一个落伍者了。

## 十一 资产阶级皇帝拿破仑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开始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但是资本主义的进程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却是前后不一的。当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满清王朝建立时，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当满清王朝到达顶盛时期，出现了所谓乾隆盛世之时，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一七八九年法国爆发的革命使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法国人民消灭了统治他们的封建国王，王权被资产阶级平等、自由、博爱的口号所代替。但是时隔不久，一位法国大革命中脱颖而出的英雄人物却利用资产阶级革命的威势，凭借个人卓越的才干登上了法国皇帝的宝座。他，就是世界历史著名的人物拿破仑·波拿巴。史称拿破仑一世。他所建立的帝国被称为法兰西第一帝国。

### （一）从将军到皇帝

一七九九年，法国大革命后的第十个年头，一场政变爆发了。大革命曾经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也曾把吉伦特派、雅各宾派推到政治

漩涡之中。在大革命中，许多潮头人物此起彼伏，轮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现在，一场新的政变又将把谁推到前台呢？

历史常常把自己的使命交与那些值得信赖的人，而这些人需要经过竞争方能在历史面前领受任务。每一次竞争总是有失败者，有胜利者。失败者常常缺乏历史感，不善于发现许多微小的契机。而胜利者恰恰相反，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领悟历史涵义，理解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联系，善于把握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拿破仑就是这样一位胜利者。

一七九九年，当这位科西嘉岛的小个子将军与其他俩人一起成为法国临时执政官的时候，历史已经现出许多征兆，暗示着一种新型政权机构将要在法国出现。此时，法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宗教、道德紊乱的国家。农民们担心大革命中获得的利益被重新回来的波旁王朝贵族们再度夺走。商人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买卖被港口封锁、道路荒芜、拦路抢劫所损害。资本家们再也不肯拿出钱购买一再被推翻的政府公债，因为每一次政变都使他们手中增加一堆新的债券废纸。宗教界开始公然反抗政府。国库仅有一千二百法郎的支配权。而大革命之后的社会秩序，也被离婚自由、结婚草率和不孝

不悌所破坏。一七八九年占领巴士底狱时人民的高涨的革命激情被一种反战厌战情绪所左右，变得心灰意冷。人们开始怀疑每一位领导者的才干是否能满足大众们的希望。此时，不要政治手腕而要实际才能、不要滔滔不绝的政治闲谈与民主辩论，而要具有实际功效的政治统治，成为人民的普遍心理情绪。一种混乱的无序的社会政治局势，要求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出来重振昔日大革命的士气，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如果共和民主政治满足不了这一需要，独裁政治也可以尝试为之。于是，拿破仑·波拿巴出现在法国历史舞台的中心。

拿破仑心机灵敏，目光犀利，博学多闻，过目不忘。他曾在布里安受军事教育，他学会了服从和领导，掌握了战争艺术。他由军校进入军队，他勇于负责，勇往直前，他以自身的表率作用带动着他的军队。他关心他的军官任何生活琐事，因此军队都愿意为他效劳。他很快成为一个出色的将军。时人曾称在战场上，只要拿破仑亲自督阵，就可抵得上四万大军。他善于鼓舞士气，善于作战前动员，他作战的座右铭是“行动和速度”。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他常用的战略。他对于战术研究精到，灵活机动使他的战术变化多端。

拿破仑不仅善于军事，更善于政治。他能选拔第一流人才赋予重任，他能赏功罚过，他具有清醒的头脑，而决不感情用事。他曾说：“政治家的心肠必须放在大脑里。”他会玩弄政治手腕和权术，他曾认真研究历代君主的统治经验，他会用管理军队的办法来治理国家。而法国一七九九年的形势恰恰就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来建立一种军人独裁的政权，来结束国内混乱的局面。文人政客们常常会用无休止的争论耗费宝贵的时光，结果却事事议而不决。党派纷争也是统一政治的大敌，各派争来争去无不是为自己一党的小团体利益。独裁政治不管怎样需要有统一的号令，而党派纷争时的政治却往往堕落到一己私欲的满足。大革命后的法国，各派争斗无日无之，而相互残杀导致法国的形势急转直下，濒于危急。此时正是强有力的独裁者一显身手之机。于是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出身的将军便能够出来收拾残局了。

早在一七九八年，英奥等国结成反法国的第二同盟，以对付资产阶级革命。尽管法国人民热切地盼望和平，却不愿以恢复波旁王朝统治为代价。拿破仑深深理解人民的心情，于是他开始展开一场军事与外交战争，以求拯救法国。

拿破仑虽然出身行伍，却颇具外交天赋。在第二次反法同盟强大攻势面前，他一方面亲自统率军队与其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第二次反法同盟中英、俄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第二同盟。一八〇〇年，法军将俘虏的六千名士兵交还俄国，为此，俄国沙皇保罗一世以退出反法同盟作为报答从而与拿破仑单独讲和。这样，拿破仑赢得了重大外交胜利。与此同时，拿破仑率领他的军队再次占领意大利，并迫使奥国皇帝签订了吕内维和约。当和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巴黎，巴黎证券交易所一日之内上升三十点，巴黎人民高呼“波拿巴万岁”，庆祝拿破仑的胜利。时隔一年，拿破仑又以军事实力迫使英国签订亚眠和约。终于，拿破仑·波拿巴在自己的政治统治中加上又一很有份量的砝码。

拿破仑从一位法国革命中冲杀出来的将军逐渐走上法国政权的顶峰，在他的前半生，他一直是以军事才干取得政治权力的。我们知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于世界近代史影响很大，不仅是因为平等自由的人权思想，也是由于法国大革命铸造了像拿破仑这样的英雄人物。一般地说，军人政权随着世界范围的民主进程而日益衰落，军人政权与战争的密切关系也随着和平呼声的日益高涨而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但

是当一个国家需要一种强大的统治力量而文官政府又无法给予的时候，军人势必要出来干涉政治。今天，我们听到军人政权常常会不禁心惊胆战，因为军人所代表的武力已经不为和平环境所接受。可是，消除军人政权重演的最好方法却很可能就是军人政权的建立。拿破仑在他的生涯中一直相信武力能够解决一切，而他的荣辱兴衰也都同他的军事胜败密切相关。也许，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拿破仑的所作所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但作为一介武夫，拿破仑最终还是因为武力失去作用从而被放逐圣赫勒那岛并死于岛上。不过，在他一八〇四年登基做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并把他当作伟大的英雄而崇拜。

一八〇四年五月二日，法兰西共和国通过一项十分矛盾却不无深意的动议，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拿破仑·波拿巴应当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皇帝。（二）皇帝的头衔和君权应由其家族世袭。（三）他应当保护人民的平等、自由和权利。这三项内容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对拿破仑的屈服，既承认他具有无可取代的独裁力量，同时又把希望寄托在他个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认同上。事实证明，拿破仑符合这一要求，在他的皇冠上，始终闪耀着资产阶级政

治家的光芒。

一八〇四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在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加冕仪式。教皇庇护二世亲自主持了仪式。当皇冠戴在他头上时，拿破仑的内心激动万分，不仅是因为他赢得权力，而且他也深知，一场新的战争即将开始了。

## （二）庞大的拿破仑帝国

拿破仑当政后曾表示“我将专心从事国家的行政，而且我相信应能创造奇迹。”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他制定了拿破仑法典。虽然这部法典继承了中世纪的罗马法，保留了许多封建的内容，但它毕竟是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所制定的。因此它也采用了某些革命的内容，当然革命内容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从实质上这部法典乃是对资产阶级高压和独裁专制的肯定。法律有一定的约束力，但是要想使人们的思想受到约束，服从统治，光有法律是不够的。拿破仑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又利用了宗教，把教会作为巩固他统治的工具之一。教会在教义问答中教给人们一种新的思想，即“尊敬皇帝就是尊敬上帝”。拿破仑正是利用人们的宗教信仰，利用教会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加深了他在人

们心目中的印象。

尽管拿破仑当了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但是欧洲的封建君主们却清楚地知道，这个皇帝乃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而且这个皇帝的势力在欧洲不断地扩大，所以欧洲的封建王国便结成了第三同盟以抗击法国，而这同盟的主力便是沙俄和英国。英国为争夺殖民地和法国早已结有世仇，英国是不想让法国强大起来的。俄国作为封建皇权的维护者，他们是不允许资产阶级势力在欧洲蔓延的。拿破仑面临着是保卫帝国的战争，同时也在战争中出击，侵略和占领、吞并了欧洲不少小的封建君主邦国。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在摧毁封建制，加速资本主义进程中有它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人民来说不过是换了一个统治主子而已，但对拿破仑来说一场场战争的胜利，大片土地的获得，使他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使整个欧洲几乎笼罩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

为统治这样一个大帝国，拿破仑采取了封建帝王常采用的统治方式，分封自己的亲族。他以为这些亲兄弟是最可信赖的。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拿破仑当了皇帝，他的一家也就成了皇族新贵。他的哥哥约瑟夫被封为那不勒斯国王，他的弟弟鲁西安被封为驻西班牙大使，另

一个弟弟路易为荷兰国王，而路易的儿子即为拿破仑三世。他的小弟杰伦被任命为西发里亚国王，他的继子尤金被封为意大利总督，他把波比奴和卢卡公国给了他的姐妹依利莎，并任命依利莎为他斯卡尼的女公爵，他又任命保琳为瓜斯特拉的女公爵。嘉罗琳被任命为贝尔格和克里夫斯的执政者。至于拿破仑的母亲，拿破仑则尊其为皇太后，每年有五十万法郎的津贴。但是这种分封已经大大过时了，因此拿破仑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所以后来他在被流放时曾说：“无疑地，我的家庭对我支持不利。”“我没有成吉思汗的好运，他有四个儿子，只知忠实地为他服务，不知其他的竞争。如果我使我兄弟中的一人为王，他立即以为自己‘蒙上帝恩赐’为王，此一套语竟已变得如此具有感染力。他不再是我可信赖的中尉，而是一个更须提防的敌人。”这段悲哀的自白虽然揭露了拿破仑家族对拿破仑事业没有给予必要的或如拿破仑所希望的支持，但是拿破仑还是没有看到他这种分封制，这种家天下的做法本身就是他的悲剧的原因。他亲自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制定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典，他面临的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时代，他本人也对欧洲封建君主的进攻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可是在统治权上他却因

袭封建那一套，企图建立他个人的独裁，建立他家族的独裁，建立封建世袭统治。这种逆历史潮流的作为怎么能够不失败呢？这倒不是成吉思汗有儿子忠心耿耿，拿破仑没有儿子只有兄弟的问题。

拿破仑野心勃勃期望能建立一个永久的法兰西帝国，他希望能成为整个欧洲的教化主，他也的确征服了大半欧洲。他治下的版图从莱茵河起至维斯杜拉河，经布鲁塞尔至那不勒斯，其间王国林立，有荷兰、汉诺威、西发里亚、巴登、巴伐利亚、符登堡、伊利律亚、威尼斯、伦巴底、西西里、教皇等王国。这些王国各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传统心理道德、语言信仰等。他把这些小王国的封建制打破，但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新王国确非易事，而且他也找不到那么多和他一心一意的干练人才去治理这些国土，就连他的兄弟姐妹也并不和他一心。他是个政治家、军事家，但是他却没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思想来统一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他空有庞大的地域，却无有治理的能力。况且在被推翻的封建君主中间有很多人并不甘心失败。在拿破仑帝国的外围还有着各种反对它的强大的敌对势力。所以当这些内外力量联合起来时，法兰西帝国就无法招架了。波旁王朝又复辟了，

欧洲各小国又独立了。拿破仑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是拿破仑终究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足迹。伟大的诗人歌德曾称赞拿破仑是“世界上所曾见到的最伟大的人”。斯当达尔则称拿破仑为“自凯撒以来，史上所见的最伟大人物”。

拿破仑失败了，拿破仑的失败换来的却是新王朝的复辟。相比较人们却更加怀念拿破仑，虽然他以专制取代了自由，以贵族政治取代了平等，但人们还是认为他的独裁政体保存了革命的本质：结束封建制及其苛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各阶级的有才干之人可以有进升之阶，不必仅依封建等级门户而限。所以夏多布利昂这个拿破仑时代的作家曾说：“世界属于拿破仑，当他在世时，无法获得世界，但死后却拥有世界。”

### （三）拿破仑性格一瞥

如同其他伟大的人物一样，拿破仑具有自己鲜明的性格特征。实际上，如果不是超凡脱俗的个性，任何伟大都无法成就功业。

在拿破仑的一生中，从没有任何东西比权力和光荣更能打动他的心。从一名将军到共和国第一执政再到至尊无上的皇帝，拿破仑一步

步地迈向权力之巅。在他成为法国皇帝之后，权力欲并未因此减弱，却因为大权在握而更加追求权力。他自己有着浪漫的英雄豪气，梦想有朝一日重建查理大帝的功勋，统一欧洲，然后踏着君士坦丁大帝的足迹，由欧洲席卷君士坦丁堡，建立庞大的帝国。甚至于他梦想征服印度，完成亚历山大大帝未能完成的任务。在拿破仑的内心深处，保存了许多属于古典英雄主义的理想，而正是这种理想成为拿破仑一生东征西杀、扩张侵略的动力。

权力和野心，支配了拿破仑全部生命。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他根本无意活着。“死算得了什么？然而生于战败中，生于耻辱中，不啻一日百死。”正是这种信念，使得拿破仑终生都在为追求万世不朽的功业而奋斗。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权力是我的情妇，我努力奋斗征服了她，绝不容许别人从我身旁把她抢走。”这就是拿破仑的权力观，也恰恰是这位生前曾拥有不少真正情妇的皇帝的悲剧：他的权力如同他的情妇一样最终仍然被别人夺走。

拿破仑具有无比坚定的意志，有为远大目标顽强奋斗的决心。在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有今日，完全因为我坚强的意志、性格、努力和胆识。”确实，在拿破仑一生

中曾有过无数次濒于失败的经历，最终都因他的勇敢和坚定反败为胜。在奥斯特立兹战役中，他的坚强意志再一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所指挥的法军以少胜多打败了强大的俄国军队。在后人的笔下，拿破仑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将军、英明果断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位具有超凡毅力的半人半神式的神话人物。

大凡伟人都是傲慢的，也许有些人表面上谦恭和蔼，但内心深处却旁若无人。拿破仑更是如此，他的傲慢与自负几乎都表现在外面。他将自己视为法国的守护神、人民的保护者，“朕即国家”就是拿破仑内心狂傲自负的最好反映。拿破仑曾经对他的秘书说：“布宁，你也会不朽的，因为你是我的秘书。”他一生指挥了无数次战争，最后还是以战败而告终。不过，在他内心世界里，他永远不是一位失败者，因为他的骄傲自负已根深蒂固地印刻在他的心中，使他永远把自己与胜利联系在一起。

拿破仑的个性特征如此鲜明，以至在他身边的人都感到有一种压力。这是一种人格的力量。与他接触最多的人从他的前妻约瑟芬皇后到他的贴身保镖，都对他怀有畏惧之情。他的脾气暴躁，动辄发怒，对于许多地位相当高的人如驻外大使、红衣主教等人也常常口出不逊。

不过不要以为他是一个残暴粗野的人，他对待士兵和蔼可亲，对于有功的将领也是恩宠相加。他内心的感情世界极其丰富细腻，当他得知亲爱的将军戴沙克斯阵亡的消息时，竟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这位皇帝为了政治目的与约瑟芬离婚，娶了奥国公主，但直到他被放逐圣赫勒那，他一直在心中深爱着他的前妻。

这就是拿破仑的性格。追求权力的野心使他向往光荣的一生，突出的个人支配欲使他凌驾于众人甚至国家之上。但他的内心也有慈和温柔的感情。作为一位科西嘉的军人，他的血管中流淌着野性的血液，而法国传统的文化又给予他富有浪漫色彩的个人英雄主义影响。许多矛盾的性格在拿破仑身上结合得如此完美，从而塑造了一位极富戏剧性的英雄人物。

个人性格的影响往往潜在地反映到社会政治生活之中。人类在原初社会状态下，性格的表现较为突出，特别是在古典英雄主义时代，个人性格常常决定个人成就。但随着人类社会制度的日益完善，人与人关系日益复杂，个人性格就要更多地隐藏起来，服从于时代与社会的性格。这一现象在东方农业文明社会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而在西方世界里，由于传统的影响，个人性格尚且可以保留一些直露机会。政治原

来是一种群体活动，而政治人物便是由各种机会和各种环境造就的，一旦成为政治风云人物，必然希望能够在政治活动中体现个人愿望和理想，于是个性特征便会乘机出来推波助澜。拿破仑个性上的许多特点都对其统治下的法国发生了很大影响。其它不论，就以那个时代法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追求荣誉精神为例，如果不是拿破仑一手培养起来的话，起码也是他激励的结果。

拿破仑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为了达到他追求的目标，不论怎样艰难辛苦，他也百折不挠。然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并不是认定目标向前冲锋就能完全获胜的，这一点直到晚年他才懂得。意志坚定并不等于直线前进，有时退却、迂回恰好是为了更好地前进。然而他懂得却太晚了。

他的生活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他常常为了目的暂时不能实现而情绪急躁，甚至发起脾气来不顾场合，当众斥责外国大使，使人难堪，甚至脚踢学者的胃部，让人痛楚难忍，他只求自己一时痛快，而决不在乎他人的痛苦。所以拿破仑虽然声名显赫，权势极大，但是他却没有朋友。拿破仑曾说：“友谊只是虚名而已。我无法和别人建立友谊。”“我知道我并没有真正的

朋友，只要我今日之地位不变，我要多少虚情假意的朋友就有多少。”

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下属要求也严格。他对下级的报告和意见要求具体简明，反对繁文藻饰，空谈无物。这一切是为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政权服务的。他对下属指示有好消息不必忙于报告，而有坏消息，哪怕半夜也要马上报告。他时刻保持着警惕。他有一句箴言：“成功到一败涂地往往只是一步之差而已。”

他善于谋略，善于识人，善于用人，尽管他对人苛刻，可是他的才干还是使不少人佩服，使不少人为他甘愿献身。他比较讲究实际，不关心仪表，不讲究谈吐。他思维敏捷，写字很快，目前已知的公开书信就有四万余封。

但是不要以为拿破仑是一个枯燥的人，是一个冷血的人。任何一个人都是复杂的，都是多种性格的混合体。我们述说了他的主要方面，但他高傲，有时也很谦虚；他冷酷，有时也很多情；他很威严，有时也很幽默；他善于谋算，有时也有失误。他有伟大的一面，也有卑鄙的一面、平庸的一面。他说过“我一向能以意志改变和创造命运”；他也说过“我依顺大势，我没有自己的意志。我任事物自然发展”，“命运驱使我朝不可知的目标前进。”

然而拿破仑是拿破仑就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无论如何他对欧洲历史的进展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他是一个应时代而产生的风云人物。

# 结语 皇帝可以休矣

## (一) 皇权专制的阴影

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便宣告结束了。但是“皇帝”这个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幽灵却不肯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当惯了奴才的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们似乎感到没有了皇帝，他们也就失去了灵魂。而一些野心家、皇权主义的信奉者们则大做皇帝梦，企图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为此他们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出卖民族利益，甘当帝国主义的儿皇帝。满清灭亡后的中国近代史上不就出现了一幕又一幕的皇帝还魂的闹剧吗？

满清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下台刚刚五年，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跳上了皇帝的宝座，当了不到一百天的“中华帝国”的皇帝，过了过“皇帝”瘾。为了过这皇帝瘾，袁世凯竟

和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将中国的领土主权部分地出让给了日本。袁世凯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卖国行径，遭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对。他的皇帝梦做不下去了，只好自杀身亡。然而袁世凯死去一年，张勋又搞起了复辟，他不敢自己做皇帝，却又把溥仪重新扶上了台，企图让死去的“皇帝”的僵尸，再借力还魂。新皇帝袁世凯，人民不承认，被推翻了的皇帝再上台，人民更不答应。张勋想做中兴大臣的美梦也破产了。

中国人民经受了两千多年皇帝的统治，再也不需要皇帝了。可是打进中国来的帝国主义却需要皇帝做他们的傀儡，特别是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竟在东北又建立了一个伪满帝国，把溥仪又搬上了台。这个伪满帝国的好景也不长，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溥仪也成为了一名大战犯，而被关进了监狱。应该说从一九四五年起中国这块国土上就没有了皇帝。

## （二）历史的车轮不容倒转

历史永远向前，车轮不容倒转，正如满清皇帝被从龙椅上揪下之后，无论谁，再想坐上

龙椅，都只能自食苦果一样。皇帝在中国永远休矣。皇帝在世界也必将要彻底消失。

皇帝今后不会再出现于中国了，而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数量之多在世界史上却可堪首屈一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和延续。一代又一代，一代有一代的开国皇帝，能够担当开国皇帝的人总有其独特的机遇和建树。朝代的寿命有长短，朝代的更迭有盛衰，开国皇帝的作为总是和他所建立的朝代寿命长短、盛兴衰竭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历史是今天的借鉴，看一看历史上的皇帝是怎样开国的，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对历史的进程和发展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应当是很有趣味，也很有意义的事。对于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过去的史官们是称颂备至的。皇帝的话是金科玉律，皇帝的作为是上天的意旨，皇帝就是天命所在，皇帝不可抗拒。在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封建社会，以臣子来评皇帝的功过，谁又能说皇帝有什么过错呢？皇帝的名字，百姓都得避讳，何谈其它？对皇帝们能够指手划脚，评论皇帝的功过是非，也只有打倒皇帝的时代才能出现，也才能够比较公允客观。

皇帝也是人而不是神，过去对于皇帝往往神秘化、神仙化，伴随着每一个皇帝的出现，总

要有一些神话式的传说，总要有一些迷信色彩极浓的描绘，为的就是把皇帝说成是真龙天子。看看所谓信史是怎样写皇帝不凡的吧，看看那些历来称为敢于写实的史家笔下，皇帝是怎样的神圣吧：

《史记》、《汉书》皆言汉高祖刘邦乃是龙子。刘邦的母亲在湖边堤坡上休息，忽忽而入梦乡，梦与神相遇。这时天气晦暗，雷声滚滚，她的丈夫，也就是刘邦的父亲去招呼妻子，这时却看见一个蛟龙正在妻子身上，不久妻子怀孕就生下了刘邦。刘邦也相貌不凡，高鼻长脖，大胡子，左腿上还有七十二黑子，人说是象征天上赤帝下凡。甚至刘邦更被相士预言将来必大贵。他起兵反秦路上杀了一条蛇，也被说成是赤帝子刘邦杀了白帝子，附会成各种神奇之谈。《唐书》记唐太宗李世民也说李世民四岁时就有一书生说这孩子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几冠，必能济世安民。《五代史》记梁太祖朱温降生之时“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里人皆惊奔而来，日朱家火发矣。及至，则庐舍俨然。”大家对这种怪事都惊异不止。写得真像有那么回事。而又记李克用生时“虹光烛室，白气冲庭，井水暴溢”。石敬瑭生时也“白气充庭”。郭威生时则“赤光照室，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

四迸。”《宋史》记赵匡胤生时则是“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明史》记朱元璋的母亲也是做梦，梦见神人给她一丸药，放在手中闪闪发光，她吃了那丸药，就醒了，口里还有香气。及生朱元璋时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所有这些奇异荒诞之谈，不过是为了把皇帝说成不是一般的人。对这种半人半神的皇帝，谁敢不崇拜呢？皇帝的所为也就不可指责了。

皇帝是人，又是一国之主，特别是开国皇帝，其所作为对当时，对后世都会有超出一般人的影响。对于他们的功过是非我们应该冲破封建史家的认识，给予评说，并从他们的治国治政得失中吸取借鉴。皇帝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这是既成的事实，我们反对皇权，打倒皇帝并不抹煞历史。皇帝的有些做法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对此我们应当肯定。但他们有些做法则阻碍了历史的前进，他们的倒行逆施给人民带来过巨大的苦难。认识这些皇帝，也是认识我们国家、民族历史发展轨迹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事我们青年学生要知道，每一个中国人也都应该知道。

不仅中国有皇帝，外国也有皇帝。人类历

史的发展，在地球上不同地域、不同国度，大体经历了相同的阶段。外国的皇帝也是各式各样的，有名的也不少，什么凯撒大帝，什么奥古斯都，什么亚历山大，什么伊凡雷帝，彼得大帝等等。亚洲、非洲、欧洲都曾出现过叱咤风云的帝王，倘有时间，也应当对这些帝王们的功过进行评说，看看他们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都曾起过怎样的作用，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这里只顺便说及了一两个皇帝，不能再多说了，该收笔了。如果人们愿意听，那就再听下回分解吧。

鲁新登字第 3 号

文化广角丛书

开国皇帝的功罪

门岗 马华 著

\*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华光 IV 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

787×1092 毫米 36 开本 5  $\frac{7}{9}$  印张 4 插页 97 千字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20,001—30,001—35,600

ISBN 7-5329-0700-7

I·623

定价 2.95 元